校勘學史略

趙仲邑編

商承祚題





校勘学史略

赵仲邑编

责任编辑：梅季坤

岳麓书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3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18,000　印张：5.25　印数：1—6,100

统一书号：17285·1　定价：0.73元

前　言

历史不能割断，有继承才有创新。我们要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化，对我们祖先所创造的悠久灿烂的文化遗产，就有批判继承的必要。这些文化遗产，主要保存在古书里面。中央号召我们大量整理古籍，当然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整理古籍，包括对古书的辑佚、标点、注释、翻译，而古书的校勘又是首先要做的工作。除了要组织大批人力投入这一工作外，还要培养这方面的新生力量。编者于一九八二年招收了以古代汉语为研究方向的三位汉语史专业硕士研究生，任务是培养既能胜任古代汉语教学和科研工作，又能从事古籍整理的人才。因此，给他们开了《古代汉语专题研究》、《训诂学》、《校勘学史》、《古文翻译》等四门专业课。

训诂和校勘在我国都源远流长。我们学训诂学和校勘学，既要从横的方面来学，又要从纵的方面即从史的方面来学；既要总结时贤训诂和校勘的经验，又要总结前贤的经验。所以编者所编训诂学的教材，基本上是从史的发展来谈的；故“校勘学”干脆就叫“校勘学史”，所编教材干脆就叫《校勘学史略》。这本教材，可能不只是对几个研究生有用，对广大从事古籍校勘工作的同志也许有点帮助，因此不揣冒昧，交出版社出版了。承岳麓书社大力支持，谨在此深致谢意。

由于编者患了中风后遗症，左肢瘫痪，因而往图书馆、资料室就困难重重。本书编写时，有些资料幸而得到陈焕良同志代为寻找或查对，谨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赵仲邑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于中山大学中文系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1）
第一节　校勘和校勘学……………………………………（1）
第二节　校勘的必要性……………………………………（4）
第三节　校勘的对象………………………………………（5）
第二章　校勘事业的建立期………………………………（13）
第一节　设官校勘之始……………………………………（14）
第二节　史家校勘之始……………………………………（17）
第三节　《五经》刊石之始…………………………………（18）
第四节　东汉私家的校勘…………………………………（20）
第三章　校勘的衰落期……………………………………（23）
第一节　四部分类法之始…………………………………（23）
第二节　汲冢书的校理……………………………………（23）
第三节　衰落之迹…………………………………………（26）
第四节　目录的编纂………………………………………（28）
第五节　私家的校勘………………………………………（29）
第四章　校勘的复兴期……………………………………（34）
第一节　藏书之盛…………………………………………（34）
第二节　贞观《五经正义》…………………………………（37）
第三节　《开成石经》………………………………………（37）
第四节　雕板与活字印刷…………………………………（39）

第五节　宋代的校刻……………………………………（42）
第六节　宋代校勘学的特点…………………………（46）
第七节　校雠学有专书之始…………………………（49）
第八节　《说文解字》的校理…………………………（51）
第九节　宋元明刻本的比较…………………………（52）
第十节　唐初两大校勘家……………………………（55）
第十一节　私家校雠之盛……………………………（57）
第十二节　删改之风…………………………………（69）
第十三节　馆职之滥与图书之乱……………………（74）
第五章　校勘的全盛期………………………………（76）
第一节　鼎盛的背景…………………………………（76）
第二节　清儒校勘的方法……………………………（78）
第三节　清代校勘事业的初期和全盛期……………（79）
第四节　目录学和版本学……………………………（86）
第五节　《四库全书》的校理…………………………（89）
第六节　清代重要的校勘家…………………………（93）
第七节　辑佚与辨伪…………………………………（121）
第八节　清代校勘的总成绩…………………………（129）
第九节　民国以来……………………………………（136）
第六章　从史的发展看校勘的目的、条
件和方法……………………………………（143）
第一节　校勘的目的要求……………………………（143）
第二节　校勘需要的条件……………………………（147）
第三节　校勘的方法…………………………………（155）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校勘和校勘学

什么是校勘？先从“校”字和“勘”字的意义谈起。

“校”，是考核查对之意。如《汉书·食货志上》：“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考核查对文字也叫“校”，如骆宾王《帝京篇》：“校文天禄阁。”

“勘”，《说文解字》：“勘，校也。”《玉篇》：“覆定也。”指复核审定。

“校勘”，是两个同义的单音词所组成的双音词，但有其特殊意义：狭义的校勘，专指同一部书，用不同版本和有关资料，互相核对，比较其文字的异同，以订正错误；或只比较其文字的异同。广义的校勘，则包括古书的辨伪、辑佚及书目的校理，如张心澂《伪书通考》、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宋代的《崇文总目》、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等。

明熹宗名由校，所以明末因避熹宗之讳，把“校勘”改为“校勘。”清代顾炎武、惠栋、黄丕烈等所校各书，“校”都作“校”。

又有“校雠”之名，和“校勘”在某种意义上相通，亦作“雠校”。“雠”是“对”之意。“校雠”“雠校”这两个词，用得都比“校勘”早。如：

所校雠中《管子》书三百八十九篇。（汉刘向《管子序》）

"校"和"雠"的意思是：

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冤家相对，为雠。（《御览》618引刘向《别录》）

可知"校雠"之名，西汉已有。

雠校篆籀。（《文选》左思《魏都赋》）

可知"雠校"一词，西晋已有。但"校勘"之名，梁代以后才出现：

宜选史传学士谙究流品者为左民郎、左民尚书，专共校勘。（《沈休文集》）

太常博士掌谥，职事三品以上薨者，故吏录行状，申尚书省考功校勘，下太常博士拟议讫，申省；省司议定，然后闻奏。（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四《定谥》）

后代被不断沿用，如：

予在馆中校勘群书，见有八十余篇，然多错乱重复。（宋欧阳修《文忠集》七三《书春秋繁露后》）

后"校雠""校勘"并用。但到近代，则"校勘"一词逐渐取代了"校雠"一词，如说"校勘学""校勘记"。可是，古之"校雠"，包括了合众本以校一书，撮指要而为叙录，寻源流而别部居。因而"校雠学"包括了校勘学、版本学、目录学。

"校对"，从字面来看，和"校雠"、"校勘"意义相似，但不完全相同。"校雠"、"校勘"是对古籍整理来说的。而"校对"，则是指报刊、图书出版工作的一个环节，根据原稿或定本核对校样，订正错误，以保证出版物的质量。工作对象不同，其应用的范围也不一样，可以说"校雠学""校雠学史""校勘学""校勘记"，但不能说"校对学""校对学史""校对记"。

"校勘学"，是研究校勘及和校勘有关的问题（如古书为什么要校勘、校勘的对象、校勘的历史、校勘的目的要求、校勘的条件和方法等）的一门学科。它既研究狭义的校勘，也研究广义的校勘。由于古人说"校雠"，有时指的就是校勘；古人说"校雠"、"校勘"，有时指的就是校对。所以本书谈校勘，也牵连到校雠和校对。

"校勘学史"，就是研究校勘及和校勘有关问题的历史发展的学科。由于校勘学牵连到目录学、版本学以至图书馆学，所以本书谈校勘学的历史发展，也牵连到历史上目录学、版本学和图书馆学等问题。

据上所述，可知"校勘"原包括在"校雠"里面。"校雠"之名，始于西汉，校雠之事，也始于西汉，包括的范围广。西汉中后期，刘向、刘歆领校秘书，所用以校雠的方法当然有一套，因此校雠学也当然可说始于西汉了。可惜刘氏父子所用以校雠的方法，传下来的很少。至于俞樾《札迻序》说"校雠之法，出于孔子"，其法更不得而详了。

有校雠学的专书，始于八百多年前的南宋高宗时的郑樵。他在序言中说：

> 册府之藏，不患无书；校雠之司，未闻其法。欲三馆（史馆、集贤院、昭文馆）无素餐之人，四库无蠹鱼之简，千章万卷，日见流通，故作《校雠略》。

清章学诚谈学术源流的《校雠通义》说：

> 郑樵生于（刘氏父子）千载而后，慨然有会于向、歆讨论之旨，因取历朝著录，略其鱼鲁豕亥之细，而特以部次条别，疏通伦类，考其得失之故，而为《校雠》。盖自石渠、天禄以还，学者所未尝窥见者也。

章学诚虽批评了郑氏贬斥班固《汉书·艺文志》之失，但这里对郑樵的《校雠略》还是作了肯定的。

关于《校雠略》编著的动机及其具体的内容，在下面第四章第七节再作详细介绍。

第二节　校勘的必要性

整理古籍，包括断句、注释、翻译等，但都要先从事校勘，否则断句、注释就会断错、注错，从而也会译错。为什么要先从事校勘呢？因为古书文字往往有错误，使人难读难解，产生歧义，校正后，原文才文从字顺，可读可解了。如：

> 楛耕伤稼，楛耘失岁，政险失民，田秽稼恶，籴贵民饥，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谓人祅。政令不明，举错不时，本事不理：夫是之谓人祅。礼义不修，内外无别，男女淫乱，父子相疑，上下乖离，寇难并至：夫是之谓人祅。祅是生于乱，三者错，无安国。其说甚尔，其灾甚惨。勉力不时，则牛马相生，六畜作祅，可怪也，而不可畏也。（《荀子·天论》）

这段文字字面很浅，但“勉力不时，则牛马相生，六畜作祅，可怪也，而不可畏也”，这几句不好懂。因为其中文字有错误。清王先谦《荀子集解》根据《韩诗外传》校订时把“勉力不时，则牛马相生，六畜作祅”移至“本事不理”之后。但这样校改，文章还是不好懂。因为这样，原文对三种人祅，总起来说“可怪也，而不可畏也”，就是说“人祅不可畏”，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因此清俞樾又把“不可畏也”的“不”校为“亦”。但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因为“勉力不时”和“牛马相生，六畜作祅”没有关系。所以又有人认为“勉力不时”三句移至“本事不理”之后，“则”是多余的



字，应删，认为这样才符合荀况唯物主义的思想。这例子说明因原文文字有误，就这样妨碍了读者理解原文。

文字有错，即使从文义上可以读通，但读通的并不是原文，所理解的还是不符合历史的真实。如：

左师触詟愿见太后。(《战国策·赵策四》)

据《史记·赵世家》及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战国策》，“詟”是“龙言”二字之误。如误读为“詟”，文理虽通，但不符合历史事实。所以校勘时阅读和理解古书是很重要的。

古书中文字上的错误很多。汉淮南王刘安撰《淮南子·内篇》，经清代著名训诂学家王念孙校勘，校订出包括衍文、脱文、颠倒、讹字、失韵等文字上的错误共六十四类九百余条。又如清代胡克家翻刻元刊本《资治通鉴》，有人把它和宋本对照校订，发现其中正文的掉字、错字、倒字共在万字以上，单掉字一项就有五千二百余个。这对史实记载的真实与否就关系重大了。难怪王念孙慨叹地说：“嗟乎！学者读古人书，而不能正其传写之误，又取不误之文而妄改之，岂非古书之大不幸乎？”(《读书杂志·淮南内篇第二十二》)

第三节　校勘的对象

古书文字上因传抄转刻而发生的错误，其原因多种多样：

一　误字

1.因古字之误

宁王遗我大宝龟。(《尚书·大诰》)

“宁”是“文”字之误，“文”，《旂鼎》作[illegible]，与小篆的[illegible]相象，汉代经师不识古文之“文”字，遂误以为“宁”字，不知“文王”是周公

指其父“文王”而言。

2.因隶书之误

其栚曲筥筐。(《淮南子·时则》)

栚，音朕，为架蚕簿之木。隶书“栚”或作“栚”，而各本遂误为“樸”字。不知栚、曲、筥筐，都是蚕桑之具。如果作“樸”，文义就不好讲了。

3.因草书之误

柱不可以摘齿，筳不可以持屋。(《淮南子·齐俗》)

东汉高诱注:“筳，小簪也。”音廷。两句是说筳可以剔牙，而不可以支屋。因筳的草书与“筐”的草书相象，各本遂误为“筐”。

4.因俗字之误

欲宍之心亡于中，则饥虎可尾(人可以尾随之)。(《淮南子·原道》)

“宍”本“肉”俗字。道藏本误作“寅”；各本又误改为“害”。

5.因假借而误

蚖蝉著(居)泥百仞之中。(《淮南子·览冥》)

“蚖蝉”是“鼋鼍”的假借字。各本把“蚖蝉”误为“蛇鳝(鳝)”，便与下文“蛇鳝”相乱了。

6.因难识之误

恕，明也。(《墨子·经上》)

“恕”即“智”字。旧本皆误作“恕”，大概是因不识“恕”字而妄改，惟道藏本及明吴宽抄本不误。

7.两字误为一字

上文第一章第二节谈到把《战国策·赵策四》的“触龙言”误为“触讋”，就是一例。

8.一字误为两字

我有周惟其大介赉尔。(《尚书·多方》)

《说文》大部:"夰,大也。从大,介声,读若盖。"后人罕见"夰"字,遂误分为"大介"二字。其实"介"义也是"大"。"大介赉尔",赉音赖,当然是赐之意,但有人释为"大大赐汝",就不合《尚书》用语的习惯了。"夰赉"即《尚书·武成》"大赉于四海"的"大赉"。

二 脱文

此俗世庸民之所公见也,而贤者弗能避,有所屏蔽也。(《淮南子·原道》)

东汉高诱注:"以渝利欲,故曰有所屏蔽也。"各本正文脱"有所屏蔽"四字,注文就无的放矢了。

三 衍文

遂而不返,制乎嗜欲(放肆而不知返,为嗜欲所制),制乎嗜欲无穷,则必失其天(本性)矣。(《吕氏春秋·侈乐》)

有着重号的"制乎",涉上"制乎"二字而衍。

四 叠字

天降寤于程,程降因于商,商今生葛,葛右(祐)有周。维王其(若)明(公开)用开(开导)和(和衷共济)之言,言孰敢不格?(《逸周书·大开武》)

有着重号的"程"、"葛"、"言",都不该叠。降寤(逆)于程(人名),降因(顺)于商,皆天所降。若作"程降因于商",则不通。汉孔安国注:"商朝生葛,是祐助周也。"可知孔本所据本不叠"葛"字。孔注:"可否相济曰和,欲其开臣以和,则忠告之言,无不至也。"是孔读"维王其明用开和之言"为句,"言孰敢不格"为句,下"言"为衍文。

五 重文

逝（誓）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因）得我所。（《毛诗·魏风·硕鼠》）

《韩诗外传》两引此文，"乐土乐土" 都作"适彼乐土"。当以《韩诗外传》为是。《诗经》中叠句成文的很多，如《王风·中谷有蓷（音推）》中 "慨其叹矣" 两句；《王风·丘中有麻》中 "彼留子嗟" 两句。古人遇重文，只于字下加二画作为标志。"适彼乐土"下加二，传写者误作"乐土乐土"，是很自然的事。

六　缺字

1.缺字作空围而致误

机（织机）之铭曰："皇皇惟敬，口生垢（gòu），口戕口。（《大戴礼记·武王践祚》）

清卢文弨（音超）注："垢，耻也。言为君主荣辱之主，可不慎乎？垢，垢詈也。"清孔广森补注："垢有两训，疑记文本作'垢（骂詈）生垢（耻辱）'，故谓之'口戕口'。"今作"口生垢"，大概是传写时写漏了"垢"字，校者作空围以记之，便成了"□生垢"，后又经传抄，便误为"口生垢"了。

2.本无缺文而误加空围

能求士□者，智也；与民利者，仁也。（《周书·本典篇》）

两句语法结构相同，上句不该有缺文，□应删。

有知而言弗发，有施而□弗德。（《周书·官人篇》）

"发"通"伐"。这两句是说有智慧而不矜伐；有施与而不以为恩德。上句"言"是衍文，校者不察，因以为下句有缺文，便于"而"下加□作为标志。□和"言"都应删。

七　偏旁

以禬礼哀围败。（《周礼·大宗伯》）

"禬"音会或侩，除殃凶祭也。字误，应作"会"。"哀"，指解救患

难。“围”，“国”字之误。东汉郑玄注：“同盟者，会合财货以更（换）其所丧。”可知原文本作“会礼”，后人因涉下文之“礼”，而误加“礻”旁，成了“禬”。其实这和“禬祭”无关。

八　错简

例见第一章第二节《荀子·天论》“楛耕伤稼，……而不可畏也”段。又如：

势利不能诱也，辩者不能说（shuì）也，声色不能淫也。美者不能滥（使他无节制）也，智者不能动也，勇者不能恐也。（《淮南子·俶真》）

“声色不能淫也”应从《文子·九守篇》移至“辩者不能说也”句前。势利、声色和辩、美、智、勇，就都以类相从了。

九　混淆

1.正文误作注文

故善建者不拔，言建之无形也。（《淮南子·主术》）

“善建者不拔”，是《老子》第五十四章之语。“言建之无形也”，是《淮南子》解释《老子》之语。各本把“言建之无形也”误作东汉高诱的注文，是由于没有翻查《老子》之过。

2.注文误作正文

彼留子嗟，将其来施施。（那留氏子嗟呀，希望他从小路独来）（《毛诗·王风·丘中有麻》）

毛传：“施施，难进之貌。”东汉郑玄笺：“施施，舒行伺间独来见已之貌。”江南旧本只作“施”。按此诗全诗皆四字一句，这里不应单独五字一句，江南旧本是也。《毛传》以“施施”释“施”，是以重言释单音词，而正文误以注文作正文，因而多出了一个“施”字。

十　妄加

饰（修饰）职事，制服等，异贵贱，差（分）贤不肖，经（书

写）诽誉，行赏罚，则兵革兴而分争生。（《淮南子·本经》）

"则"上均三字一句。"差贤不肖"当作"差贤不"。"不"即"否"的借字。校者不察，妄于"不"下加一"肖"字，意义也通，但已使古书失真。

十一　妄删

国作一岁者十岁强，作一十岁者百岁强，修一百岁者千岁强。（《商子·农战》）

这承上"是以圣人作壹（制定专一于农战的方针政策）抟（团结）之也"而言。本来是说"国作壹一岁者十岁强（有十年强盛），作壹十岁者百岁强，作壹百岁者千岁强"。极言"作壹"之效，这"作壹"是全篇的中心思想。校者不察，误谓"壹""一"同字，于"作壹一岁"句删去"壹"字，于下两句又改"壹"为"一"，于末句"作"字又误改为"修"，全句的意义便全错了。

十二　误改

例见上十一。又如：

奉孤而专命者，谋主必畏其威而疑其前事。（《周书·史记篇》）

"谋主"二字不可解，当作"其主"。"其"误作"某"，后来校者又误改作"谋"。错上加错了。

以上各类，可归纳为"错字"、"错简"、"脱文"、"衍文"四类。都是传写、转刻或校订中无意把文字弄错了的。其中以因文字形似而误或因上下文而错者占多数。

古书文字上的错误，还有属于有意窜改而造成的：

一　避讳

故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而伐不谓贪者，其大计存也。（《管子·霸言篇》）

"伐不谓贪"，《管子》原文本作"世不谓贪"，意思是一世之人不以为贪。唐人避唐太宗李世民讳，改"世"为"代"，后人传写又误"代"为"伐"。

子家驹曰："诸侯僭于天子，大夫僭于诸侯，久矣。"（《公羊传·昭公二十五年》）

"诸侯"上原有"天子僭天"一语，唐以后因怕触犯皇帝的忌讳，把这句话删去了（详见杨树达《古书疑义举例续补》卷一第七条）。

针庄子为坐。（《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周礼·小司寇》郑玄注引作"针严子为坐"，那是为了避汉明帝的讳。

不过这里须要说明，原作者为了避讳而写的文稿书稿，如柳宗元的《封建论》中，凡用"民"的地方都用"人"代替，"生人"即"生民"；凡用"治"的地方都用"理"代替，"大凡乱国多，理国寡"，"理国"即"治国"。前者是避唐太宗李世民讳，后者是避唐高宗李治讳。现在所见的《封建论》就是这样。虽有避讳，这也是《封建论》本来的面目，而应和以上所说古书的失真区别开来。

二　为了政治上某种企图

正如鲁迅的《病后杂谈之余》所指出的，满清乾隆时代修纂《四库全书》，为了消灭汉族人民的民族意识，居然"删改了古书的内容"。如宋晁说之的《嵩山文集》，在旧钞本中"金贼以我疆埸之臣无状……"，在四库本中，"金贼"被改为"金人"。"彼金贼虽非人类……"，在四库本中被改为"彼金人虽甚强盛……"。"忍弃上皇之子于胡虏乎？"在四库本中，被改为"忍弃上皇之子于异地乎？"这些是改。"何则？夷狄真相吞并斗争，是其犬羊狺吠咋啮之性也。惟其富者最先亡。古今夷狄族帐，大小见于史册者百十，今其存者一二，皆以其财富而自底灭亡者也。今此小丑不指日而

灭亡，是无天道也。"在四库本中则全被删去。(参阅鲁迅《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

三　为了提高古典作品的艺术性

如：

洞庭波兮木叶下。(《楚辞·九歌·湘夫人》)

闻一多先生的《楚辞校补》指出："波"原作"坡"，作"波"是后人改的，改得空灵得多。

又如：

肃宗回马杨妃死，云雨虽忘日月新。终是圣明天子事，景阳宫井又何人！(郑畋《马嵬坡》)

后人把"肃"改作"玄"，把"虽"改作"难"，当然把诗改得更有情韵，但这已不是原诗的本来面目了。

前峰月落一江水，僧在翠微开竹房。(唐任翻《题台州寺壁》)

有人把"一"字改为"半"字，也的确改得好，因为"前峰月落"，被高耸的山峰遮住，不可能把一江水都照亮，把"一"改为"半"，就真实了。

以上三例，虽改得好，但不是原诗，故仍是校勘的对象。

第二章　校勘事业的建立期

我国对古书的校勘，源远流长。在周代已有正考父、孔子、子夏等人从事校勘。

> 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颂》十二篇于周太师（掌管《诗经》的官），以《那》为首，以祀其先王。（东汉郑玄《商颂谱》）
>
> 孔子录《诗》有四始，雅、颂各得其所。删《尚书》为百篇，而首《尧典》，亦善校者已。（章炳麟《国故论衡》）

孔子晚年自卫返鲁，删《诗》、《书》，定《礼》《乐》。孔子做校勘工作，精细详慎。据《公羊传·昭公十二年》所记，孔子读鲁史，知“伯于阳在”是“公子阳生”之误，有人问孔子说：“您如知道，为什么不改过来呢？”东汉何休《解诂》解释：这是孔子不愿臆测之故。

据《吕氏春秋·察传》所记：“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晋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古文“己”作“己”，与“三”字相似；“亥”“豕”，古文同形，即𠀅。故易误。

以上所说，证明孔子和子夏都已注意到了校勘，并特别注意到了字形相似而误的事实，但这些都是一些零星粗浅的工作。至于我国校勘事业的正式建立，那是在西汉时期了。

第一节　设官校书之始

春秋战国之世，我国学术昌明，著述繁富，虽经秦火，至汉代还是有很多书籍流传下来。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秋八月，始诏光禄大夫（掌议论、顾问及应对诏命的官员）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参加校书的还有杜参、班斿（音游）等知名学者，但以刘向刘歆父子为主。

刘氏父子校勘的方法：

一　兼备众本　他们所备的本子，有中（中府）书、外书、太常（掌宗庙礼仪的中央机关，相当于后来的国子监）书、太史（掌图籍星历，相当于后来的翰林院）书、臣某书等。中书、太常书、太史书都是官书，外书、臣某书都是私人家藏的书。从其《列子叙录》《晏子叙录》《关尹子叙录》《邓析子叙录》《管子叙录》所言（如《列子叙录》："所校中书《列子》五篇，谨与长社尉臣参校雠太常书三篇、太史书四篇，臣向书六篇、臣参书二篇……"），可知他第一步的工作，是广备副本。

二　比勘文字　古书流传年代久远，辗转传写，文字形声交误，所以刘向的校勘，其第二步工作，便是正讹误。如刘向《战国策叙录》说：

> 所校中（中府的）《战国策》……本字多脱误为半字，以"赵"为"肖"，以"齊"为"立"，如此者多。

又《晏子叙录》说：

> 中书以"夭"为"芳"，"又"为"备"，"先"为"牛"，"章"为"长"，如此类者多。

又《列子叙录》说：

中书多，外书少，章乱布在诸篇。中或字误，以“尽”为“进”，以“贤”为“形”，如此者众。

三　审定篇第　文字讹误，还可以根据上下文推测；推测不到，文章的大意还可以了解。但若篇第错乱，古书就更难读了。所以篇第的审定，便成了刘氏校勘的第三步工作。

如《晏子叙录》说：

凡中外书三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除复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十五章。

又《列子叙录》说：

内外书凡二十篇，以相校除复重，定著八篇。

又《子华子叙录》说：

凡二十四篇，以相校除复重十四篇，定著十篇。

又《战国策》因中书余卷，错乱相糅，得三十三篇。可知《战国策》原来篇数无定，今本三十三篇是刘向整理校订出来的。

四　确立书名　古书历经传抄，文字讹误，在所不免，书名也相当混乱。因此，确立书名，便是刘氏校勘的第四步工作。

如《战国策书录》说：

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

可知刘向对烦杂的书名，经过对书的内容严密审察后，才把书名确定，这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五　厘定部居　校雠还包括书籍类例的区分。郑樵《校雠略》说：

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例，虽亡而不能亡。

刘向所以上奏《七略》，正是为了使学术有眉目，案图可以索骥。书有散亡，观其类例之所在，便可求之其邻。《七略》固已散失，无从考核，但我们可以从《汉书·艺文志》中见到它的大概。如《论语》一书，分为古论，鲁论、齐论（今所见者是鲁论）。诗赋分为《屈赋》、《陆（贾）赋》、《荀赋》、杂赋、歌诗五种。同是一《论语》、一诗赋，却能对之详细地从时代、从各家加以区别，可见刘氏厘定部居的细致和分类的精密了。

六　叙述源流　战国诸子，各成一家之言，若不溯其源流，究其得失，终不免有混淆之弊，使学者不知所归。所以刘氏校书，还进一步叙述其源流。

如《列子叙录》说：

> 列子者，郑人也，与郑缪公同时，盖有道者也。其学本于黄帝、老子。号曰道家者，秉要执本，清虚无为。其治身接物，务崇不竞，合于《六经》。而《穆王》《汤问》二篇，迂诞恢诡，非君子之言也。至于《力命》篇，一推分命；《扬子》之篇，唯贵放逸。二义乖背，不似一家之书。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观者。孝景皇帝时，贵黄老术，此书颇行于世。及后遗落，散在民间，未有传者。且多寓言，与庄周相类，故太史公司马迁不为列传。

当然这属于广义的校勘，因为包括了书籍的辨伪。

清孙德谦《刘向校雠学纂微》归纳刘向校书所用的方法，有二十三点：

> 备众本，一也。订脱误，二也。删复重，三也。条篇目，四也。定书名，五也。谨编次，六也。析内外，七也。待刊改，八也。分部类，九也，辨异同，十也。通学术，十一也，叙源流，十二也。究得失，十三也。撮指意，十四也。撰序

叙，十五也。述疑似，十六也。准经义，十七也。征史传，十八也。斟旧说，十九也。增佚文，二十也。考师承，二十一也。纪图卷，二十二也。存别义，二十三也。

可以说，刘向对汉成帝以前古书的整理校订，厥功甚伟。

第二节　史家校勘之始

西汉图书，在王莽之乱时，多被焚烧。光武中兴，笃好文学。明帝、章帝继位，尤重经术。石室、兰台、东观及仁寿阁，遗书旧籍，陆续收集，渐具规模，校书郎班固、兰台令史傅毅及贾逵等典掌。毅等并依《七略》而把古书分别部居，班固又据以编为《汉书·艺文志》。正史有《艺文志》或《经籍志》自此始。

刘向《别录》，刘向、刘歆《七略》，为我国目录学之祖，唐代犹存，及宋而亡。清代经各家搜集，只有兵燹之余的几篇叙录而已。至《七略》的体裁，仍可借《汉书·艺文志》而能窥见一斑。班固则又可称为二刘的功臣了。

《汉书·艺文志》虽是仿《七略》的体裁编写，但和《七略》有所不同。如《七略》有《辑略》，而《艺文志》没有。据章宗源的《隋书经籍志考证》，二者不同之处有：

一　《班志》引文与《七略》不同者　《七略》："《诗》以言情，情者信之符也；书以决断，断者心之证也。"（见《初学记·文部》和《御览·学部》）《班志》则作："《诗》以正言，义之用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

二　《班志》注较《七略》简者　如《淮南·道训》二篇，《别录》有："所校雠中《易传》《淮南·九师道训》，除复重，定著二十篇。淮南王聘善《易》者九人，从之采获，故中书著曰：《淮南九师

言》。”《班志》则简为:“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号《九师说》。”

三　《班志》无而《七略》有者　如《雅琴》:“琴之言禁也，雅之言正也，君子守正以自禁也。”(见《文选·长门赋》注)

四　《班志》书名与《七略》不同者　如《七略》作《晏子春秋》七篇，《班志》则作《晏子》八篇。又《七略》有《新语》二卷，陆贾撰，《班志》则改为《陆贾》二十二篇。

五　归类不同者　如军礼《司马礼》百五十五篇，《七略》本在《兵书略·兵权谋》中，班氏则归入《六艺略·礼类》。又《班志·兵书略》较《七略》省《伊尹》《太公》《管子》《孙子》《鹖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子》《司马法》十家，计二百七十一篇，加入《蹴鞠》二十五篇。(《蹴鞠》，《七略》本在《诸子略·杂家类》。)

六　《班志》新加入者　如书加入刘向《稽疑》一篇，小学加入扬雄《苍颉训纂》一篇，杜林《苍颉训纂》一篇，杜林《苍颉故》一篇，儒加入《扬雄所叙》(《太玄》《法言》《乐箴》)三十八篇。

第三节　《五经》刊石之始

东汉邓太后定策立安帝临朝政，自入宫掖(yè，宫掖为宫中旁舍)，从曹大家受经书，兼天文算数。昼省王政，夜则诵读，而患其谬误，惧乖典章，乃博选诸儒刘珍等，及博士议郎、四方掾吏五十余人，诣东观校雠传记。(事见《后汉书·安帝本纪》)

顺帝永和元年(136年)，诏侍中屯骑校尉伏无忌，与议郎黄景，校中书《五经》、诸子百家艺术。(事见《后汉书·伏湛传》)

灵帝熹平四年(175年)春三月，诏诸儒正《五经》文字刻石，立于太学门外。(事见《后汉书·灵帝本纪》)这就是后世所说的《熹平石经》了。石经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事见《后汉书·儒林传序》)

《蔡邕传》说：

> 建宁(灵帝年号)中，校书东观，迁议郎。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乃与五官中郎将堂谿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䃅(音密低)，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

从上面一些记载，可见校勘事业发展到西汉刘向父子广备众本以校勘，是一个飞跃；发展到东汉熹平立石经以为蓝本，又是一个飞跃。熹平石经，的确是校勘良好的工具，所以历代创建者颇多。宋王应麟《困学记闻》说：

> 石经有七：汉熹平则蔡邕，魏正始则邯郸淳，晋裴頠，唐开成(唐文宗年号)中唐玄度，后蜀孙逢吉等，本朝嘉祐(宋仁宗年号)中杨南仲，中兴高庙御书。

这是从东汉迄宋之数。若合西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元元年)王莽命甄丰摹古文《易》《诗》《书》《左传》于石及清乾隆时蒋衡所书，其数当为九了。后蜀石经，据旧《辞海》是毋昭裔所书，嘉祐石经是宋太宗时所立，和《困学纪闻》所说稍有不同。

东汉立石经的原因有三：

一　息博士弟子之争　汉代学校虽多，但太学则只有一所，为博士弟子受业所在。博士弟子受业一年后经考试授“文学掌故”“郎中”等官。考试竞争剧烈，至有行贿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私

文者。因此把《五经》刻于石碑，以息博士弟子之争。（详见《后汉书·李循传》）

二　平学者之争　汉代书籍，皆为竹简。学者若不从师，则无从书写。书籍之传播，既全赖抄写，而抄写又最易致误。故往往因一字之不同，引起学者之纷争。《五经》刻于石碑，就有标准可循。

三　统一文字　东汉去古已远，文字紊乱。加以俗儒穿凿，诡更正文，向壁虚造之字，变乱常法，以耀于世，贻误后学，莫此为甚。故诏诸儒，正定《五经》，勒成一体，刊石树立，使天下取则。

关于熹平石经的记载，经的数目和书法，《洛阳伽蓝记》《洛阳记》等所载，多所不同。但不管怎样，从石经的刻布，可见汉代君臣对校勘的重视。石经始立时，观看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巷，也足可见其影响之大。

东汉之世，熹平石经的出现，为《五经》的校勘树立了准则。在正字方面，安帝时许慎又编写了《说文解字》一书，对东汉校勘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第四节　东汉私家的校勘

郑玄的校勘　郑玄一生最伟大的事业，是注《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等，群经的校勘工作，也就做得很多。不过因为他"删繁裁芜，刊改漏失"之故，后人讥其好改经文。其实他所改的，多是确有实据，并不像后人那样任意妄改。如《毛诗·陈风·衡门》首章"可以乐饥"，郑笺解为"可以瘵饥"。《毛诗校勘记》说："笺

不云乐读为瘵者，以乐为瘵之假借，而于训诂中改其字以显之也。"《文选》王元长《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李善注："《毛诗》曰可以瘵饥。瘵音义与乐同。"唐《开成石经》亦作"可以瘵饥"。可知李善和《开成石经》均同意郑笺校改。这是郑笺中以本字破借字的例子。（"瘵"，是治病之意。）又如《毛诗·豳风·东山》："不可畏也，伊可怀也。"郑笺："伊当作繄。繄，是也。"按："伊""繄"同属影母；"伊"属脂部，"繄"属质部，是邻韵，可以通假，"伊"是"繄"的借字。这也是以本字破借字。这些都不是任意妄改。他笺《诗》，以毛为主，而间易毛字。他自己说："若有不同，便下己意。"所谓己意，实又是以三家诗（齐、韩、鲁诗）为根据的。

郑氏之学，不主于墨守成规，而主于博取众说，用自己的看法加以判断。所以他校勘所据的本子，或用古文，或用今文，或古今文兼用。如注《仪礼》，今古文并存，从今文，则注内叠出古文；从古文，则注内叠出今文。注《周礼》《礼记》《论语》，用古文。注《孝经》，多用今文说。

高诱的校勘 东汉注子书的，主要是东汉末期的高诱。我们现在所见的《战国策》《吕氏春秋》《淮南子》，都是高诱的注。其《吕氏春秋序》云：

> 此书……既有脱误，小儒又以私意改定，犹（可）虑传义失其本真，少能详之。故复依先师旧训，辄乃为之解焉。

下面举出他校勘考异的例子。如《吕氏春秋·仲春纪》：

> 善为君者，蛮夷反舌、殊俗异习者皆服之。

高诱注云：

> 东方曰夷，南方曰蛮：其在四表，皆为夷也。戎狄言语与中国相反，因谓反舌。一说南方有反舌国，舌本在前，末

倒向喉，故曰反舌。

《淮南子·地形》：

玉横（玉衡，北斗第五星）维其西北之隅。

高诱注云：

横，犹光也。横或作彭。彭，受不死药器也。

《淮南子·本经》：

昔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

高诱注云：

鬼恐为书文所劾，故哭也。鬼，或作兔。兔恐见取毫作笔，害及其躯，故夜哭。

第三章　校勘的衰落期

第一节　四部分类法之始

魏晋六朝至隋，校勘之事虽一度衰落，但从目录学的角度来看，这却是一个重要时期的开端。因为我国图书四部（即经、史、子、集）分类法，是从晋武帝泰始时期开始的。而于校勘，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魏氏代汉，采掇遗亡，藏于秘书中外三阁，秘书郎郑默考核旧文，删省浮秽，制为《中经》。晋有天下，乃习成规，复修文事。泰始间以著作郎荀勖（xù）领秘书监，乃与中书令张华，依刘向《别录》，整理古籍，覆校误书十余万卷（见《图书集成·经籍典》三十七引），便据《中经》另著《新簿》，总括群书：一曰甲部，纪《六经》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书；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虽还没有经、史、子、集之名，但为隋代分为经、史、子、集之先河。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汲冢书的校勘整理。

第二节　汲冢书的校理

什么是汲冢书？其校理的情况怎样呢？

《晋书·武帝本纪》说：

咸宁五年（279年）十月戊寅，汲郡人不准，掘魏襄王冢，得竹简小篆古文十余万言，藏在秘府。

汲郡是战国魏地，郡治在今河南汲县西南。汲冢书即在晋初汲郡出土的地下文物。

又《荀勖传》说：

咸宁初，得汲郡冢中古文竹书。诏勖撰次，以为《中经》，列在秘书。

叙述得更详细一点的是《束皙传》：

太康二年（281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厘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大凡七十五篇。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诠次。武帝以其书付秘书，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皙在著作（在著作郎官职），得观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证，迁尚书郎。

汲冢书出土之年有三说：一是咸宁五年，一是太康二年（二说见上），一是太康元年（见杜预《左传后序》）。阎若璩《困学纪闻五笺集证》云：

冢盖发于咸宁五年冬十月，官辄闻知；明年太康改元，三月，吴平，预始得知；又二年，始见其书。故《序》曰："初藏在秘府，余晚见之。"此与情事颇得。

参加对汲冢书校勘整理的，除了上面所说的荀勖、束皙外，还有卫恒、王接。（见《晋书·王接传》）

汲冢竹简的样子和校理的情况，荀勖的《穆天子传序》说得比较具体：

古文《穆天子传》者，太康二年汲县民不准盗发古冢所得

书也。皆竹简素丝编。以臣勖所考定古尺度，其简长二尺四分，以墨书，一简四十字。汲者，战国时魏地也。……汲郡收书不谨，多毁落残缺。虽其言不典，皆是古书，颇可观览。谨以二尺黄纸写上。请事平（指八王之乱平定以后）以木简书及所新写并付秘书缮写，藏之《中经》，副在秘阁。

可知当时校勘整理后缮写的本子，有正本，有副本。

校勘整理的成果，当时对汲冢书校勘整理得比较完善的书，除《穆天子传》外，尚有《周易》二卷，《纪年》十二卷（《晋书·束皙传》作十三卷），《琐语》十一卷，皆由荀勖以隶书写上。《穆天子传》和《竹书纪年》，收于《汉魏丛书》里面。

其余经校理过的汲冢各书的篇数和大略内容分述如下：

《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

《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

《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

《公孙段》，二篇。说公孙段与邵陟论《易》。

《国语》，三篇。言晋、楚。

《事名》，三篇。似《礼记》，又似《尔雅》、《论语》。

《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是著书者姓名。

《琐语》，十一篇。诸国卜梦妖怪相书。

《梁丘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数，次言丘藏金玉事。

《缴书》，二篇。论射弋法。

《生封》，一篇。谈帝王所封。

《大历》，二篇。邹子谈天之类。

《图诗》，一篇。画赞之属。

《杂书》，十九篇。述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和叙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

残毁者，七篇。简书折坏，不识名题。

这是当时诸儒穷究深讨，使久埋残缺的地下文物，得以重见于世，其功不可湮没。

又齐高帝建元元年（479年），襄阳有人盗发古墓，相传为楚王冢，获得了大量宝物，有玉屐、玉屏风及竹简书、青丝编。简广数分，长二尺，皮节如新。盗以火把自照。后有人得到十多简，送给抚军王僧虔。王僧虔审视后说：是解释科斗文《考工记》的，是《周官》（《周礼》）的缺文。（事见《南齐书·文惠太子传》）可惜在兵火之后，没有人管，令这批可贵的出土简书，湮没无闻，否则可能会补充《周礼·冬官·考工记》中部分的缺文。以此来对比西晋初出土的经官府保护和诸儒校勘整理的汲冢书，我们特别感到西晋初官府和诸儒工作成绩的可贵。

第三节　衰落之迹

由魏至隋，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在这三百几十年的历史中，竟有十二个朝代（"五胡"不在内），其战乱频仍、社会动荡的情况，可以想见。稽古右文的事，当然政府更管不了。所以古籍的校勘，便呈衰落。除了汲冢书，如果说还有些校勘，也不过是例行故事而已。

宋元嘉（文帝年号）以来，晋代旧籍，有东西二库，既不寻检，主者又不关怀，任从简册狗牵鼠啮，雨湿沾烂，解散于地，又无扃滕。（见《沈休文集》）总之宋齐两代，簿籍大坏，文字错乱不堪。到了梁代，沈约才上表，详论古籍整理的迫切需要和整顿之法，以期重见古籍本来的面目。虽其成绩已不可考，但在战祸丧乱、文事失修之余，还如此恳切关怀古书的整理校勘，也是

难能可贵了。

以上是南朝的情况。北朝历代人君虽也诏令儒臣校勘群书，但也收效甚微。可以谈谈的，是北魏宣帝时，孙惠蔚迁秘书丞，入东观后，见到了典籍紊乱缺亡，上疏请派官校勘整理。（见《北齐书·本传》）孝明帝神龟元年（518年）车骑大将军崔光又上表请校勘石经，补其残缺，诏许之。及灵太后废，此事遂寝。而且到了尔朱之乱，秘府图籍，更是散落民间了。

及至北齐，文宣帝天保七年（556年），诏令校定群书，供皇太子阅览。被召的有满氏樊逊、冀州秀才高乾和、瀛州秀才马敬德、许散愁、韩同宝、洛州秀才傅怀德、怀州秀才古道子、广平郡孝廉李汉子、渤海孝廉鲍长暄、阳平郡孝廉景孙、前梁州府主薄王九元、前开府水曹参军周子深等十一人。（见《北齐书·樊逊传》）

北齐采纳樊逊的建议，按照刘向搜集中府和私家藏书，藉众本以校勘整理群书。因而所校经史三千余卷，殆无遗缺。直至北齐文帝天统、宣帝武平年间，犹校写不辍，可谓本期最盛之时。

后周明帝，幼而好学，即位（558年）后集公卿以下有文学者八十余人，于麟趾殿刊校经史。当时参与校刊可考者有：元伟，字猷道；萧㧑（音挥），字智遐；韦孝宽，名叔裕，以字行；萧大圜（音员或环），字仁显；宗懔，字元懔；王褒，字子渊；姚最，字士会。

到了隋代，文帝虽也曾诏国子博士萧该与何妥正定经史，但以各执己见，久而不就，不久即作罢论。（见《隋书·萧该传》）炀帝即位（605年），增秘书省官员百二十员，并以学士补充。但其成绩，只有几部目录而已。隋代藏书，号称三十七万多卷，可惜无人校勘整理。

第四节　目录的编纂

南北朝至隋，书籍校勘虽然衰落，但部目类次之分，值得称述。

自魏晋以下，著述日繁，所有新书，已非《七略》所能包括，所以要另行分类。

宋武称帝(420年)，所有图籍才四千卷。元嘉八年(431年)，秘书监谢灵运造《四部目录》。后废帝元徽元年(473年)，秘书丞王俭依《七略》撰《七志》：一曰经典志，纪六经、小学、史记、杂传；二曰诸子志，纪古今诸子；三曰文翰志，纪诗赋；四曰军书志，纪兵书；五曰阴阳志，纪阴阳、图纬；六曰艺术志，纪方技；七曰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其道佛附见。合九条，凡三十卷。(《宋书·王俭传》作四十卷，《图书大辞典》作七十卷。)又撰定《元徽四部书目》。

齐武帝永明中，秘书丞王亮，监谢朏(音匪)又造《四部书目》。

梁初，秘书监任昉(音仿)以秘阁四部篇卷纷杂，便亲自校订，成《四部书录》，自此篇目始定。又与殷钧撰《文德殿四部书目》四卷。其术数之书，更为一部。使奉朝请祖暅撰其名，叫《五部目录》。

梁武帝普通中，处士阮孝绪，笃好典籍，博采宋、齐以来王公家的书记，参校官簿，更为《七录》：一曰经典录，纪六经；二曰纪传录，纪史传；三曰子兵录，纪子书；四曰文集录，纪诗歌；五曰术技录，纪数术；六曰佛录；七曰道录。这是私家编图书目录之始。

北魏宣帝时，秘书丞孙惠蔚，见典籍新旧混杂，首尾不全，请依前丞卢昶所撰《甲乙新录》裨补残缺，损并有无，以为定本。又编成《缺书目录》一卷，以便搜求补足。

陈文帝天嘉六年(565年)，收集遗书，考其篇目，撰《寿安殿四部目录》。

隋代南北统一。秘书监牛弘奏请搜访遗逸，著《四部书目》四卷。文帝开皇十七年(597年)，秘书丞许善心以秘藏图籍，尚多淆乱，乃仿阮孝绪《七录》更制《七林》，各为总叙，冠于篇首。又于部录之下，阐明作者之意，区分其类例。炀帝即位(605年)，命秘书监柳顾言等整理嘉则殿藏书，清除重复杂乱，得正御本三万七千余卷，编成《正御书目录》九卷。

三代之时，书籍由官师执掌。三代以后，师儒习业，分而为二，以致各家自己著书立说。汉初诸儒，仍有师承关系，所以《七略》足以分其流别。魏晋以还，师法不立，其书已不能依九流区分，所以另行编次，以求容纳。这是由《七略》发展为《四部》的主要原因。

第五节　私家的校勘

私家校勘较精的有西晋的杜预和北齐的颜之推。

杜预(265—274年)　杜预晚年，穷究经典，以为当时学者对《左传》大抵转相祖述，错综经文，于丘明之传，有所不通者，便皆没而不说，更广引《公羊》《谷梁》以自乱。因此杜预就自立一体："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经之条贯，必出于传；传之义例，总归于(发)凡。"推变例以正褒贬，简(《左传》所无，则有选取)二传而去其异端，以从丘明之志。并举刘子骏(歆)、贾景伯(逵)、许

惠卿(淑)、颖子岩(容)诸儒的不同看法，以见其同异。又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成《经传集解》三十卷。更别集诸例及地名、谱第（世族谱第)、历数，相与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显其异同，从而释之，名曰《释例》（见《春秋左氏传序》)。《左传》一书，自此始离《公》《谷》而独立。

关于历数，古今论述《春秋》的，或用黄帝以来各种历法，来套经传朔日，积少成多，搞到弦望晦朔都不合了，便改历以迁就，无异削足适履。所以杜预并考古今十历，列其得失之数，更据经传要义及其失闰者，考订日辰晦朔，成《经传长历》一书，以指出诸经传的失闰及文字之谬误(见《晋书·律历志下》)。此外又作《世族谱》《盟会图》，以考事迹。

杜预一生的精力，尽于《左传》一书，所以他对《左传》文字的校勘，倍见精密。如：

> 晋人不得志于郑，以诸侯复伐之。十二月，癸亥，门(围)其三门，闰月，戊寅，济于阴阪，侵郑。(《左传·襄公九年》)

杜预注：

> 以长历参校上下，此年不得有闰月戊寅，戊寅是十二月二十日。疑“闰月”当为“门五日”。“五”字上与“门”合为“闰”，则后学者自然转“日”为“月”。晋人三番四军，更攻郑门，门各五日。晋各一攻，郑三受敌，欲以苦之。癸亥去戊寅十六日。以癸亥始攻，攻辄五日，凡十五日。郑故不服而去，明日戊寅，济于阴阪，复侵郑外邑。

因他对春秋历法，深有研究，才能从字之形误，看出问题，而加以校正。

颜之推 北齐人，颜师古之祖，著《颜氏家训》。今录其《书证》中校勘数则：

《诗》云："有杕之杜。"（《唐风·杕杜》）江南本并木傍施。《大传》曰："杕，独貌也。"徐仙民音徒计反。《说文》曰："杕，树貌也。"在木部。……而河北本皆为"夷狄"之"狄"，读亦如字，此大误也。

这是形误。

"也"，是语已及助句之辞，文籍备有之矣。河北经传，悉略此字，其间字有不可得无者。至如"伯也执殳"，"于旅也语"，"回也屡空"，"风，风也，教也"，及《诗传》云"不戢，戢也"，"不傩，傩也"，"不多，多也"，如斯之类，倘削此文，颇(多)成废缺。……

这是据语法以校脱文。

"簡策"字竹下施"朿"(七赐反)。末代隶书，似"杞宋"之"宋"。亦有"竹"下遂为"夹"者。犹如"刺史"之旁应为"朿"，今亦作"夹"。徐仙民《春秋礼音》，遂以"筴"为正字，以"策"为音，殊为颠倒。《史记》又作"悉"字，误而为"述"；作"妬"字，误而为"姤"(音构)。

这是一般性的正字、正读。

太史公《记》曰："宁为鸡口，无为牛后。"此是删《战国策》尔。按延笃《战国策音义》曰："尸，鸡中之主，从牛子。"然则"口"当为"尸"，后(後)当为从(従)。俗写误也。

这是通过词义训诂以校勘。

太史公论英布曰："祸之兴，自爱姬生于妒媚，以至灭国。"又《汉书·外戚传》亦云："成结宠妾妒媚之诛。"此二"媚"并当作"娼(mào)"。娼亦妒也。义见《礼记》《三苍》。且《五宗世家》亦云："常山宪王后妒娼。"王充《论衡》云："妒夫娼妇，生则忿怒斗讼。"益知"娼"是"妒"之别名。原英布之诛，为

意贲（愤）赫（怒）尔，不得言“媚”。

这是通过同义词的训诂以校勘。

《史记·始皇本纪》："二十八年，丞相隗（音獒）林、丞相王绾等，议于海上。"诸本皆作"山林"之"林"。开皇二年五月，长安民掘得秦时铁称权，旁有铜涂，镌（juān）铭二所。其一所曰："廿六年，皇帝尽屏（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余被敕写读之，与内史令李德林对见。此称权今在官库。其丞相"状"字，乃为"状貌"之"状"，"爿"旁作"犬"。则知俗作"隗林"非也。当为"隗状"尔。

这是利用地下出土文物校勘。

《汉书》云："中外禔福。"字当从示。禔，安也，音匙匕（bǐ，饭勺）之匙。义见《苍雅》、《方言》。河北学士，皆云"如此"。而江南书本，多误从手。属文者对耦，并为提挈之意，恐为误也。

这是对比不同版本，校勘误字。

《后汉书》酷吏樊晔，为天水郡守。凉州为之歌曰："宁见乳虎（产子之虎）穴，不入晔城寺。"而江南书本，"穴"皆误作"六"。学士因循，迷而不寤。夫虎豹穴居，时之较者（是当代明摆着的）。所以班超云："不探虎穴，安得虎子？"宁当论其六七耶？

这也是对比不同版本，校勘误字。

古乐府歌词，先述三子，次及三妇，妇是对舅姑之称。其末章云："丈人且安坐，调弦未遽央。"古者子妇供事舅姑，旦夕在侧，与儿女无异，故有此言。"丈人"亦长老之目。今世俗犹呼其祖考为"先亡丈人"。又疑"丈"当为"大"。北

间风俗，妇呼舅为“大人公”。“丈”之与“大”，易为误尔。

以方言校勘。

古乐府歌百里奚词曰：“百里奚，五羊皮。忆别时，烹伏雌，吹扊扅（音掩移）。今日富贵忘我为！”“吹”当作“炊煮”之“炊”。案：蔡邕《月令章句》曰：“键，关牡也。牡，所以止扉也；或谓之剡移。”然则当时贫困，并以门牡木作薪炊尔。《声类》作“扊扅”。

引古训诂书以校勘。

或问：“《山海经》，夏禹及益所记，而有长沙、零陵、桂阳、诸暨。如此郡县不少，以为何也？”答曰：“史之缺文，为日久矣。加复秦人灭学，董卓焚书，典籍错乱，非止于此。譬如《本草》，神农所述，而有豫章、朱崖、赵国、常山、奉高、真定、临淄、冯翊等郡县名，出诸药物。《尔雅》，周公所作，而云“张仲孝友”。仲尼修《春秋》，而经书“孔丘卒”。《世本》，左丘明所书（此说出皇甫谧《帝王世纪》），而有燕王喜、汉高祖。《汲冢琐语》，乃载秦望碑。《苍颉篇》，李斯所造，而云“汉兼天下，海内并厕（杂），豨黥韩覆，畔讨灭残。”

这是辨伪。

可知颜之推学识广博，校勘面宽，所用材料丰富，方法精确。在这近四百年的校勘衰落期中，杜预、颜之推确是不可多得的人物。

第四章　校勘的复兴期

第一节　藏书之盛

唐代　唐初有书八万卷。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置修文馆于门下省（九年改为弘文馆），掌校正图籍。秘书监令狐德棻以大乱之后，经籍亡散，奏请访求遗书，重加钱帛，增置楷书缮写，不数年间，群书毕备。（见《唐会要·令狐德棻传》）太宗贞观三年（629年），以魏征为秘书监，命写四部群书，将藏内府。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书者百员为书手，又置雠正三十员。会征徙他职，又诏虞世南、颜师古踵领。高宗朝命儒臣继续检校。玄宗开元五年（717年），诏于乾元殿东厢写四部书，又诏秘书省司经局，昭文、崇文二馆更相检校，采天下遗书，补充缺文。四部书成，百官观览，无不骇其广博。时玄宗幸东都，及还，迁书东宫丽正殿，敕令儒臣写四库书。不久成《群书四部录》二百卷。九年（721年）十一月十三日上呈玄宗，著录凡二千六百五十五部，四万八千一百六十九卷。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序例。自后毋煚（jǐng）又把《群书四部录》略为四十卷，名《古今书录》，凡四十五家，三千六十四部，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开元十一年（723年），置修书院于著作院。于京师大明宫光顺门外和东都明福门外，皆创立丽正修书院（十三年改名集贤书院）。两都各聚书四部，以甲乙丙丁为次，列经史子集四库，共十二万五千九百六十卷。其本有正有副，皆

以益州麻纸书写，轴带帙签，皆异色以别之。经库：钿(diàn，镶)白牙轴，黄缥(piǎo，帛)带，红牙签；史库：钿青牙轴，白缥带，绿牙签；子库：雕紫檀轴，紫带，碧(深绿)牙签；集库：绿牙轴，朱带，白牙签。安禄山之乱，尺简不存。至文宗太和元年(827年)，复诏秘阁搜集，四库之书稍完，分藏于十二库。直至开成(836年)，校写不辍，藏书至五万六千余卷。后增至七万余卷。僖宗广明(880年)黄巢起义时，图书散失殆尽。经省司购募，只及二万余卷。至昭宗时，只存一万八千余卷了。

宋、元、明 宋代雕板盛行，书籍流传甚广，故官私之藏，较前代更盛。太祖建隆初（960年），置昭文、集贤和史馆三馆，有书万余卷。其后削平诸国，尽取其图籍补充三馆，自此群书渐备。太宗即位（976年），于左昇、龙门东北另建三馆，壮丽甲于内庭，名崇文院，尽迁旧馆之书于其中：东廊为昭文书库，南廊为集贤书库，西廊为史馆书库。史馆书库又分经史子集四库。六库书籍，正副本凡八万卷。策府之文，自此焕然一新。太宗端拱元年（988年），又诏分三馆之书万余卷，别为书库以藏，名曰秘阁。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四月，王宫大火，延及崇文、秘阁，书籍多成灰烬。其仅存者，迁于右掖门外，谓之崇文外院。缺误之书，借太清楼本补写，选官详覆校勘，常以参知政事一人领之。仁宗天圣九年（1031年）冬，新建崇文院馆阁，命翰林学士张观、知制诰李淑、宋祁详审馆阁诸书，删除复重，补写差漏，仿开元《四部录》例为《崇文总目》。庆历元年（1041年）书成，著录凡三万六百六十九卷。徽宗政和七年（1117年），召秘书省官，以所访遗书，讨论撰次，扩充《总目》，叫《秘书总目》。宣和四年(1122年)，诏购士民藏书，以其所秘而未见之书，足备观采者，仍命官议加崇奖，录竟给还。又因三馆藏书，年深日久，简篇脱

落，乃命建局以校补文籍为名，设官总理，募工缮写，一置宣和楼，一置太清楼，一置秘阁。及靖康之难，馆阁藏书，又荡然无存了。南宋迁都临安，高宗又诏建秘书省于国史院之右，搜访遗缺，屡优献书之赏，于是四方之藏稍出，馆阁之储日富。孝宗淳熙四年(1177年)，按秘书少监陈骙(kuí)建议，又前后搜访，部帙渐广，仿《崇文总目》新编书目，有书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年)，续编书目，又得一万四千九百四十三卷。以上只是《崇文总目》等书目所载。秘府之藏，实际远不止此。据《宋史·艺文志》所载，宋代秘府之藏，凡九千八百十九部，十一万九千九百七十二卷。

元起朔漠，未遑文事。太宗八年，始用耶律楚材言立经籍所于平阳，编集经史。世祖至元四年（1267年）徙置京师，改名宏文院。九年(1272年)，置秘书监，掌历代图籍，并阴阳等禁书。及大兵南下，收宋秘书省禁书图籍。丞相伯颜入临安，又遣郎中孟祺接收宋秘书省国子监国史院学士院等图书，由海道舟运大都。所以元代奎章院、崇文院的藏书，不下于历朝。

明太祖既克建康，龙凤丙午（1366年)，即命有司访求书籍。元都既定，即命大将军徐达尽收秘书监图书，归之于南。成祖永乐四年（1406年)，复命礼部遣使购求遗书。及建都北京，复命陈循取南京内府文渊阁所贮古今所有书籍，自有一部至有百部者，各取其一，送至北京，得一百柜，督舟十艘，载以赴京。仁、宣二世，天下承平，文物益盛。宣宗始命杨士奇等辑《文渊阁书目》。仁宗宣德八年（1433年)，命少傅杨士奇、杨荣，于馆阁择能书者数十人，取《五经》《四子》（《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及《说苑》之类，各录数本，分贮广寒、清署二殿及琼花岛，以备观览。当时吏民私家藏书，或捐所有，或益所无。秘书内府藏书之丰富，为历代之冠。至崇祯之末，因战乱，图书散失惨重，不在话下。

但总的说来，宋、元、明因雕板盛行，书籍流布甚广，因而这段时期中央的藏书，都远较前代丰富。

第二节　贞观《五经正义》

隋代虽对书籍购求不辍，嘉则殿的藏书，号称三十七万余卷，但整理校勘乏人，糅杂错乱，无所取正。唐代隋有天下，以经义取士。太宗又锐意传习经籍，但以《五经》去圣久远，文字多所舛误，而且笺注到唐代又多所不明，都影响传习。因于贞观四年（630年）诏孔颖达、颜师古等撰《五经》义疏，本名《五经义赞》，后奉诏，改名《五经正义》（见《旧唐书·太宗本纪·贞观六年》）。书成之后，命左仆射房玄龄集诸儒群议。于是各执所习，共相问难。颜师古辄引晋、宋旧文，逐条作答，人人叹服。因于七年（633年）十一月丁丑，颁之天下，学者赖之。

《五经正义》博取众说，极为详尽，但卷帙浩繁，衍文误字，在所不免。因于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复诏中书、门下与国子三馆博士，及弘文馆学士，作第二次考正。由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右仆射张行成、侍中高季辅负责校正。第二年，又诏长孙无忌详加刊正。四年三月，始颁之天下，以为定式，并令每年"明经"，依此考试。凡《易》十六卷，《书》二十卷，《诗》四十卷，《礼》一百二十卷，《春秋》三十六卷。

第三节　《开成石经》

经籍文字，既患其有脱文、衍文、误字、错简，又患其字体不合规范，所以汉代有石经之立，以垂范后世。唐代则有壁经、

石经，为后学准则。

壁经　代宗大历十年（775年），上以《五经》文字，讹误特多，因诏委国子儒官勘校经本，送尚书省。司业张参乃与二三儒者，分经考核，辨齐鲁之音，考鱼鲁之失，又以前古字少，后代稍益之故，经典字多假借，陆德明《经典释文》，自南徂北，遍通各家之学，分析音训，特别详备，因以之取正。既毕，乃以所校正的经书，书于论堂东厢之壁，是为壁经。

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祭酒齐皞、太常博士韦公肃，以壁经字迹剥落，再新壁书，惩前土涂不耐久，乃析坚木负墉而排列，制如版牍，平如粉泽。申命国子能通书法者缮写。（见刘禹锡《国学新修五经壁记》）

《五经文字》　《五经》虽已书壁，但还是担心日久之后，会污乱失真。于是复命孝廉生颜传经收集疑文互体，以《说文》体包古今，先得六书之要，故取以为正。其有未备者，则求之晋吕忱的《字林》。又古体难明，众人不能辨者，则以《熹平石经》之余，比例为助。又以石经湮没，所存者寡，则通以经典及《释文》相承隶省，引而伸之。复以近代字样，多依四声，传写之后，偏旁渐失，则采《说文》《字林》诸部，以类相从，成《五经文字》，凡一百六十部，三千二百三十五字，分为三卷。非经典文义之所在，皆不集录。于大历十一年（776年）上之。这是使《五经》文字规范化。

《开成石经》　文宗太和元年（827年），宰相领祭酒郑覃，以经籍文字错漏，博士浅陋，不能订正，建议与硕学鸿儒，合力校正，依汉旧事，镂石太学，为万世法。诏可。覃乃表周墀、崔球、张次宗、孔温业等，校正其文字。七年（833年）二月五日，敕唐玄度覆定石经字体。十二月，敕于国子监讲堂两廊，创立石九经。并《孝经》《论语》《尔雅》，共十二经，一百九十九卷，字样四十卷，开成二年

(837年)，石经始成。其所以缺《孟子》者，是因据《释文》之例。

对《开成石经》之价值，皮锡瑞的《经学历史》说：

> 汉熹平刊石经之后，越五百余年而有唐《开成石经》，此一代之盛举，群经之遗则也。……自《熹平石经》散亡之后，惟《开成石经》为完备，以视两宋刻本，尤为近古。虽校刊不尽善，岂无佳处？……顾炎武考出唐石经误字甚夥，实不尽属开成原刻。一经乾符(僖宗年号)之修造，再经后梁之补刊，三经北宋之添注，四经尧惠之谬作，其中误字，未可尽咎唐人。精审而详究之，亦治经之一助也。

因唐《开成石经》原文最为近古，又有十二经，故清石经多从之。

《九经字样》 文宗既诏许镌刊石经，郑覃乃与诸儒校正缪误。文宗太和七年（833年），又令翰林勒字官唐玄度复校字体。玄度乃以《五经文字》为准，详加刊正。复以旧字年深日久，点画参差，传写相承，微致讹误，故先依样参详改正。又诸经别有疑缺，及旧字样未载者，总据《说文》，取其适中，撰成《新加九经字样》一卷，凡七十六部，四百二十一字。又因字之偏旁上下，本部所无者，另纂为《杂辨部》以统之，附于《五经文字》之后。于开成二年(837年）上之。

综上所述，可知唐代石经，其始是壁经，后以土涂不耐久，改为书木，直至文宗之世，才由郑覃奏请仿汉之故事，镂石太学，成为《开成石经》。

第四节 雕板与活字印刷

雕板之始 据《国史志》、朱翌《猗觉寮杂记》和柳玭(音频)《家训序》，雕板始于唐末益州。《家训序》说：

> 中和(唐僖宗年号)三年(883年)癸卯夏，銮舆在蜀之三年也，

余为中书舍人，旬休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古算法名）五纬（算命之书）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板印纸，浸染不可晓。

《国史志》说：

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术数小学字书。

至印佛经，据英国印度政府之匈牙利人斯坦因于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在敦煌石室所发现的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年）四月十五日印之《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则雕板在咸通以前已有。

但据陆深《河汾燕闲录》所记，则雕板隋文帝时已有：

隋文帝开皇三年（593年）十二月八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造。

又《敦煌石室书录》说：

大隋《永陀罗尼本经》上面左有施主李和顺一行，右有王文治雕板一行，宋太平兴国五年，翻雕隋本。

中国的雕板事业，自当以此为始。不过用雕板刊印《五经》，如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八所说，则是开始于五代的冯道罢了。

经书雕板之始　雕版虽始于隋，唐代尚未盛行，至五代才风行一时，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年）二月，丞相冯道、李愚，请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刻板印卖。因诏国子监校刻《九经》，广颁天下。诏曰：

宜令国学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开成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句度抄写注出，仔细勘读。然后召雇能雕字匠人，各部随帙刻印板，广颁天下。如诸色人要写经书，并须依所印敕本，不得使杂本交错。（见《册府元龟》）

四月，敕差太子宾客马缟、太常丞陈观、太常博士段颙、路航、尚书屯田员外郎田敏，充详勘官，兼委国子监于诸色选人中，召

能书者，端楷写出，旋付匠人雕刻，每日五纸。

后汉隐帝乾祐元年（948年）闰五月，国子监奏现在雕刻《九经》内，有《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四经，未有印板，今欲集学官考校四经。上从之。

后周太祖广顺三年（953年）六月丁巳，尚书左丞兼判国子监事田敏进《印板九经书》《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及《尔雅》各二部，一百三十册。

《九经》雕板，自后唐明宗长兴至此，已历四朝七主（后唐明宗、后帝、后晋高祖、出帝，后汉高祖、隐帝，后周太祖），凡二十一年（932—953年）才印刻完。自此以后，学者读经无笔札之劳了。

活字印刷 雕板印刷，肇自隋初，行于五代，精于宋朝。然雕刻印书，一页一板，一书板片，动辄千百，刻镂极费时日，宋代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方便多了。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八说：

> 庆历（1041—1048年）中，有布衣毕昇为活板。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蜡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熔，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一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

到了元代，又有王祯的《活字印书法》。其法是：

> ……今又有巧便之法：造墨板作印盔，削竹片为行，雕板木为字，用小细锯锼（sōu）开，各作一字，用小刀四面修之，比试大小高低一同。然后排字作行，削成竹片夹之。盔字既满，用木榍（屑）榍之使坚牢。字皆不动，然后用墨刷印之。（此文附武英殿聚珍版书《农书》后）

毕昇发明的活字，元人叫它“瓦字”。王祯《农书》所提出的活字是木字，元代的活字后又改用锡字。元代的印刷术传至朝鲜后，朝鲜又改用铜字。明代的活字印刷术也用铜字。现代则盛行铅字。由瓦字发展到铅字，经历了八、九百年。

第五节　宋代的校刻

赵宋承唐之旧，以《五经》《三史》列于科举，以之取士。所以对两书的校勘，特别注重。而且经书从五代离乱以来，编帙散失。其幸存者，亦难免不无讹舛。所以宋代君臣上下，无不努力于经史的校刊。

经部　太宗端拱元年(988年)，敕令司业孔维等校正孔颖达的《五经正义》，着国子监镂板刊行。当时参与校勘的，大都是博通经义之士。现将各经校勘者及成板年月列后：

《易》校勘者：孔维等四人。详校者和再校者：李说等六人。成版：端拱元年十月。

《书》校勘者、详校者、再校者：李说等六人。成版：端拱二年十月。

《春秋》校勘者：孔维等二人。详校者：王炳等三人。再校者：邵世隆。成版：淳化（太宗年号）元年十月。

《诗》校勘者：孔维等五人。详校者：毕道昇等五人。再校者：李觉等五人。成版：淳化三年四月。

《礼记》校勘者：胡迪等五人。详校者：李至等。再校者：纪自成等七人。成版：淳化五年五月。

淳化五年(994年)，判监李至上言：《五经正义》尚有舛误，宜加刊定，杜镐(hào)、孙奭、崔颐正，苦学强记，请令之覆校。至



道（太宗年号）二年(996年)，又请命礼部侍郎李沆(háng)校理，杜镐、吴淑及直讲崔偓佺(wòquán)、孙奭、崔颐正校正。咸平(真宗年号）元年(998年)正月丁丑，刘可名复上言：诸经板本多误。上令颐正详校。可名又奏《诗》《书》差误事。二月，奭等改正九十四字。二年(999年)，沆预政，复命祭酒邢昺代领其事，以舒雅、李维、李慕清、王涣、刘士元预其事。又以赵安仁有《苍》《雅》之学，奏留书板，逾年而毕。至此，《五经正义》的校核才算完成。

和《五经正义》同时校刻的，有《七经义疏》。淳化五年(994年)判监李至上言：《五经书疏》已刊行，惟《二礼》《三传》《孝经》《论语》《尔雅》七经义疏未备，岂副仁君垂训之意？今直讲崔颐正、孙奭、崔偓佺皆励精强学，博通经义，望加令校勘，以备刊刻。上从之。又引吴淑、舒雅、杜镐检正讹谬，至与沆总领而裁处之。咸平三年(1000年)，命国子祭酒邢昺代领其事，以杜镐、李维、孙奭、李慕清、王涣、崔偓佺、刘士元预其事。凡贾公彦《周礼疏》《仪礼疏》各五十卷，《公羊疏》三十卷，杨士勋《谷梁疏》十二卷，皆校旧本而成。《孝经》取元行冲疏，《论语》取梁皇侃疏，《尔雅》取孙炎、高琏疏，约而修之，又二十三卷，共百六十五卷。翌年九月丁亥，表上之。赐宴国子监，昺加一阶，余迁秩。十月九日，命摹印颁行，朝野皆以之为依归。

《七经义疏》之外，对陆德明的《经典释文》，自周至宋，亦屡经校正，雕印颁行。

周显德（周世宗年号）二年(955年)，诏刻序录《易》《书》《周礼》《仪礼》四经《释文》，皆由田敏、尹拙、聂崇义校勘。自此相继校勘，《礼记》《三传》《毛诗》并拙等校勘。

建隆三年(962年)，判监崔颂等上新校《礼记释文》。唐陆德明《尚书释文》用古文，太祖命判国子监周惟简等重修。开宝五年

(972年)，诏翰林学士李昉与知制诰李穆、扈蒙校定《尚书释文》，周惟简与陈鄂重修，诏并刻板颁行，名《开宝新定尚书释文》。又陈鄂与姜融等四人，校《孝经》《论语》《尔雅》等《释文》上之。景德（真宗年号）二年(1005年)，命孙奭、杜镐校定《庄子释文》及详定《尔雅释文》。仁宗天圣八年(1029年)，雕版新定《释文》。自此，经书校勘，成就卓著。

史部 宋代和前代不同，不只重视对经书的校勘，也重视对史书的校勘。

太宗淳化五年(994年)五月，诏选官分校《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杜镐、潘谨、舒雅、吴淑校订《史记》，朱昂再校。陈充、阮思道、尹少连、赵况、赵安仁、孙可校《两汉书》。真宗咸平(998—1003年)中，以校勘未精，命陈尧佐等覆校《史记》。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任随等上覆校《史记刊误文字》五卷。又命刁衎(kǎn)、丁逊等三人覆校《两汉书》。逾年上覆校《前后汉书板本刊正》六卷，共三千余字。仁宗景祐二年(1035年)，秘书丞余靖上言："国子监所收《史》《汉》本，讹误极多，请行校正。"诏翰林学士张观、知制诰李淑、宋祁、直讲王洙，及余靖校勘。靖等于是尽取三馆（昭文、集贤、史馆）诸本及先儒注解训传、《说文》《字林》之类数百家之书以相参校，凡所是正增损者数千言。逾年上之，称《新校史记前后汉书》。靖等又自录其雠校之说，别为《三史刊误》四十五卷。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复命秘书丞陈绎校《前汉书》，诏参政欧阳修看详。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参政赵抃(biàn)进新校《汉书》印本五十册，及陈绎所著《是正文字》七卷。

《三史》以外，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十月，校成《三国志》《晋书》《唐书》，皆镂板刊印。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六月辛酉，复出禁中所藏《南北史》《隋书》付崇文院校刊。四年(1026年)始毕。

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八月，以《宋》《齐》《梁》《陈》《魏》《北齐》《周书》，舛谬亡缺，复命馆职雠校。曾巩等以秘阁所藏多误，不足凭以是正，请诏天下藏书之家，悉上异本，七年(1062年)始集，诏崇文院校定。英宗治平(1064—1067年)中，巩校《南齐》《梁》《陈》三书上之，刘恕等上《后魏书》，王安国上《周书》。徽宗政和(1111—1117年)中始皆毕，颁之学宫，然民间传者尚少。靖康之乱，中原沦陷，南北朝各史书几亡。高宗绍兴十四年(1144年)，井宪孟为四川漕，始檄诸学官求当时所颁本。时四川五十余州，皆不被兵，颇有存者，然往往亡缺不全，收合补缀，独少《后魏书》十余卷。最后得宇文季蒙家本，偶有所缺者。于是《七史》遂全，因命眉山刊行。

总之，《史记》《两汉书》《三国志》备于晋初。《晋书》及南北朝诸史皆定于唐。然当高宗之世，犹存内府，既无刻本，流传者少。故学者所习，限于《三史》和《三国志》而已。宋仁宗时，始出禁藏《隋书》，付崇文院雕板，仁宗嘉祐中，并《梁》《陈》等史，次第校刻。其工盖至英宗方粗就。然其中如《魏书》以学者陋之而不习，亡佚不完者无虑三十卷，《北齐书》亦多缺者，《宋书》又缺第四十六卷，盖皆以《南北史》补之。其后又改刘昫(xù)《旧唐书》为《新唐书》，改薛居正《五代史》为《五代史记》，从此才有了《十七史》。

宋代校史，工程浩大。故当日校史之臣，各题名于卷末，其可考者有：宋绶，字公垂；丁宝臣，字元珍；郑穆，字闳(hóng)中；钱藻，字醇老；孙洙，字巨源；孙觉，字莘老；曾巩，字子固；刘攽(bān)，字贡父；刘恕，字道原；安焘，字原卿；范祖禹，字淳夫；王安国，字平甫；林希，字子中。

医书 除校刊经史外，宋代还以校刊医书为最著。仁宗天圣四年(1026年)，命集贤校理晁宗慤、王举正等校定《黄帝内经·素

问》《巢氏病源候论》，于五年四月，命国子监摹印颁行。此为校医书之始。

仁宗景祐二年（1035年），又置校正医书局于编修院，作大规模校正。以集贤院掌禹锡、林亿、校理张洞、校勘苏颂等为校正。后又命孙奇、高保衡、孙兆同校正。每一书毕，即奏上，亿等皆为之序，下国子监刊行。并补注《本草》《修图经》《千金翼方》《金匮要略》《伤寒论》诸书，悉镂板刊行。其各篇序论之现存者，则苏颂《苏魏文公集》中有《补注神农本草总序》《本草后序》《本草图经序》《校定急备千金要方序》《后序》等篇。

宋代君臣上下，一心以文学为务，书籍校理之盛事，比之西汉有过之无不及。当时馆阁之臣，其博学者，如苏颂，经史九流百家之说，以至图纬、律吕、星官、算经、山经、本草，无所不晓。另如孙奭、邢昺等经学家，欧阳修、刘攽、刘恕等史学家，不胜枚举。北宋盛时，开崇文馆校理书籍，群贤毕集。其校理刊刻工作，虽则国步艰难，也取得了显著之成绩，绝非偶然。

第六节　宋代校勘学的特点

分代详校　宋初校书，务求其速，又没有用众本对校。如三馆秘阁的图书，每帙只用原写本一册校正，又不一定是善本。直至孝宗淳熙四年（1177年），宋敏求上书曰：

> ……先以《前汉书·艺文志》所载者，广求其本，令在馆供职官，重复校正，既毕，然后校后汉时诸书。窃缘战国以后，及于两汉，皆是古书，文义简奥，多有脱误，须得他本参定。乞依昨来《十七史》例，于京师及下诸路藏书之家，借本誊写送官。俟其已精，方及魏、晋，次及宋、齐。至唐则

分为数等，取其堪传者则校正。庶几秘府文籍，得以全善。（见《文献通考》卷一七四）

这建议虽未实行，但足见宋代校勘学观点的进步。

选用专家 博学之士，旷古能有几人！况专门之业，究非文士所习。故选用专家，实为必要。这才足以使校勘精善。汉以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便是明证。宋代也有人这样要求。《洞泉日记》说：

> 秘书监王钦臣（宋神宗、哲宗时人）奏差真靖大师陈景元校黄道书，范祖禹封还之。以为诸子百家，神仙道释，盖以备篇籍，广异闻，以示藏书之富，本非有益于治道也。不必使方外之士雠校，以从长异学也。今馆阁之书，下至稗官小说，无所不有。既使景元校道书，则他日僧校释书，医官校医书，阴阳卜相之人校技术，其余各委本色，皆可援例，岂祖宗设三馆之意哉？遂罢景元。

其实王钦臣所奏，确有卓识。因为形而下之学，如医书一类，若只从文字上着想，岂只其道不明，反而贻害不浅。故必求之于专业之士，方能使书受益。可惜范祖禹概以小道目之。致使学有专精之士，未能参与校勘，以尽其所长，诚为宋代校勘事业一大憾事！

编撰总目叙录 刘向校书，每书校完，必撮其意旨，作为叙录，详论学术的源流，考订文字的异同，使学者有所准绳。宋崇文馆校书，履行西京故事，每一书竟，皆有叙录。仁宗景祐（1034—1037年）中，诏王尧臣、史馆检讨王洙、馆阁校勘欧阳修等，校正条目，讨论撰次，分类编目，为《崇文总目》六十六卷，每条之下，具有论说，便是集诸家叙录之大成。可惜到了南宋，郑樵谓其繁而无用。绍兴中，高宗误用郑樵之言，删书序释，仅存书名。以

后元托克克等撰《宋史·艺文志》，纰缪颠倒，瑕隙百出，于诸史志中最为低劣，与高宗误用郑樵之言有关。直至清代，钱东垣始据《欧阳文忠公集》钞出，并从《文献通考》中辑其遗说，又增案语，成《崇文总目辑释》六卷，使后人尚可窥见古代学术之大略。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极称之曰：

数千年著作之目，总汇于斯。百世而下，藉以验存佚，辨真赝，核同异，固不失为册府之骊渊，艺林之玉圃也。

校勘条例的规定 汉代人校书，立专官，终身相守，甚至父子传业。所以校勘之法，可以心领神会，熟能生巧。魏晋以来，大都不立专官，而以众手为之，限以课程，画以部次，只求速成。且人人自出己意，各有自己的符号，无所统一。因而错误百出，驳杂不纯。宋代则确立校勘的条例，如《南宋馆阁录》卷三所载：

诸字有误者，以雌黄（嫩黄）涂讫，别书。或多字，以雌黄圈之；少者，于字侧添入。或字侧不容注（写不了那么多的）者，即用朱圈，仍于本行上下空纸上标写。倒置，于两字间书"乙"字。诸点语断处，以侧（点在字旁）为正。其有人名、地名、物名合细分者，即于中间细点。

诸点发（校点四声，如平在左上角，上在左下角，去在右上角，入在右下角）字，本处注释有音者，即以朱抹出，仍点发（点明声调）。其无音而别经传子史音同有可参照者，亦行点发。或字有明音（须分清的读音），如传记之"传"（柱恋切），为邮传之"传"（株恋切），又为传习之"传"（重缘切）；断绝之"断"，为断绝之"断"（都管切），又为决断之"断"（都玩切）；轻重之"重"（直陇切），为再重之"重"（储用切），又为重叠之"重"（传容切）；春夏之"夏"（亥驾切），为华夏之"夏"（亥雅切）；远近之"近"（巨谨切），为附近之"近"（巨靳切）之

类，虽本处无音，亦便行点发。点有错处，却行改正，即以雌黄盖。朱点应黄点处并不为点。（"点发"，指点在字的角上，表示注文注字调的正误。是用朱笔校点。点错了，涂了黄点，就不再加朱点了。）

点校讫，每册末各书臣某校正。

第七节　校雠学有专书之始

校勘之业，虽建立于刘向父子，但以终身守官，父子传业之故，其校勘方法只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所以历代人君命臣下校勘，大都各自为法，无所统一。两宋之世，朝野上下，校雠不辍，其事既盛，其学斯兴，校雠学由此而生。南渡之初，莆田郑樵，以修史之难无出于志。因志是宪章之所系，非老于典故者不能为。故范晔、陈寿之徒，能为纪传而不敢作表志。后来的诸史表志，又皆详于浮言而略于事实，郑樵有见及此，故总天下之学术，分别纲目，名之曰"略"，用匡前失，凡二十略。

郑樵好读书著书，对经旨礼乐文字天文地理虫鱼草木方书之学，皆有论辨，高宗绍兴十九年（1149年）上之，诏藏秘府。后以侍讲王纶、贺允中荐，得召对，授右迪功郎、礼部架阁。后以御史叶义问劾之，改监潭州南岳庙，给札归抄所著《通志》。书成，入为枢密院编修官，寻兼摄检详诸房文字。

《校雠略》是《通志》二十略之一，是我国第一部校雠学的专著。他撰此专著，其见解和目的是：

册府之藏，不患无书；校雠之司，未闻其法。欲三馆无素餐之人，四库无蠹鱼之简，千章万卷，日见流通。（见《校雠略》）

北宋之世，开崇文馆校理图书。其收藏之富与人才之盛，超越前代。可惜职任不专，而所编书目，又出自众人，甚为驳杂。所以郑樵取历朝著录，略其鱼鲁豕亥之细，而特以部次条别，疏通门类，考正得失，著为此书，研究图书类别，探溯源流，编次目录，综造二十一论：

《秦不绝儒学论》，二篇；

《编次必谨类例论》，六篇；

《编次必记亡书论》，三篇；

《书有名亡实不亡论》，一篇；

《编次失书论》，五篇；

《见名不见书论》，二篇；

《收书之多论》，一篇；

《阙书备于后世论》，一篇；

《亡书出于后世论》，一篇；

《亡书出于民间论》，一篇；

《求书遣使校书久任论》，一篇；

《求书之道有八论》，九篇；

《编次之讹论》，十五篇；

《崇文明于两类论》，一篇；

《泛释无义论》，一篇；

《书有不应释论》，二篇；

《书有应释论》，一篇；

《不类书而类人论》，三篇；

《编书不明分类论》，三篇；

《编次有叙论》，二篇；

《编次不明论》，七篇。

所论虽不是文字校勘，但却是关于古籍的整理，可以说是广义的校勘。广义的校勘包括辑佚。据《通志序》，可见郑樵的主张是：

学术之苟且，由源流之不分；书籍之散亡，由编次之无纪。

所以《校雠略》中于类例编次之法，特详加研讨，而于刘向《七略》、班固《汉书·艺文志》、长孙无忌等《隋书·经籍志》以及《崇文总目》之谬误，皆为驳诘纠正。

第八节 《说文解字》的校理

《说文》既经窜乱，又因战乱频仍，传写非人，故原书错乱简脱，几不可读。于是有南唐徐锴之第一次整理。

徐锴精于小学，以《说文解字》为李阳冰所乱，乃作《说文系传》四十卷。取许书十五篇，篇析为二，名曰《通释》；继以《部叙》二卷，《通论》三卷，《祛妄》《类聚》《错综》《疑义》《系述》各一卷。《部叙》拟《易序》《卦传》以明《说文》五百四十部之次。《祛妄》则专斥李阳冰新解之谬。《类聚》则举字之相比为义者，如“一”“二”“三”“四”之类。《错综》则旁推六书之旨，通诸人事，以尽其意。《疑义》则举《说文》偏旁所有而缺字，及篆体笔画相承而小异者，《系述》则犹《史记》之自述。

到了宋代，以许书训诂简朴，猝不易通，又音韵改移，古今异读，谐声诸字，亦往往难明。所以太宗雍熙三年（986年），诏徐铉、句（gōu）中正、葛湍、王惟恭等详加校定。铉等乃集书正副本及群臣家藏者，备加详考。有许氏注义序例中所载，而诸部不见者，审知漏落，悉从补录。又经典相承，时俗要用，而《说文》不载者，亦皆增加，别题曰“新附字”。其本有正体，而时俗讹

变者，则具于注中。其义理乖舛，违戾六书者，则别列卷末。或注义未备者，则更为补释，亦题“臣铉等案”以别之。又以《说文》之时，未有反切，后人附益，互有异同，则以孙愐《唐韵》为定。更以许氏注解，词简义奥，不可周知，则以阳冰以后诸儒笺述，其有可取者，亦从附益。犹有未尽，则铉等复加训释。总之，徐铉等人之校《说文》，是以“务援古以正今，不徇今而违古”为目的。所以校正以后，即令国子监雕板印行，垂宪百世，使后学得以见到《说文》的本来面目了。

第九节　宋元明刻本的比较

宋刻本　宋代的刻板，除官家外，有私家刻书、书坊刻书。书坊刻本，流传至今者，一般古董家赞美备至，爱惜非常。但书坊刻本，在雕刻方面，不如官家之精美；在校勘方面，又不如私家之仔细。总的说来，宋版书籍，都深受欢迎。除校勘质量外，原因还有二：

一为纸墨精致。宋代刻书，不独雕镌（juān）认真，摹印精美，所用纸料，也大都洁白坚韧。

二为写手专一。宋刻本，一般由善书之士，誊写上板。所有字体，大都为欧（欧阳询）、柳（柳公权）、颜（颜真卿）体字，故其间架波磔（zhé 捺），浓纤得中，而又饱满，无跛踦（qī）肥脞（cuǒ，细碎）之病。且有许多著书名家，亲写上板，如吴说之于《古今绝句》、岳珂之于《玉楮诗稿》。

当然，宋版书的缺点也有。其缺点：

一是异古本。宋代学者注重义理，所以对于字句的校勘，不及汉代学者精细。如《易程传》（程颐《易传》）、《书蔡传》（蔡沈

《书集传》)、《春秋胡传》（胡安国《春秋传》)，其中沿误之处，大都与唐石经及北宋蜀刻本不同。这些书对校勘并无多大贡献。

二是有讹舛。王士祯《居易录》说：

今人但贵宋本，顾宋板亦多讹舛，但从善本可耳！如钱牧翁所定《杜集·九日寄岑参诗》，从宋刻作“两脚”（指“雨脚泥滑滑”的“雨脚”），但如旧而注其下云：“陈本作‘雨’。”此甚可笑。

虽然如此，但宋刻本的缺点只占十之二三而已。

元刻本 元代校勘之业虽已衰落，但刻书之风甚盛。《元史·百官志》说：

至元（元世祖年号）二十四年（1287），国子监置生员二百人，延佑（元仁宗年号）二年（1315），增置百人。兴文署掌刊刻经史，皆属集贤院。

又说：

至元二十七年（1290），立兴文署，召工刻经史子版，以《资治通鉴》为起端。

所以元代官刻之盛，为宋代所不及。而且当时所刻诸书，较宋刻尤为精美。因为元代讲学之风大盛，各路各学官私书院林立，大家对书籍争相校刊，这种风气也为宋代所不及。元代刻本所以精美，《金台纪闻》说：

元时郡院俱有学田，以其所入之学粮，以供师生之廪饩(伙食)，余则用以刻书。……故雠校刻画颇精。

《日知录》又说：

闻宋、元刻书，多在书院，山长主之，通儒订之，学者则互相传布。故书院所刻有三善焉：一、山长无不勤于校雠者；二、费省工精；三、板贮官府，易于印行。

故元代可称为刻书的中兴期。

元刻本的优点：

一为多用赵体。据徐康《前尘梦影录》，元代士大夫以至方外之士，都竞学赵书。那时如官刻本经史，私家刊诗文集，亦皆摹吴兴体（即赵体，因赵孟頫是吴兴人）。

二为名手书写。清瞿绍基《铁琴铜剑楼书目》著录元刊本元吴莱《浦颖吴先生集》十二卷说：

> 刻于至正二十六年，末有“金华后学宋璲誊写”一行。璲工四体书。此书为其手写，古雅可爱，尤足珍也。

明刻本　洪武永乐间的刻本，还有古代优良的传统。以后就不行了。明代中叶，写书匠改为方笔，使字体非颜非欧，低劣不堪。《日知录》说：

> 今学既无田，不复刻书；而有司间或刻之，然只供馈赆（赆，jìn）之用。其不工反出坊本下，工者不数见也。昔时入觐之官，其馈遗，一书一帕而已，谓之书帕。

即所谓书帕本。明代翰林官初上任，或奉使回，例以书送署中书库。

明刻本不只校雠不精，版本粗恶，还有：

1.改换书名　如冯梦祯刻唐刘肃《大唐新语》，改名《唐世说新语》；郎奎金刻《释名》，改名《逸雅》。都疑误后学。

2.添改脱误　刻书之要，首在校雠，以免脱误。明时刻本，时有一格两字之例，致有正文注文不分之弊。清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著录甘复《山窗余稿》一卷说：

> 此刻遇衍字加点于旁，或(有误字)即以所改字注于旁，遇脱字亦如之。此法甚善。

但添改脱误，应避免使人误会。如《兰亭集》“曾不知老之将至”句，

夺一“曾”字，因加一“曾”字，并于其旁加“〈”为记，后遂误“曾”为“僧”。

3.多用《说文》及古体　宋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字画》一条说：

其有骇俗者，则通之以可识者。

注曰：

如“亘”之为“宜”、“簪”之为“晋”之类，皆取石经遗文。

可知刻书，字贵通俗。这是宋人刻本的可贵之处。明世宗嘉靖间，刻书者喜用《说文》写成正楷，同时更多用古体字，以示其博。如许宗鲁所刻之《国语韦注》《吕氏春秋》，陆钱刻的《吕氏家塾读诗记》等。

明代坊间所刻，讹误甚多。如“巽（逊）与”误作“巽语”，“由古”误作“犹古”，例子不少。明官府虽禁止滥刻，但已成风气，积重难返。所以总的说来，明代的刻本，远比不上宋、元特别是宋代的刻本。

第十节　唐初两大校勘家

颜师古

字籀，颜之推孙。太宗时为弘文馆学士。少博览，精训诂学。曾受诏于秘书省正定《五经》文字。又为太子承乾注《汉书》。他对《汉书》的校勘是：

据古本，复古字　因《汉书》多用古字。后人习诵，往往以意刊改。

删秽滥　古今异言，方俗殊语，后学意有所疑，辄加增损，

秽滥实多，故删之。

正科条　诸表列位，虽有科条，文字繁多，遂致舛杂，前后失次。颜师古循文究例，普加刊正。

断句读　礼乐歌诗，读者茫昧，后学断句往往断错。师古剖判义理，为之改正。

颜师古又著有《匡谬正俗》八卷。前四卷五十五条，皆论诸经训诂音释。后四卷一百二十条，皆论诸书字音及俗语相承之异。考据极为精密。如：

> "漙"，《郑诗·野有蔓草》篇云："野有蔓草，零露漙（先兖切）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清扬，眉目之间。婉，美。）《诗》古本有"水"旁作"漙"字者，亦有单作"专"字者，后人辄改之为"漙"字，读为"团圆"之"团"，作辞赋篇什用之，递相因循，曾无疑者。按《吕氏字林》："'雨'下作'专'，训云：露貌，音上兖反。"此字本作"𩃬"，或作"漙"耳。单作"专"者，古字从省。又上兖之音，与"婉"相类，益知吕氏之说可依，本非团圆义矣。

可见他对一个字的音义，一定详究其根源，不惜引经据典，务使后学了然而后已。这既是训诂，又是校勘，是二者的结合。

陆德明

名元朗，以字行。历仕陈、隋，贞观时为国子博士。尝以经典旧音太简，加以微言久绝，大义愈乖，后人攻乎异端，竞生穿凿。所以利用业余时间，精研六籍，采摭九流，搜访异同，参照《苍》《雅》，并录古今，总其枢要，著《经典释文》三十卷。其体例主要是：

1.经注区分　用墨书经本，用朱字辨注。

2.摘字为音　各标篇章名目于上，只摘字为音。唯《孝经》《老

子》才多记全句。

3.博取众说　其音堪互用，其义可并行，或字有多音，诸家别读，苟有可取，无不毕书。

4.注音兼用直音和反切　古人音书，止为譬况之说。至三国魏孙炎注音，才多用反切。陆德明则继承《说文》之"读如""读若"等，又继承魏以后诸家如徐仙民、郭璞等所用之反切。

5.注音务求易辨易识。

6.同言异字，同字异言，二者并存，但加刊正。

7.依旧音以音古字　如"说"音"悦"，"知"音"智"。

8.考订《尚书》古字隶变之后，字体混乱，《释文》依旧为音。其字有别体，亦用注音表示。兼采《说文》和《字诂》（张揖著），以示同异。

9.专有名词的考订　如人名、民族名、国名、地名，文字不同，皆斟酌折衷，务得其宜。

10.辨析方音。

11.区别正字误字　从音形两方面辨正。如说"'攴'，普卜反，《字林》普角反。""'文'，武云反。""'无'，音無。""'旡'，音既。"

《经典释文》，采用汉魏六朝音切，凡二百三十余家，又兼载诸儒的训诂，以证各本之异同。以后考见这些书籍的古义，除了注疏以外，就靠《释文》了。

第十一节　私家校雠之盛

岳珂　字肃之，号倦翁，岳飞孙。南宋宁宗时人，官至户部侍郎。他所校的《九经三传》以精密见称。

岳珂以当时所传《九经》，自监、蜀、京、杭而下，有建安（今

福建建瓯）余氏、兴国于氏二本，皆分句读，称为善本；廖莹中又以余氏不免舛误，于氏也未为的当，于是合诸本，参订同异，校刻最精，天下珍视。然流传不久，原板散失。岳珂惧久而无传，故仿成例，命良工刻梓于家塾。已与明经老儒，分卷校勘。书成，比廖氏世綵堂本更精。他所校刻各书，现存的有武英殿翻雕本，及各直省书局私宅重翻殿本。又有《论语何晏集解》，附《音义》十卷；《孟子·赵岐注》附《音义》十卷。然以屡经翻雕，颇非其旧了。

岳氏的校勘方法是：

1.广征副本　岳珂校勘《九经》，所用的版本有：唐石刻本、晋天福铜版本、京师大字旧本、绍兴初旧本、监中现行本、蜀大字旧本、蜀学重刻大字本、中字本、又中字有句读附音本、潭州旧本、抚州旧本、建大字本、俞韶卿家本、又中字凡四本、婺州旧本、兴国于氏本、建安余氏本、又越中旧本注释、建安本有音释注疏、蜀注释，共二十余种之多。因为此本有错，那本未必就错。所以要想还书本来面目，校勘之先，就必广贮副本。

2.精审字画　魏晋以来，对字体厌拙朴，嗜姿媚，随意迁改。隋唐以降，尤为谬乱，影响到镂板刻字的规范化。因此岳氏的校勘，凡字之偏旁点画，无不逐一详校。至于骇俗者，则改用可识者（如"宜"改为"宜"，"晉"改为"晋"，皆取石经遗文）。探讨折衷，不使有分毫差误。他正字所据的字书，有许慎《说文》、张参《五经文字》、唐玄度《九经字样》、颜鲁公《干禄书》、郭忠恕《佩觿（xié）集》、吕忱《字林》、秦昌朝《韵略》、《分毫补注字谱》、毛晃《增韵》、毛居正《六经正误》等十余种。

3.详订音释　音释本用以解经。但宋以前诸书，大抵止刊古注，音释则另为一书，学者难于翻检。所以岳氏为了翻阅的便利，附音释于注文之下。但为避免庞杂，又详加审订。应音释者则音

释，不当者则删除。故开卷了然，经文自明。

4.定句读　句读似易而难。《韩非子·外储说左下》云：

哀公问于孔子曰："吾闻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无其他异，而独通于声。尧曰：'夔一而足矣。'使为乐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

可见句读错了，文义也理解错了。句读和文义的关系，其重要若此。岳氏所校各书，全仿馆阁校书之式，于经文注文，皆加圈点（据《增韵》，秘省校书式为：凡句读则点于字之旁，分读则微点于字之中间）。使后学得以开卷了然。

总之，岳氏的校勘，凡一字一音一义，无不参订同异，正误辨疑，使读者有所依据。所以《四库总目》才说他"实为有功于经学"。

郭京　唐人，著有《周易举正》。其自序说：

得王辅嗣、韩康伯手写真本，比校今所习者，或将经入注，用注作经。小象（《易》卦六爻的卦辞，全卦的象辞叫大象）中间，以下句反居其上。爻辞注内，移后义却处于前。兼有脱遗，两字颠倒谬误者。并依定本举正其讹，总一百三十五处，二百七十三字。

举例如下：

1.今本误增者：《坤·初六象》："履霜阴始凝也。"今本误于"霜"下增"坚冰"二字。

2.今本脱字者：《屯·六三象》："即鹿无虞，何以从禽也？"今本脱"何"字。

3.今本讹误者：《师·六五》："田有禽，利执之，无咎。"今本"之"字误作"言"字。

4.今本倒句者：《比·九五象》："失前禽，舍逆取顺也。"今本

误倒其句。

5.今本以注作正文者：《系辞》："二多誉，四多惧。"（二处中和，故多誉。四近于君，故多惧。）注云："惧，近也。"今本误以"近也"字作正文，而注文中又脱"惧"字。

《文献通考》卷一七五引李巽岩曰："京此书，使经传不相混乱，残缺复为真全，颇有益于学者。"

此外，如李涪的《刊误》，苏鹗的《苏氏演义》等，大都为考究书传、订正名物、辨讹证误之有益于见闻之作。

宋代私家校雠之风尤盛，而勒成专书的更多。如：

《书辨讹》，七卷，郑樵撰。已佚。据《直斋书录解题》，此书题目有三：《纰谬》四、《缺疑》一、《复古》一。

《仪礼识误》，三卷，张淳撰。秘阁曾逮刊《仪礼郑氏注》十七卷，陆氏《释文》一卷，淳为校定，因举所改字句，集为是编。他所引据的版本，有：周太祖广顺三年（953年）及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刊行的监本、汴京的巾箱本（袖珍本）、杭州的细字本、严州（浙江的建德府）重刊的巾箱本，而参以陆氏《释文》、贾公彦《疏》，考核异同，最为详尽。所以《朱子语录》称他"所校甚仔细，较他本为最胜。"

《六经正误》，六卷，毛居正撰。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年），诏国子监刊正经籍，当时聘司校雠，乃尽取《六经三传》诸本，参以子、史、字书、选粹、文集，研究异同。凡字义音切，毫厘必校，旬岁间刊修者凡四经。然以工人惮烦，诡窜墨本（原书），以给有司。故版之误字，未改者犹有十之二三。会以目疾告归，事遂中止。后以纵令尽正其误，而诸本不同，仍无所取正。故特集所校正之字，编为是书，刊而传之，使后学得以参考。虽其中不免仍有舛误，如"勑"，古文作"敕"，隶变作"勅"，居正因高宗御

书石经误作"勑",便说从两"入",不从两人（卷一）。但他考讹正谬，殊有补于经学。

《孝经考异》，一卷，朱熹撰，已佚。其《孝经刊误》自注："古今文有不同者，别见《考异》而知之。"

以上皆经书。

《汉书刊误》，三十卷，余靖撰，已佚。目见《宋史·艺文志》。

《汉书刊误》，一卷，张泌撰，已佚，目见《宋史·艺文志》。

《两汉书刊误》，四卷，刘攽（bān）撰。朱彝尊《两汉刊误跋》说：

> 刘氏之书，因宋仁宗（当为"英宗"）读《后汉书》，见"垦田"皆作"懇"，于是使侍中传诏中书，俾刊正之。攽为学官，故刊其文。

这书于旧文多所改正，而随笔标记，不暇剖析其所以然。原本久无传刻。清乾隆四年（1739年）武英殿校刊经史，始据宁宗庆元旧本《汉书》增入，一家之言，幸垂不朽。

《西汉刊误》，一卷，无名氏撰，已佚，目见《宋志》。

《两汉决疑》，五卷，王逨（lái）撰。《直斋书录解题》说它的凡例有五：一曰失实，二曰引古，三曰异言，四曰杂证，五曰注释。

《两汉刊误补遗》，十卷，吴仁杰撰。此书为补刘攽《两汉书刊误》而作，引据赅洽，考证详晰。如：

> 《赵岐传》："岐著要子章句。"《刊误》："'要'当作'孟'。"而刘攽不能言其所以误为"要"之故。《补遗》则云："古文'要'作'𦥔'，与'龟'相近。疑'孟'与'龟'通。《岐传》本作《龟子章句》，而误为'要'耳。"（王鸣盛《十七史商榷》）

《新唐书纠缪》，二十卷，吴缜撰。此书专为驳正《新唐书》之

讹误而作。凡二十门：一曰以无为有，二曰似实而虚，三曰书事失实，四曰自相违舛，五曰年月时世差误，六曰官爵姓名谬误，七曰世系乡里无法，八曰尊敬君亲不严，九曰纪志表传不相符，十曰一事两见而异同不完，十一曰载述脱误，十二曰事状丛复，十三曰宜削反存，十四曰当书而反缺，十五曰义例不明，十六曰先后失序，十七曰编次未当，十八曰与夺不常，十九曰事有可疑，二十曰字书非是。又总括其致误之由说：

> 推本厥咎，盖修书之初，其失有八：一曰责任不专，二曰课程（工作的进程）不立，三曰初无义例，四曰终无审覆，五曰多采小说，六曰务因旧文而不推考，七曰刊削者不知刊削之要而各徇所好，八曰校勘者不举校勘之职而务惟苟容。

这书指摘《新唐书》谬误之处有四百多条。王明清《挥麈录》说：

> 欧阳修重修《唐书》时，缜尝因范镇请预官属之末。修以其年少轻佻，拒之，缜怏怏而去。及新书成，乃指摘瑕疵为此书。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曾引张九龄为相事，说他有意诋诃。吴书对《新唐书》的确有些地方是有意掊击的。如第二十门"字书非是"一条，至历指偏旁点画之讹，以讥修等，大都近于吹毛求疵。但欧阳修、宋祁修《新唐书》，意主文章，而疏于考证，牴牾之处不少，吴的《纠缪》，深中其病，也有功于史学。

《五代史纂误》，三卷，吴缜撰。此书专取修所撰《五代史》的疏舛简陋处及修轻改旧文、首尾失检之处，疏通剖析，切中要害。

《荀子考异》，一卷，钱佃撰。佃为秘阁修撰。尝患《荀子》一书无善本，求之国子监，亦未板行。比集诸家所藏，得二浙、西蜀本凡四，增减异同，难以取正。后于庐陵学官藏书中，得元丰国子监刻本，遂取以为据，然犹有缺误。乃再参校诸本，凡正是

一百五十四字。其有疑而未决者，则著之卷末，又一百二十六条。足供考订习诵之用。

《颜氏家训考证》，一卷，沈揆撰。揆官秘书监。尝苦《颜氏家训》字讹难读，但无善本校对。后守天台郡，得故参知政事谢公家藏旧蜀本，行间朱墨细字，多所改定。乃与郡丞楼大防取两家本读之。太抵闽本尤谬误。"五皓"实"五白"；"蓋博名"而误作"传"；"元叹"本顾雍字，而误作"凯"；《丧服经》自一书，而误作"绖"；马牝曰"騲"，牡曰"骘"(zhì)，而作"驒(tuó)""骆"。至于"吴越"为"吴趋"；"桓山"为"恒山"；"僮约"为"童幼"，则闽、蜀本实同。惟谢氏所校颇精善。自题以五代宫傅和凝本参定，而侧注旁出，类非取一家书。然不正"童幼"之误。又秦权铭文"𠟭"实古"则"字，而谢氏音训，亦时有疏舛，雠书之难如此。于是稍加刊正，多采谢氏书，定著为可传。又别列《考证》二十三条为一卷，附于后。若其传写甚讹，与音训辞义所未通者，皆存之，以俟洽闻君子。(见》自跋》)

《周易参同契考异》，一卷，朱熹撰。熹以是书词韵皆古，奥雅难通，读者浅闻，妄辄更改，比他书尤多舛误。因合众本，更相雠正。凡诸同异，皆并存之，以备考证，故以"考异"为名。其注明同异者，如"天下然后治"之"治"字，云或作"理"等。参证他本者亦不过一二处，如"修"字疑作"循"，"六五"疑作"廿六"，"铅"字疑作"饴"，"与"字疑作"为"之类。(见《四库总目》)

《阴符经考异》，一卷，朱熹撰。熹虽以其为唐李筌所伪托，然时有精语，非深于道者不能作，故用褚、张二氏注本为之考定。(见《四库总目》)

其余如黎錞(chún)的校《荀子》、陆佃校《鬻子》、陈襄校《梦

书》《相笏经》《京房婚书》，皆已佚。

以上是史和子。

《楚辞考异》，一卷，洪兴祖撰。兴祖北宋末南宋初时人，曾被召试秘书省正字。少从柳展如得东坡手校《楚辞》十卷。凡诸本同异，皆两出之。后又得洪玉父而下十四本参校，遂为定本。始补王逸《章句》之未备者。成书，又得姚廷辉本作《考异》，附古文释文之后。其后又得欧阳永叔、孙莘老、苏子容本于关子东、叶少协，复校正以补《考异》之遗。

《校定楚辞》，十卷，黄伯思撰。伯思宋神宗时人，为秘书郎。其自序曰：

> 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谓之《楚辞》。若"羌""谇（suì）""蹇""纷""侘（chà）傺（chì）"者，楚语也。悲壮顿挫，或韵或否，楚声也。沅、湘、江、澧、修门、夏首者，楚地也。兰茝（chǎi）荃药蕙若芷蘅者，楚物也。……而近世文士，但赋其体，韵其语，言杂燕、粤，事兼夷、夏，而亦谓《楚辞》，失其指矣。此书既古，简册迭传，亥豕帝虎，舛误甚多。乃以先唐旧本，及西都留监博士杨建勋，及洛下诸人所藏武林吴郡椠（qiàn）本雠校，始得完善。文有殊同，皆两出之。又以太史公《屈原传》，下至陈说之序，附以今序，别为一卷，附《十通》之末，而目以《翼骚》。（见黄伯思《东观余论》卷下）

《校定杜工部集》，二十二卷，黄伯思撰。伯思素喜杜公之诗，然以迭遭变乱，亡逸不少，加以传写谬误，渐失旧文。"乌"三转而为"舄（xì）"者，不可胜数。及游宦洛下，与士大夫裒（póu）集诸家所藏，是正讹舛。又得逸诗数十篇，参于卷中。及在秘阁，得御府定本，校雠益号精密。故李纲称为非世所行者之比。（见

《东观余论·附录》)

《韩集举正》，十卷；《外集举正》，一卷：皆方崧卿撰。崧卿，孝宗时人。自跋云：

> 所据碑本(碑志之类)《韩文》十七种，所据诸家之书，凡唐令狐澄本、南唐保大本、秘阁本、祥符杭本、嘉祐蜀本、谢克家本、李昞(bǐng)本，参以唐《赵德文录》、宋白《文苑英华》、姚铉《唐文粹》诸书，参互钩稽，次其异同。因郭京《周易举正》而名。

他于改正字用朱书；因衍而删去之字，圆圈围之；增入之字，以方圈围之；颠倒之字，以墨线曲折乙之。

《韩文考异》，十卷，朱熹撰。因《韩集》诸本互有异同。方崧卿所作《举正》，虽参校众本，弃短取长，实则惟以馆阁为主，多所依违牵就。因此复加考订，勒为十卷。凡方本之合者存之，其不合者一一详为辨证。其体例，但摘正文一二字大书，而所考者夹注于下。

《文苑英华辨证》，十卷，彭叔夏撰。这书是据周必大所校《文苑英华》而作。必大《文苑英华跋》云：

> 《文苑英华》，虽秘阁有本，然舛误不可读。俄闻传旨取人，遂经乙(读书以笔志其处览)。时御前置校正书籍一二十员，往往妄加涂注，缮写装饰，付之秘阁。晚幸退休，求别本与士友详议，疑则缺之。惟是原修书非出一手，丛脞(cuǒ，烦琐)重复，首尾衡决。一诗或析为二、二诗或合为一；姓名差互，先后颠倒，不可胜计。其中赋多用"员"来，非读《泰誓正义》，安知今日之"云"字乃"员"字之省文？以"尧蓂"对"舜荣"，非读《本草注》，安知其为菖蒲？又"切磋"之"磋"，"驰驱"之"驱"，"挂帆"之"帆"，"仙装"之"装"，《广韵》

各有侧音（独特之音），而流俗改"切磋"为"效课"，以"驻"易"驱"，以"席"易"帆"，以"仗"易"装"：今皆正之，详注逐篇之下，不复遍举。始于嘉泰（宁宗年号）初，至四年（1204年）秋讫工。

叔夏自序云：

益公先生，退老邱园，命以校雠，肤见浅闻，宁免谬误？然考订商榷，用功为多。散在本文，览者难遍。因荟粹（集）其说，以类而分。各举数端，不复具载，勒成十卷，名曰《文苑英华辨证》。嘉泰四年冬十有二月。

据此，可知必大校雠《文苑英华》时，叔夏已预其事，于嘉泰四年秋校完，而《辨证》则成于冬。《辨证》的内容，分为二十类：一曰用字，为目凡三；二曰用韵，为目凡二；三曰事证，无子目；四曰事录，为目凡二；五曰事疑，无子目；六曰人名，为目凡五；七曰官爵，为目凡三；八曰郡县，为目凡三；九曰年月，为目凡四；十曰名氏，为目凡三；十一曰题目，为目凡二；十二曰门类，无子目；十三曰脱文，为目凡四；十四曰同异；十五曰离合；十六曰避讳；十七曰异域；十八曰鸟兽；十九曰草木；（十四至十九，均无子目。）二十曰杂录，为目凡五。总起来说，其改否之原则是：凡属错误的就改，别有依据的不妄改，义可两存者不必改。全书考核精密，用意谨严，可谓《文苑英华》的功臣。

以上是集。

以上所说，是校勘成绩甚著而勒成专书者。此外，宋人所撰笔记中，亦颇多考证经典的精语。如：

王应麟 字伯厚，撰《困学纪闻》二十卷。凡《说经》八卷，《天道地理诸子》二卷，《史考》六卷，《评诗文》三卷，《杂识》一卷。精究博考，根柢深厚。如《荀子·劝学》"青出之蓝"，作"青取之于

蓝”。“圣心循焉”，作“圣心备焉”。“玉在山而木润焉”，作“草木润”。“君子如响矣”，作“知响矣”。《赋篇》“请占之五泰”，作“五帝”。

其学虽出朱子，然辨正朱子语误颇多。如《论语注》“不舍昼夜”，他说：

> 不舍昼夜，《释文》：“舍，音捨。”《集注》亦云上声。而《楚辞辨证》云：“洪引颜师古曰：‘舍，止息也。’”屋舍次舍，皆此义。今人或音捨者，非是。（卷七）

又辨《孟子注》“曹交，曹君之弟”说：

> 曹交，注谓曹君之弟。按《左传》哀公八年，宋灭曹，至孟子时，曹亡久矣。曹交盖以国为氏者。（卷八）

《四库全书总目》说他：

> 能知汉、唐诸儒本本原原，……又能知洛、闽诸儒，绝无党同伐异之私，所考率切实可据。

袁文 字质甫。幼喜读书，不汲汲于功名，而惟学是务。著有《瓮牖闲评》，专以考订为主，于经史皆有论辨，条析异同，多所发明。而音韵之学，尤为精审。于小学则凡偏旁、点画、反切、训诂，悉能剖别毫厘。全书共分八卷：一卷论经，二卷论史，三卷论天文地理人事等，四卷专论小学，五卷论诗词书画等，六卷论饭食衣服器用宫室等，七卷论释道技术物产等，而以杂论因果怪异及自记之语终。下仅举一例：

> 苏东坡诗云：“关右玉酥黄似酒。”碑本乃作“土酥”，“土”字是也。况末句又云：“明朝积玉高三尺。”无用两“玉”字之理，则是“土”字无疑。（卷五）

宋代其他笔记　如周密《齐东野语》卷十八：

> 高邮老儒黄移忠——彦和，仆幼时常师之。尝谓孟子云

"齐三宿而出昼"，读如"昼夜"之"昼"，非也。《史记·田单传》后载燕初入齐，闻昼邑人王蠋（zhú）贤。刘熙注云："齐西南近邑，音获。"故孟子三宿而出。

姚宽《西溪丛语》，辨《文选·神女赋》"玉"字为"王"字之误，（案：沈括已校勘过），辨黄庭坚论徐浩诗"瑰能"字押奴来切之误，辨王安石《诗经新义》"彤管"为"箫管"之误等，皆精审确当。

总之，宋人校勘的方法和态度，都精密谨慎。风气所被，读书之士，致力校勘，旁征博引，凿然有据，而言词谦逊，非党同伐异者可比。宋人校勘所以受后人钦仰，原因在此。

元明校勘事业，渐趋衰落。然私家校雠，其成绩卓绝者，亦颇不乏人。如：

吴师道 元英宗时人，官至礼部侍郎。以鲍彪所注《战国策》，虽说纠高诱之讹漏，仍多未善。因取姚宏续注，与彪注参校，杂引诸书，求之《大事记》以考正之。其驳鲍氏据臆附会一段，颇为精采：

> 后汉高诱为注，宋尚书郎括苍鲍彪诋其疏略谬妄，乃序次章条，补正脱误，时出己见论说，其用意至勤。然高氏之疏略，信矣；若谬妄，则鲍氏自谓也。……古书多假借，音亦相通，鲍直去本文，径加改字，岂传疑存旧之意哉？比事比时，当有明征。其不可定知者，缺焉可也。岂必强为傅会乎？又其所引，止于《淮南子》《后汉志》《说文》《集韵》，多摭彼书之见闻，不问本字之当否。《史注》自裴、徐氏（晋末徐广《史记音义》）外，《索隐》《正义》，皆不之引，而《通鉴》诸书莫考。浅陋如是，其致误也固宜。（《自序》）

吴师道校理《战国策》的方法，是保存鲍本篇第之旧。每条之

下，凡增其所缺者，谓之补；纠其所失者，谓之正，各以“补曰”“正曰”别之。复取刘向、曾巩所校三十三篇，四百八十六首，旧为鲍所窜改者，别存于首。因既用鲍注为稿本，如更其次第，则头绪益繁，节目皆不相应。如泯其变乱之迹，置之不论，又恐古本遂亡，故附录原次，以存其旧。观其态度的谨慎、方法的精密，堪为校勘的榜样。所以《四库总目》说：“古来注是书者，固当以师道为最善矣。”

胡应麟 字元瑞，万历时人。筑室山中，购书四万余卷，记诵淹博，多所撰著，有《少室山房笔丛》四十八卷。其首曰《经籍会通》，核论坟典，颇为精详。其序说此书第一“述源流”，第二“述类例”，第三“述遗轶”，第四“述见闻”。其序只数百字，已将坟典之肇始、兴废存亡、类例沿革等，提要钩元，详论无遗。

还有梅鷟的《尚书考异》，用锐利的眼光，作精密之审查，判定其伪讹之点。如谓瀍（chán）水出谷城县南，两《汉志》并同，晋始省谷城县入河南，而《孔传》乃云：“瀍水出河南北山。”又积石山在西南羌中，汉昭帝六年（公元前81年）始置金城郡，而《孔传》云：“积石山在金城西南。”按孔安国卒于汉武时，载在《史记》，则在司马迁之前，安得知此地名？据此则他辨《孔传》是伪作，有科学的态度。

综上所言，元明时期的校勘事业，虽迭有盛衰，但私家的校雠，仍能以谨严的态度、精密的方法从事校勘，令人佩服。

第十二节 删改之风

这是很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是对古书的校正，一方面又是对古书的删改。顾炎武《答李子德书》说：

三代《六经》之音，其失传也久矣。其文之存于世者，多后人所不能通；以其不能通而辄以今世之音改之，于是乎有改经之病。始自唐明皇改《尚书》，而后人往往效之。然犹曰旧为某，今改为某，则其本文犹在也。至于近日，锓（qīn，刻）本盛行，而凡先秦以下之书，率臆轻改，不复言其旧为某，则古人之音亡而文亦亡。此尤可叹者也。

唐代改书，如唐明皇改《尚书·洪范》"无偏无颇"的"颇"为"陂"。范谔（è）昌改《易·渐卦》"鸿渐于陆"之"陆"为"逵"。孙奕改《杂卦》"明夷，诛也"的"诛"为"昧"。

到了宋代，则既因古音之湮没莫解其意而改，又因怀疑经典，厘订其文而删，那古书就更倒霉了。

宋儒之为学，大都黜文辞而尚节气，舍训诂而言理性。所以对于古来经典，特别怀疑，而尤以仁宗庆历以来为甚。如欧阳修之排《系辞》，苏轼苏辙之毁《周礼》，李觏（gòu）之疑《孟子》，苏轼之讥《尚书》，郑樵、王质、朱熹之黜《诗序》，皆其明证。风气所被，一般士子大都轻经蔑古。司马光的《风俗札子》说：

新进后生，口传耳标（入乎口，出乎耳），读《易》未识卦爻，已谓《十翼》非孔子之言。读《礼》未知篇数，已谓《周官》为战国之书。读《诗》未尽《周南》《召南》，已谓毛郑为章句之学（只是分析章节句读、不明大义的小儒之学）。读《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谓《三传》可束之高阁。

因为宋代士子轻经蔑古，所以形成了他们凿臆空断、妄改经文的陋习。如《东坡志林》说：

近世人轻以意改书，鄙浅之人，好恶多同，从而和之者众；遂使古书日就讹舛，深可忿疾！

及至南宋，改书之风更盛，而又以朱子等为最。

朱熹是赞成读书的。他认为读书可以明理。他的《观书有感》云：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他又说："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但他又说："读书已是第二义。盖人生道理，合下完具。所以要读书者，盖是未曾经历见许多。圣人经历见得许多，所以写在册上与人看。而今读书，只是要见得许多道理，及理会得了，又皆自家合下原有底，不是外面旋添得来。"由穷理而怀疑古书，由怀疑而删改经文是很自然的。他的《孝经刊误》之作，是很好的说明。他认为《孝经》所载，是孔子、曾子问答之言，是曾子门人所记，决非孔子之作。他说：

窃尝考之，传文固多傅会，而经文亦不免有离析增加之失。顾自汉以来，诸儒传诵，莫觉其非。至或以为孔子所自著，则又可笑之尤者。

因此，他便分之为经一章，传十四章，删旧文二百二十三字，而引起后儒的不满，如清毛奇龄的《孝经问》等是。朱子注《大学》，也既移本经，又补传文。幸而他注《论语》不删重出之章，不钩转其文，但存其说于注。注《诗·小雅·菀柳》（菀音婉，茂盛）"上帝甚蹈"（指幽王动荡不安。"蹈"，郑作"悼"，病也），朱注据《国语》云"'蹈'当作'神'"，而不改其字。

朱子而后，最著者为王柏，他是朱子的三传弟子。其所著《书疑》九卷，动辄以脱简为辞，臆为移补。有割一两节者，有割一两句者。如并《舜典》于《尧典》，合《益稷》于《皋陶谟》，以《大夏谟》《皋陶谟》为《夏书》。以《论语》"咨尔舜"十二字补《舜典》"舜让于德弗嗣"之下，以《孟子》"劳之来之"二十二字补《舜典》"敬敷五教在宽"之下。而于《尧典》《皋陶谟》《说命》（"说"音悦）

《武成》《洪范》《多方》《立政》八篇，纯以意为易置。

《书疑》一书，虽颇有窜乱，但尚未敢删削经文。至所撰《诗疑》二卷，既攻毛、郑，又驳原文，而大加删削。如以《行露章》为乱入，以《小弁》“无逝我梁”四句为汉儒所妄补。又于《召南》删《野有死麕》，《邶（pèi）风》删《静女》，《鄘风》删《桑中》，《卫风》删《氓》、《有狐》，《王风》删《大车》、《丘中有麻》，《郑风》删《将仲子》、《有女同车》、《野有蔓草》……至三十二篇之多。可谓肆无忌惮了。

改书之风，到了元明，更变本加厉。甚至《说文》而搀入《五音谱》（宋李焘《说文解字五音韵谱》），《通典》搀入宋人议论，宋洪迈《夷坚志》搀入唐人事迹，与原书迥不相谋。而尤以万历间为最盛。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说：

> 万历间人，多好改窜古书。……且如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氏檄》，本出自《唐书》，其曰“伪朝武氏”者，敬业起兵在光宅（武则天年号）元年（684年）九月，武氏但临朝而未革命也。近刻古文，改为“伪周武氏”。不察檄中所云“包藏祸心，睥睨（bìnì，斜看）神器”，乃是未篡之时，故有是言。其时中宗废为庐陵王，而立相王为皇帝，故曰“君之爱子，幽于别宫”也。不知其人，不论其世，而辄改其文。缪种流传，至今未已。

又说：

> 又近日盛行《诗归》一书，尤为妄诞。魏文帝《短歌行》：“长吟永叹，思我圣考。”“圣考”，谓其父武帝也。改为“圣老”，评之曰：“‘圣老’字奇。”《旧唐书》李泌对肃宗言天后有四子，长曰太子宏，监国而仁明孝悌。天后方图称制，乃鸩（zhèn）杀之。以雍王贤为太子。贤自知不免，与二弟日侍于

父母之侧，不敢明言，乃作«黄台瓜辞»，令乐工歌之，冀天后悟而哀愍。其辞曰："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犹尚好，四摘抱蔓归。"而太子贤终为天后所逐，死于黔中。其言"四摘"者，以况四子也。今以为非"四"之所能尽，而改为"摘绝"。此皆不考古而臆说，岂非小人而无忌惮者哉？

至于元明改书的情况，下面再举一二例：

吴澄，元武宗时人，官至翰林学士。晚年手定«礼记纂言»三十六卷，将四十九篇颠倒割裂，任意窜乱，使无完肤。此书虽排比颇有伦次，所解亦时有发明，但窜乱删改，犯了校勘之大忌，故大受后人之讥。

周应宾，明神宗万历时人，官至礼部尚书。撰«九经考义»十二卷，考证«九经»的异文。其书以陈士元的«五经异文»为蓝本，稍扩充之，而舛漏更甚。如«书·禹贡»"浮于江沱潜汉"下云："陆一作'潜于汉'"，而«释文»并无其文。又如«诗·小雅·大田»"有渰（音掩，云兴貌）萋萋"，知引«韩诗»作"有弇（深邃）"，而不知引«吕氏春秋»之作"有晻（ǎn阴雨）"。«大田»"兴雨祁祁（舒迟）"，知引«韩诗»之"兴云"，而不知«吕氏春秋»亦作"兴云"。其尤足骇人者，他之所谓«九经»，是合«四书»«五经»而为九，并非古人所谓«九经»，而且又把«四书»置于«五经»前。他自作聪明，变乱古制，任意删改，以及采材之狭，引证之误，实属罕见。

总之，这一时期的学者，大都以率性为真，以文字为不足求，以典训为不足用，而至于糟蹋经籍。这种风气，及清才衰。

第十三节　馆职之滥与图书之乱

宋代的校勘，取得了可喜成绩，但也如上文所说，在对古书的删改上，也有流弊。而对校勘事业有影响者，还有馆职之滥与图书之乱。

宋代校勘工作，大都由三馆秘阁负责。而馆阁的官职，大半由吏部和学士院选拔。业务水平高的，日久可迁补龙图阁昭文馆，为待制、修撰之类。其次更有直派为运转使、知州等要职之例。由于馆职既可迁居要位，又由吏部取选，因而竞相钻营。欧阳修曾指出：

> 近年风俗浇薄，士子奔竞者多，至有偷窃他人文字，干谒权贵，以求荐举，如邱良深者。又有广费资财，多写文册，所业又非绝出，而惟务干求势门，日夜奔驰，无一处不到，如林概者。（见《欧阳文忠全集》卷102）

其次更有权贵奏荫子弟入馆之例。

馆职之滥既如此，自然校勘事业深受影响。《梦溪笔谈》卷七说：

> 旧校书官多不恤职事，但取旧书，以墨漫一字，复注旧字于其侧以为日课。

《枫窗小牍》（作者不详）又载一故事说：

> 陈从易得与太清楼校勘。天圣（仁宗年号）三年（1025年）六月，陈以《十代兴亡论》妄加涂窜，同官皆降职。（又见《宋史》本传）

由上可知当时馆阁校书诸官的敷衍塞责了。所以欧阳修在庆历三年（1043年）上书主张：馆阁校书官不依例任发运转使、知

州等，主张规定馆阁合存人数，主张馆阁中的富家子弟，没有显著成绩者不得以年深迁补龙图阁、昭文馆，朝廷虽纳其疏，但流弊积重难返，此风迄未能息。

明代馆阁藏书虽多，但相当杂乱。积历年久，不无鼠蠹；经赅人众，不无散失。管理内阁藏书的官，半系赀郎（以钱财运动得来官职的人），对四部分法不懂，加以职位卑微，馆阁之臣借书，往往有借无还，他们也管不了。仁宗、宣宗以后各代皇帝，多不好文，不再留意查核。内阁的藏书，遂致缺轶过半了。对于当时内阁藏书的散乱，明熹宗天启时的太监刘若愚述之颇详：

凡司礼监经厂库内所藏祖宗累朝传遗秘书典籍，皆提督总其事，而掌司、监工分其细也。自神庙（孔圣庙）静摄（没有整顿）年久，讲幄尘封，右文不终，官如传舍，遂多被匠夫（工匠）厨役偷出货卖。柘（zhè）黄（以柘木染黄）之帖，公然罗列于市肆中。而有宝（皇帝的印玺）图书，再无人敢诘其来自何处者。或占空地为圃，以致版无晒处，湿损模糊。甚至劈毁以御寒，去字以改作（改作家具）。即库中见贮之书，屋漏浥损，鼠啮虫巢，有蛀如玲珑板者，有尘黴（mèi，黑面）如泥板者，放失亏损，日甚一日。若以万历（神宗年号）初年较，盖已十减六七矣。既无多学博洽之官，综核齐理；又无簿籍数目可考，以凭销算。盖内官发迹，本不由此；而贫富升沉，又全不关乎贪廉勤惰。是以居官经营者，多长于避事，而鲜谙（ān）大体。故无怪乎泥沙视之也。然既属内廷库藏，在外之儒臣，又不敢越俎条陈，曾不思难得而易失，世间书籍为最甚也。（见《酌中志》）

第五章　校勘的全盛期

校勘始于孔子，昌于西京，明于宋代，而极盛于有清。汉以经术胜，宋以理学胜，而清则以治学胜。清人的校勘，不仅能利用科学方法以正古书版本文字之误，而且还能用科学方法以正古人立说之误。

清儒对经史子集，皆在研究之列。然经子诸书，经数千年之传刻伪托、错简讹字，缪误百出；且古今异时，音义屡变，其在古代视为最浅近之文，在后世亦苦其艰涩难读，所以校勘训诂，便为读古书所必需。其中取得显著成绩者，如戴东原、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阮元、孙诒让等之于经，王鸣盛、王先谦、章学诚等之于史，王念孙、俞樾、孙诒让等之于子，蒋骥、仇兆鳌、冯浩等之于集，顾炎武、戴东原、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桂馥、郝懿行、朱骏声、王筠等之于小学，都立了大功。

第一节　鼎盛的背景

清代校勘事业之盛，既是清儒主观努力的结果，也是客观形势使然：

1．清以异族入主中国，汉族人民反对，所以就采用高压政策，凡是汉人聚众讲学，会盟结社，都严加禁止。又大兴文字狱，如康熙朝庄廷钺的《明史》狱：顺治时，延聘名士修辑《明史稿》（明故相乌程朱国桢本），补入崇祯朝事，名曰《明史辑略》。中多触犯忌讳之语，被控成大狱。时廷钺已死，发墓焚骨。弟廷钺见杀，父允城死狱中，妇女充军边地，牵连死者达七十余人。戴名世的

《南山集》狱：戴，康熙进士。留心明代史迹。后因所著《南山集》用了明永历（桂王由榔）年号，坐大逆伏法，株连获谴者数十人。雍正朝曾静、吕留良之狱，乾隆朝胡中藻之狱，徐祖夔之狱，等等：这些文字狱，株连很广，残酷备至。所以英俊之士，其聪明才智，无所发抒，才把岁月消磨于章句训诂的钻研之中，以韬光敛迹。

2． 清廷对汉人的另一手是牢笼政策。清廷鉴于汉人之好学，为笼络汉人，消灭其排满意识，所以也提倡学术，不遗余力，诱之以利禄，使消耗其精神于故纸堆中，而学者也甘心以此终老。

3． 清儒因鉴于晚明不学之弊，乃读古书。而欲读古书，要先识古字，所以《说文》之学兴。然古书的难读，不仅在字形，更在字音，所以音韵之学又随之而兴。这样就由识字形而知字音，由知字音而明训诂，所以训诂之学又随之而兴了。但古书因辗转抄刻，讹误不少；加以历代浅人，妄自臆改，多非其旧。因此要读懂古书，尤须先事校勘，于是校勘之学又随之而兴了。

4． 明末清初，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清朝前期，欧风东渐，西学逐步传至中国，影响了学术研究的方法。清儒治学，富有科学精神，与此亦有关。

第二节 清儒校勘的方法

清儒校勘的成绩，当然令人崇敬，但其校勘方法的精密，更是令人钦仰。

1． 用多本对照，或根据前人的征引，记其异同，择善而从。各书多有俗本传刻，因传刻者大意或妄改而发生讹舛。如有宋元刻本或精钞本以及各种类书征引的文字，便可两两勘比校正。不

过这种工作的成绩有高下之分。下等的只能校出某本作某，稍为细心耐烦的人便可做到。高等的须凭判断力，定出某本作某为是，这就非有相当的学力不能胜任了。

2. 根据本书或他书的本证、旁证、反证，校正文句原始的讹误。这方法又可分为两种：一是本书文句与他书互见者。如《荀子·劝学》，可以用《大戴礼·劝学》相勘比。《韩非子·初见秦》，可以用《战国策·秦策一》相勘比。《礼记·月令》亦见《吕氏春秋》、《淮南子》。只须知道这一篇在他书中有无同文，便可两相对照。二是无他书可比，专从本书各篇所用的语法词例上注意，或细观一段中前后文义，以意逆志，发现今本讹误之点，这种方法，非眼光锐敏、心思缜密、作风谨严不能为，否则很易发生武断臆改之弊。

3. 根据所发现的著书人原定的体例，刊正全部所有的讹误。古书往往因钞刻疏忽而致颠倒紊乱，或经后人妄改，全失其真。其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将现行本未经窜乱妄改之处，作精密详慎的研究，求得著作的义例，据之以订正全书。不过应用这种方法应该慎重，以求得其本来的义例，解决问题。否则会自作聪明，强古人以就我，结果将原书搞得更加紊乱，陷于宋、明人臆改的恶习。

4. 根据别的材料，校正原书的错漏。以上三种方法，大都是校正因钞刻所致的错误，以力求回复古书本来的面目。第四种方法，则是撇开钞书匠和刻书匠，直接与原著者"算账"，方法也有两种：一是在本书的材料中，根据其自相矛盾的地方，以正其失。如《史记》记战国时事，《六国表》与各《世家》《列传》若有不同，便以互相参校。二是根据他书与本书的矛盾校正。如《三国志》的记事，和《后汉书》很多地方都有不同点，也可以彼此参互改正。

第三节　清代校勘事业的初期和全盛期

明末清初，士子受王阳明理学只讲“良知”的哲学思想的影响，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便有人起来大倡“舍经学无理学”之说。

清代反对理学最早的学者，首推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顾炎武，字宁人，号亭林。他看到晚明学者深为王阳明的“良知”学说所濡染，竟至日聚宾客门人数十百人，清谈心性，空空洞洞，不可捉摸，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不管时局之困难以至亡国，所以攻击王氏之学最为得力。他说：

> 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百有余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拨乱反诸正，岂不在后贤乎？”（《日知录》卷18）

又说：

> 今之学者，偶有所窥，则欲废尽先儒之说而驾其上；不学则借“一贯”之言以文其陋，无行则逃之“性命”之乡，以使人不可诘。（同上）

顾氏根本就不承认理学之所以为学，他认为“经学即理学”，以“崇尚实学”为号召，树立了清代校勘学的基础。

他研究的范围很广，凡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金石音韵，无不穷究源委，但以经学为中坚。其治经的工具有二：一曰字学，一曰音学。他认为要研究经文，必先要懂得古书的字义和音读。

顾氏所著音学的巨著叫《音学五书》。他在《自序》中说：

予纂辑此书，几三十年，所过山川亭障，无日不以自随。凡五易稿而手书者三矣。

可见其用力之勤与成书之难了。至其研究的方法，在他的《自序》中亦说得明白：

世日远而传日讹。此道之亡，盖二千有余岁矣！炎武潜心有年，既得《广韵》之书，乃始发悟于中，而旁通其说。于是据唐人以正宋之失，据古经以正沈氏（沈旋，沈約子）、唐人之失。

又他的《音论》说：

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采之他书也。二者俱无，则宛转以审其音，参伍以谐其韵。

可见他的精神在于广求证据，互相参验而后始定其说。他的论点至江永、戴震、段玉裁，虽各有纠正，但不过是就其说而精益求精而已。

他发明音学，用作治经的方法，在学术上是他最大的贡献。其次是他治学注重创造性和实用性，也很值得称述。他说：

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日知录·自序》）

又说：

子书自《孟》《荀》而外，如《老》《庄》《管》《商》《申》《韩》，皆自成一家言。至《吕氏春秋》《淮南子》则不能自成，故取诸子之言汇而为书。此子书之一变也。今人书集，一一皆出其手，必不能多，大抵如《吕氏》《淮南》之类耳。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庶乎其传也欤！（《日知录》卷19）

顾氏自己就是这样做的，他所著各书，无一语蹈袭古人。这说明

他从语言至行动，都贵乎新创。

他目击明人以空谈性理而致亡国，故其治学，都从经世致用方面着手。我们看他所著《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等书，便知他关于民生利病、经济制度之论居多。他说：

> 孔子之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水火之心。……故曰载之空，不如见诸行事。……愚不揣有见于此，故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亭林文集·与友人书》）

可见他对于实用性的重视了。

顾炎武这些论点，对我们从事校勘工作，很有启发。我们对某书的校勘，可以利用别人研究的成果。但如果自己校勘某书，没有创造性的劳动参加进去，没有新的东西参加进去，只是人云亦云，就不必校勘了。又所校的书，如没有实用价值，也没有校勘之必要。

顾氏的弟子，最著名的有张弨、潘耒。张弨所校的有娄机的《汉隶字原》。他的《叙》说：

> 自隶变篆以就省，而碑版各家，可以随意增减点画，改易偏旁，好异尚奇，贻误后学，今悉准之《说文》。

潘耒著有《类音》八卷，审辨通微，亦足成一家之言。

清代的校勘，自顾炎武开其端以后，阎若璩、胡渭等人，都以毕生之力，一意治经，其成绩已接近乾嘉学者。但此时方法未精，所以校勘精核者甚少。而且当时的儒者，喜谈经国政要，更以理学的残余影响，即以专攻伪经的阎氏、富有怀疑精神的胡氏而论，仍不免有混杂前人之论和抉择不严之病。直至惠栋，严画汉、宋之界，汉学才有森严的壁垒，清代才定汉学于一尊。到了戴震，始由好古而进为精核，由精核而进为创造，提倡考证的精

神，建立校勘科学的方法，校勘才进入全盛期。其时人才辈出。从其治学的态度来看，可分为：

1. 吴派，以惠栋为始祖。后继有江声、余萧客，而王鸣盛、钱大昕、汪中等，都发扬了他的学说。

2. 皖派，以戴震为首领。后继有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而卢文弨、俞樾、孙诒让等，都与此派接近。

吴派的精神在谨守家法，笃信汉儒，多泥于古；见异于今者则从之，大都不论其是非。如惠栋《九经古义述首》说：

> 汉人通经有家法，故有《五经》师。训诂之学，皆师所口授，其后乃著竹帛。所以汉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并行。……古字古音，非经师不能辨。……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

又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说：

> 治经者，断不敢以经驳经。……岂特不敢驳经而已，古文艰奥难通，若于古传注凭己意择取融贯，犹未免于僭越。但当墨守汉人家法，定从一师而不敢他徙。

可见吴派是以"古不古"为是非的标准。所以梁启超把它概括为"凡古皆真，凡汉皆好"。他们这一派的弊病，在于盲从、固执，好排斥异己，致使启蒙期的怀疑精神、批评风气，几濒于灭绝。但比较过去那些凿臆空谈、信口雌黄者，仍胜一筹。

皖派的精神是：不但推翻对汉儒的绝对信仰，即对古书也大加疑惑。对任何人的话，都不肯随便置信，而必求其所以然。如戴震所说：

> 汉儒训诂，有师承，有时亦傅会；晋人傅会凿空益多；宋人则恃胸臆以为断。故其袭取者多谬。而不谬者，反在其所弃。……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坐（守定）为古圣贤立

言之意，而言语文字实未之知。其于天下之事也，以已所谓理强断行之；而事情源委隐曲，实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东原集·与某书》)

戴震又说：

凡仆所以寻求于遗经，惧圣人之绪言闇汶于后世也。然寻求而获，有十分之见，有未至十分之见者。所谓十分之见，必征诸古而靡条不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毕究，本末兼察。若夫依于传闻以拟其是，择于众说以裁其优，出于空言以定其论，据孤证以信其通；虽溯流可以知源，不目睹渊源所导；循根可以达杪，不手披枝肄(长cháng)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见也。以此治经，失"不知为不知"之意，而徒增一惑，以滋(增益)识者之辨也。……既深思自得而近之矣，然后知孰为十分之见，孰为未至十分之见；如绳绳木，其曲于是可见也；以水准地，昔以为平者，其坳于是可见也。夫然后传其信，不传其疑，疑则缺，庶乎治经不害。(《东原集·与姚姬传书》)

可知戴东原关于考证所要求的，是第一手材料。用作证据，论点在各方面都说得通，才是"十分之见"。一时还不能解决的问题，则暂时搁着。这的确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戴派对于古书的错误，勇于改正，但并非妄改。王引之说：

吾用小学校经，有所改，有所不改。周以降，书体文七变，写官主之。写官误，吾则勇改。孟蜀(孟知祥称帝，国号后蜀)以降，槧工主之，槧工误，吾则勇改。唐、宋、明之士，或不知声音文字而改经，以不误为误，是妄改也，吾则勇改其所改。若夫周之末，汉之初，经师无竹帛，异字博矣，吾不能择一以定，吾不改。假借之法，由来久矣，其本字什八

可求，什二不可求。必求本字以改假借字，则考文之圣之任也，吾不改。写官、椠工误矣，吾疑之且思而得之矣，但群书无佐证，吾惧来者之滋口也，吾又不改。（《定盦全集·工部尚书高邮王文简公墓表》引）

戴派校勘的特点，不仅在改正古书文字的错漏及纠正古儒的误解，同时更能利用客观的考查证验以校正其立说的是非。段玉裁说：

校书定是非最难。是非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说之是非。必先定底本之是非，而后可断其立说之是非。……何谓底本？著书者之稿本是也。何谓立说？著书者所言之义理是也（指注家的立说）。……不先正底本，则多诬古人；不断其说之是非，则多误今人。（《经韵楼集·与诸同志论校书之难》）

吴皖二派治学的态度不同，但他们对于治学条件的要求，却大致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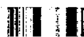
1. 识文字。文字由大小篆而隶书，而真书（正书、楷书），而草书。古书由金石而竹简，而缣素，而为纸。其变迁既频，而为误必多。故必先识文字之形及其变迁之迹，而后才能求其致误之由。这是戴派治学最初的门径。戴震说：

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词也；所以名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考诸篆书，得许氏《说文解字》。三年知其节目，渐睹圣人制作之始。（《东原集·与是仲明论学书》）

惠栋也说：

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九经古义·述首》）

2. 通训诂。训诂本用以解经。所以学者当广求古义，取本经的训诂与传注的训诂，考其究竟，明其所以，而后才能免凿空



妄谈之讥。如戴派的卢文弨说：

> 不识训诂，则不能通六艺之文而求其义。（《抱经堂文集·尔雅汉注·序》）

惠派的钱大昕也说：

> 有文字而后有训诂，有训诂而后有义理。训诂者，义理所由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者也。（《潜研堂集》）

3. 明声假。古代的语言，和今天的语言不同。况古人文字，多用假借之例，不特寓其音，并可通其字。既假其义，音同而义亦随之。故尤须通声音假借之例，始可语此。这是戴派最重视之点。段玉裁说：

> 治经莫重乎得义，得义莫切于通音。……不熟于古形古音古义，则其说之存者，无由甄综；其说之亡者，无由比例推测。（《经韵楼集·王怀祖广雅疏证·序》）

王念孙说：

> 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本字，则涣然冰释。如其假借之字而强为之解，则诘鞫（穷困）为病矣。（《国朝先正事略》卷十七）

惠派的王鸣盛说：

> 经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十七史商榷·序》）

钱大昕说：

> 汉人言"读若"者，皆文字假借之例。不特寓其音，并可通其字。即以《说文》言之，"鄦"读若"蓟"，《礼记》封黄帝之后于蓟，不必从"邑"从"契"也。……以是推之，许氏所云"读若""读如"，皆古书假借之例。假其音，并假其义，

音同，而义亦随之。非后世譬况为音者可同日而语也。(《潜研堂集·古同音假借说》)

上面已谈到吴皖二派治学态度的不同。这里再补充一下。戴派如王念孙认为：

说经者，期于得经意而已。前人传注不皆合于经，则择其合于经者而从之。其皆不合，则以己意逆(度)经义，而参之他经，证以成训，虽别为之说，亦无不可。必欲专守一家，无出无入，则何劭公(何休)之墨守而已。(《国朝先正事略》)

这就比惠派的主张进步多了。惠派认为凡学说出于汉儒者，皆当遵守，不能稍改，其有敢指斥者，则目为信道不笃。实在是食古不化。难怪戴派在清代学术界中占优势了。

第四节　目录学和版本学

目录学　张尔田说：

大哉，校雠之为学也！非其人博通古今学术，而又审辨乎源流得失，则于一书旨意，必不能索其奥而诏方来。(《刘向校雠学纂微·序》)

上文已经说过，校雠包括以众本校一书，撮指意而为叙录，寻源流而别部居。但汉代以后，私家校理图书，或专勘比文字异同，或专记载板本，或专编次书目，校雠学便分别发展为校勘学、版本学、目录学了。

目录之所以成学，大概起于乾隆末年。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说：

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总是乱读。

目录学从此挂起了招牌。从而和之者也不乏人。如张尔田说：

《隋书·经籍志·簿录篇》云："古者史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汉时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剖析条流，各有其部，推寻事迹，疑则古之制。"知校雠者，目录之学也。（《刘向校雠学纂微》）

又孙德谦说：

郑樵《通志·校雠略》，其论编次者，为目凡七。……夫《校雠略》中而备论编次之事，则校雠者，乃目录之学，非仅如后世校雠家但辨订文字而已，是可知也。（同上）

但也有人反对目录学脱离校雠学而独立，如章学诚。他在《信摭》中说：

世之论校雠者，惟争辨于行墨字句之间，不复知有渊源流别矣。近人不得其说，而于古书有篇卷参差、叙例异同、当考辨者，乃谓古人别有目录之学，真属诧闻。

乾嘉以前，一般学者只承认有目录，而不承认有目录学，认为只有校雠学。本来，在晋、宋以前，目录都由校雠而来。目录学如果有，也只是校雠学的一部分。后世书籍日多，目录学便逐渐脱离校雠学而独立了。

版本学 校勘一书，必集众本，西汉已开其端。历代校勘，相沿成风。宋岳珂校刊《九经三传》，所据版本有二十多种。校勘家之辨别版本，宋代已然。至藏书家之记载版本，当从宋尤袤的《遂初堂书目》始。目中所录，一书多至数本，有成都石经本、秘阁本、旧监本、京本、江西本、吉州本、杭本、旧杭本、严州本、越州本、湖北本、川本、川大字本、川小字本、高丽本等。自此以往，藏书家也兼言版本了。但那时只以镂板盛行，各种刊本格式不同，所以藏书家专事搜罗，以示其藏书的丰富，还无所谓版

本学。

清朝一代学者，以元明刊本恶劣，乃不得不上寻古钞旧椠，以为依据。然人情诈伪，书商诡计多端："割首尾，易序目，剔画以就讳，刓(wán,削)字以易名，染色以伪旧；卷有缺，刬(chǎn)他版以杂之；本既亡，录别种以代之。"(见吴骞《拜经楼藏书题跋记·蒋序》)也有假造宋版书的。所以所有校勘学家，不得不精考版本的源流，刊刻的年月、人名、纸墨、款式、前后序跋、收藏图印等，免至为俗刻伪造所误。因此版本学就随之而兴，版本学家也随之而起了。

版本学其始不过藉以辨别真伪，为校勘古书的依据。如钱大昕的《竹汀日记》、黄丕烈的《士礼居藏书题跋记》、顾广圻的《思适斋集》、孙星衍的《平津馆鉴藏书记》、吴骞的《拜经楼藏书题跋记》(其子苏阁辑)、陈鳣的《曝书杂记》等，皆以校勘而兼治版本学。及其末流，则成为一种骨董式的鉴赏，以自诩其奇秘为事了。陈其元《庸间斋笔记》载一故事说：

> 好古者重宋版书，不惜以千金数百金购得一部，则什袭(重叠装裹)藏之，不轻示人。即自己亦不忍数翻阅也。余每笑其痴。王鼎臣观察定安酷有是癖。宰昆山时，得宋椠《孟子》，举以夸。余请一观，则先令人负一椟出。椟启，中藏楠木匣。开匣，乃见书。书之纸墨亦古。所刊笔画，亦无异于今之监本。余问之曰："读此可增长智慧乎？"曰："不能。""可较别本多记数行乎？"曰："不能。"余笑曰："然则不如仍读今监本之为愈耳！奚必费百倍之钱以购此耶？"王恚曰："君非解人，不可共君赏鉴。"急收弆(jǔ,藏)之。余大笑。

清末叶德辉著《书林清话》十卷，专谈版本的沿革。元和(清县名，在江苏)江标又著《宋元本行格表》二卷，也是版本学的著

作。由是版本学与目录学并驾齐驱了。由此校勘便分为目录的校勘、版本的校勘和书籍的校勘三种。

第五节 《四库全书》的校理

古书自西刘汉向一度校理后，其余各代，虽亦有校理，然多为文字异同的校勘及著录的分类而已。直至二千余年后乾隆时代，才又有大规模的校理，这就是《四库全书》的开馆编修。

乾隆的文德武功，为清朝诸帝之最。他即位之初，即诏令中外搜访遗书，并令儒臣校勘《十三经》《二十一史》，复开馆纂修《纲目三编》（《纲鉴》《纲鉴补》《纲鉴易知录》）《通鉴辑览》及《三通》（《通典》《通志》《通考》）诸书。于三十七年（1772年）再下诏采集天下遗书。这时学士朱筠又上书请开馆校书。据《四库全书答问》，其要点是：

1．旧本抄本，尤当急搜也。……其九流百家，子余史别，往往卷帙不过一二卷，而其书最精。是宜首先购取，官抄其书，给还前书。

2．中秘书籍当标举其现有者，以补其余也。……外书既可以广中书，而中书亦用以校外书。……取其（指《永乐大典》）中古书完者若干部，分别缮写，各自为书，以备著录。

3．著录校雠并当重也。……请皇上诏下儒臣，分任校书之选。或依《七略》，或准四部，每一书上，必校其得失，撮举大旨，叙于本书卷首，并以进呈。

4．金石之刻，图谱之学，在所必录也。……于收书之外，兼收图谱一门。而凡直省（指直属的省份）所存钟铭碑刻，悉宜拓取，一并汇送。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便诏派军机大臣（综理内外要事之长官）为总裁官，分派各馆修书、翰林等官，往翰林院取所藏《永乐大典》，详加检阅，并以《图书集成》互为校核，择其未经采录、足以启迪后学、广益多闻而实在流传已少者，缮写成书，共得逸书三百八十五种，计四千九百二十六卷。

这时各省采进的书，不下万种，而以浙江为最多。凡进书十二次，共计四千五百二十三种，五万六千九百五十五卷。(内有二千〇九十二册无卷数。)乾隆于是诏命并内府藏书，开四库馆校正缮写，赐名《四库全书》。以纪昀、陆锡熊等为总纂官。在职者凡三百六十人，抄胥一千五百人。自乾隆三十八年起，迄四十七年(1782年)告成。总计存书三千四百五十七部，七万九千零七十卷，存目六千七百六十六部，九万三千五百五十六卷。分装三万六千册，六千七百五十二函。分写七部：一置紫禁城(又名紫金城)内的文渊阁，一置圆明园内的文源阁，一置于奉天的文溯阁，一置于热河的文津阁。这四处称为内廷四阁。其后又命建文汇阁于扬州大观堂，文淙阁于镇江金山寺，文澜阁于杭州圣因寺，也各藏全书一部，称为江浙三阁。并于五十五年(1790年)六月，诏许士子入内阅览抄录。

《四库全书》卷帙浩繁，其编修期间采书至还书的手续是：

1. 采书手续。各督抚访得遗书后，在坊肆者，或量给代价。家藏者，或官为装印。只系钞本者，缮录副本。先将各书叙列目录，注明系某朝某人所著，书中要旨何在，简明开载，具折奏闻，候令汇齐送馆校辨。

2. 校书手续。馆员将送进各本，互为校核，考字画之讹者，卷帙之脱落者，篇第之倒置，与他本之互异，是否不谬于圣人，及晁公武、陈振孙诸人议论之不同，撰为各书考证。又将书中要

旨概括，总叙厓略。并详著书人世次爵里，撰为各书提要。再行择叙简明略节，并注明应刻、应钞、应存书目，签粘各书开卷副页右方，进呈阅览，听候上谕定夺。

3．辑书手续。辑录《永乐大典》，亦系先将原书详细检阅，并将《图书集成》互为校核。择其未经采录而实在流传已少但尚可裒缀成编者，先行摘开目录奏闻，候旨裁定。其校辨手续，与各省送到遗书相同。

4．钞书手续。校核各本，奉旨决定后，即交馆中缮写处，缮写成册。须俟乾隆帝信手抽阅，不见讹舛，始作为定本。办书期届五年时，曾将校对誊录诸人，议叙实官。

4．原书手续。敕撰本及内府本，用后仍退送原处存贮。各省采进本、私人进献本及通行本，如系购进，汇交武英殿另行陈设收藏，借用者则原本付还本家。

6．还书手续。借钞之书，于进呈时，即在各书页面标记藏者姓名，进到年月，以便给还。还书时，在外省者，由各督抚派员领回，分送本家。在京者，亲赴书馆领回。

从上所述，可知征集处理书籍和组织工作，均非常严密。至于校雠的方法，据《四库总目凡例》所记是：

1．辨证真伪。其有本属伪书，流传已久，或掇拾残剩，真赝相参，历代词人，已引为故实，未可概为捐弃，则姑录存而辨别之。大抵灼为原帙者，则题曰某代某人撰。其踵误传讹，如吕本中（世称东莱先生）《春秋传》，旧本称吕祖谦（也世称东莱先生）之类，其例亦同。至于其书虽历代著录，而实无一可取，如《燕丹子》、陶潜《圣贤群辅录》之类，已知其妄者，则亦存目，不使滥登。

2．叙录原则。兹所刊各书，各撰为《提要》，分之则散弁（以

之为首）诸编，合之则共为总目。每书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论世知人。次考本书之得失，权众说之异同，以及文字增删，篇帙分合，皆详为订辨，巨细不遗。而人品学术之醇疵，国纪朝章之法纪，亦未尝不各昭彰瘅（明善恶好坏），用著劝惩。又因主于考订异同，别白得失，故辨驳之文为多。然大抵于众说互殊者，权其去取；幽光未耀者，加以表彰。至于班、马之史，李、杜之诗，韩、柳、欧、苏之文章，濂洛关闽（濂溪周敦颐、洛阳程颢程颐、关中张载、闽中朱熹）之道学，定论久孚，无庸更赘一语，则但论其刊刻传写之异同、编次增删之始末，著是本之善否而已。盖不可不辨者，不敢因袭旧文；无可复议者，亦不敢横生别解。凡以求归至当，以昭去取之至公。

3．厘（整理）定部居。经部分十类，史部分十五类，子部分十四类，集部分五类。或流别繁碎者，又各析子目，使条理分明。……又典籍著录，自《隋志》以下，门目大同小异，互有出入，亦各具得失。兹则择善而从。如诏令奏议，《文献通考》入集部。兹以其事关国政，诏令从《唐志》例入史部，奏议从《汉志》例亦入史部。……

4．改正部次。古来诸家著录，往往循名失实，配隶乖宜。……兹则考校原书，详为厘定。其与前人不同者，如《笔阵图》之属，旧入小学类，今惟以论六书者入小学；其论八法者，不过笔札之工，则改隶艺术。《羯鼓录》之属，旧入乐类，今惟以论六吕者入乐；其论管弦工尺者，不过世俗之音，亦改隶艺术。……《汉武帝内传》《飞燕外传》，旧入传记类；兹以其或涉荒诞，或涉鄙猥，均改隶小说。……

5．著录条例。著录各书，各以时代为次。其历代帝王著作，从《隋书·经籍志》例，冠各代之首。其余概以登第之年、生卒之

岁，为之排比。或据往来倡和之人为次。无可考者，则附本代之末。释道闺阁，亦各从时代，不复区别。宦侍外国之作，亦随时代编入。诸书次第，虽从其时代，至于笺释旧文，则仍从其所注之书，而不论作注之人。

6．取舍标准。儒者著书，往往各明一义，或相反而适相成，或相攻而适相救，所谓言岂一端，各有当也。考古者无所别裁，则多歧而太杂；有所专主，又胶执而过伪。左右佩剑，均未协中。兹所采录，惟离经叛道，颠倒是非者，掊（pǒu，抨击）击必严；怀诈挟私，荧惑视听者，屏斥必力。至于阐明学术，各撷（xié，取）所长，品骘（zhì，定）文章，不名一格，则兼收并蓄。……盖以阐圣学明王道者为主，不以百氏杂家为重也。文章流别，历代增新。古来有是一家，即应立是一类；作者有是一体，即应备是一格：斯协于全书之名。故释、道外教，词曲末技，咸登简牍，不废搜罗。然二氏之书，必择其可资考证者。

综观上文，可见清代编修《四库全书》，审核之密、取舍之严、考据之精、分类之细、著录之富，实为过去所仅见。这次编校，虽则是为了牢笼汉人，使之毕生精力消耗于故纸堆中，磨灭其排满的心理，以巩固满清的统治。不过，这对于被保存下来的书籍来说，在客观上，这次校理的确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许多已经散失了的书，也幸而因此被保存下来，确为保存我国灿烂悠久的文化遗产，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六节　清代重要的校勘家

惠栋、余萧客、王鸣盛和钱大昕　这是吴派，皆乾隆时人。惠栋字定宇，著有《九经古义》，所解者是《周易》《尚书》《毛诗》《周礼》

《仪礼》《礼记》《左传》《公羊》《谷梁》《论语》十经。其中《左传》六卷，后更名《补注》，刊板别行，故惟存其九。其书皆搜集旧文，互相参证。但因好古之故，不免有曲徇古人、失之拘执及为例不纯之处。王引之评曰："惠定宇先生考古虽勤，而识不高，心不细，见异于今者则从之，大都不论是非。"(《焦氏丛书·王伯申手札》)

余萧客著《古经解钩沉》三十卷，解的是《十三经》。此书搜集唐以前诸儒训诂之说，其书尚存者不载，或名存而其说不存者亦不载。其余则自诸家经解所引，旁及史传类书，凡唐以前之旧说，有片语单词可考者，悉著其目。并以北宋精本参校，正前明监板之讹误。可见这书是辑佚及文字校勘之作。其价值在于辑收先儒之遗说，使散失了的遗说，重新集合起来，便于阅览。

王鸣盛，康熙乾嘉时人。他虽墨守汉人家法，然最重实际的考核，而深恶空论。著有《尚书后案》，发挥郑玄一家之学。其最费力的著作，则为《十七史商榷》一百卷。内分《史记》六卷，《汉书》二十二卷，《后汉书》十卷，《三国志》四卷，《晋书》十卷，《南史》《宋书》《齐书》《梁书》《陈书》共十二卷，《北史》《魏书》《齐书》《周书》《隋书》共四卷，《新旧唐书》二十四卷，《新旧五代史》六卷，《缀言》二卷。书中注重校勘本文，补正讹脱，于事迹的虚实、纪传的异同，及舆地职官典章名物，尤为加详。他怎样校勘呢？他在《十七史商榷·序》中说：

> 二纪以来，恒独处一室，覃思史事。既校始读，亦随校随读。购借善本，再三雠勘。又搜罗偏霸(割据国)杂史稗官野乘山经地志谱牒簿录，以暨诸子百家小说笔记诗文别集释老异教，旁及于钟鼎尊彝之款识，山林冢墓祠庙伽蓝碑碣断阙之文，尽取以供佐证。……凡所考者，皆在简眉牍尾，字细如蚁，久之皆满，无可复容，乃誊于别帙而写成净本，都

为一编。……闭馆自携，寒灯细展，指瑕索瘢，重加点窜，至屡易稿始定。

其搜罗之苦，用力之勤，堪作榜样。关于他治史务实的精神，他在《序》中又说：

大抵史家所记典制，有得有失，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也；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俾数千百年建置沿革，了如指掌，而或宜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择焉可矣。其事迹则有美有恶，读史者亦不必强立文法，擅加与夺，以为褒贬也；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俾年经事纬部居世次记载之异同，见闻之离合，一一条析无疑，而若者可褒，若者可贬，听之天下之公论焉可矣。书生胸臆，每患迂愚，即使考之已详，而议论褒贬，犹恐未当，况其考之未确者哉？

钱大昕，雍正乾隆嘉庆时人，王鸣盛的妹夫。治学审慎之至。他《答王西庄书》说得好：

愚以为学问乃千秋事，订讹规过，非訾毁前人，实以嘉惠后学。但讥论须平允，词气须谦和。一事之失，无妨全体之善。不可效宋儒所云，一有差失，则余事无观耳。郑康成以祭公为叶公，不害其为大儒；司马子长以子产为郑公子，不害其为良史。言之不足传者，其失固不足辨。既自命为立言矣，千虑容有一失。后人或其言而信之，其贻害累于古人者不少。去其一非，成其百是，古人可作，当乐有诤友，不乐有佞臣也。且其言而诚误耶？吾虽不言，后必有言之者，虽欲掩之，恶得而掩之？所虑者古人本不误，而吾从而误驳之，此则无损于古，而适以成吾之妄。王介甫、郑渔仲辈皆坐此病，而后来者宜引以为戒也。（《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五）

钱大昕对经史金石算术，无不通晓。著述极多，但说经的专

书没有。只在《十驾斋养新录》和《潜研堂文集》有精审的论述。其《竹汀日记》则为专记书史之作。而其重要的贡献，则在于校勘。其校勘的著作，以《二十二史考异》为代表。此书专主校勘、考订，其价值在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之上。二十二史之目为：《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唐书》《旧唐书》《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为什么写这本书？他著述的态度怎样？他的《自序》说：

> 夫史之难读久矣。司马温公撰《资治通鉴》成，惟王胜之借一读。他人读未尽十纸，已欠伸思睡矣。况二十二家之书，文字烦多，义例纠纷。地则古今异名，侨置殊所；职官则沿革迭代，冗要逐时。欲其条理贯串，了如指掌，良非易事。以予佇(níng，困)劣，敢云有得？但涉猎既久，启悟遂多，著之铅椠，贤于博弈云尔。且夫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拾遗规过，匪为龄龁(yǐhé，毁伤)前人，实开导后学。考古者拾班、范之一书，擿沈(约)萧(子显)之数简，兼有竹素烂脱，豕虎传讹，易"斗分"为"升分"，更"子琳"为"惠琳"，乃由校书之陋，本非作书之愆，而皆文致小疵，目为大创，驰骋笔墨，夸曜凡庸，予所不能效也。更有空疏措大，辄以褒贬自任，强作聪明，妄生疻痏(zhǐwěi，殴伤的疮)，不叶年代，不揆时势，强人以所难行，责人以所难受，陈义相高，居意过刻，予所不能效也。桑榆景迫，学殖(学业的进修)无成，惟有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自知盘烛之光，必多罅漏，所冀有道君子，理而董之。

戴震、段玉裁和王念孙　戴震是雍正乾隆时人。乾隆三十八

年(1773年)入四库馆，晨夕校著，靡间寒暑，四年之间，校著之书，约十七种，皆精核绝伦，不涉空浮。积劳成疾，病中犹校著不辍，乾隆四十二年夏五月卒，年仅五十五。他所校的书，有《周髀算经》二卷，《九章算术》九卷，《五经算术》二卷，《海岛算经》一卷，《孙子算经》三卷，《张丘建算经》三卷，《夏侯阳算经》三卷，《五曹算经》五卷，《辑古算经数术记遗》(以上均《孔氏微波榭算经十书》刻本)；有《仪礼集释》《仪礼仪释宫》《仪礼识误》(以上武英殿聚珍板本)；有《大戴礼》《水经注》等。以上各书，校勘均极精赅，而尤以《水经注》为其毕生精力之结晶。这书自明以来，绝无善本，即朱谋玮所校刻之本，也舛讹相仍。戴震校此书，始于乾隆乙酉(1765年)之夏，越八年刊于浙东，未及四分之一而奉召入京，与修《四库全书》。在京又得《永乐大典》本，兼有郦道元《自序》，乃仍其四十卷，而以平日所得，及所发现经注分别之例：1. 经文首云某水所出，以下不更举水名；注则详及所纳群川，更端屡举。2. 各水所经州县，经但云某县；注则年代既更，旧县或湮或移，故常称某故城。3. 经例云"过"，注例云"迳"。他都各案水名，逐条参校，非惟字句之讹，层出叠见，其中脱简错简，有自数十字至四百余字者。更博考唐以前之撰著，若《通典》《初学记》诸书所引，钩稽校勘，参互考证，凡补其缺漏者二千一百二十八字，删其妄增者一千四百四十八字，正其臆改者三千七百十五字。三、四百年的疑窦，涣然冰释。所以朱筠称之为近来校雠绝无之本。

这成绩的取得，和他治学的态度是分不开的。他治学一定要追本寻源，决不肯漫然置信。洪榜《初堂遗稿·戴先生行状》讲了他一个有趣的故事：

生十岁始能言，入塾读书，塾师授以《大学章句》，至"右

经一章……"，问塾师曰："此何以知其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其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师应之曰："此先儒朱子所注云尔。"即问："朱子何时人也？"曰："南宋。"又问："孔子、曾子何时人也？"曰："东周。"又问："宋去东周几何时？"曰："几二千年矣。"又问："然则朱子何以知其然？"师无以应，大奇之。

他治学反对私智穿凿，又全不为名。他在《东原集·答郑用牧书》一文中说：

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有名之见其弊二，非掊击前人以自表暴，即依傍昔儒以附骥尾。二者不同，而鄙陋之心同。……私智穿凿者，或非尽掊击以自表暴，积非成是，而无从知，先入为主，而惑以终身。或非尽依傍以附骥尾，无鄙陋之心，而失与之等。

这是他一生治学的得力之处，也是为学者所当服膺之点。

他进行校勘，所主张的方法是：

1. 识字为本。戴氏治学的方法是精通小学。所以他主张以识字为本，由识字形以知声音，由声音以通训诂，由训诂以求真义。他认为：

经所以载道、所以明道者，词也；所以明词者，字也。学者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宋儒讥训诂之学而轻言语文字，是犹渡江河而忘舟楫也。（《国朝先正事略》卷三十五引）

他又说：

夫《六经》字多假借，声音失而假借之义何以得？诂训音声相为表里。诂训明，《六经》乃可明。后儒语言文字未知，而轻凭臆解，以诬圣乱经，吾惧焉。（《东原集·六书音韵表》）

2. 博搜证佐。凡立一说，绝不能遽信为定论。必广集证据，

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以相比较，经过严密的审核，始可得其定理。其无征不信，孤证缺信，虽先儒之言，他也不敢附和以立论。他说：

搜考异文，以为订经之助，又广擥(lǎn，撮持)汉儒笺注之存者，以为综考故训之助。(《古经解钩沉·序》)

他要有“十分之见”才敢肯定。(论见本章第三节)

3．空所依傍。凡一事物，既经观察之后，所获之疑窦，最易因一时主观的感想，轻下判断，而致所得之点仍未确切。所以要空所依傍，绝不容有丝毫先入之见存在，而要纯取客观的资料，作认真细密的研究，才有可能成为不易之论。他说：

志存闻道，必空所依傍。汉儒故训有师承，有时亦傅会；晋人傅会凿空益多；宋人则恃胸臆以为断。故其袭取者多谬，而不谬者反在其所弃。(《东原集·与某书》)

总而言之。戴震校勘方法之精密，态度之谨严，实足为校勘家的榜样。这是他取得卓绝成绩的原因。

戴门弟子很多，其谨执弟子礼而继承其治学精神的，首推江苏金壇段玉裁、高邮王念孙。

段玉裁，雍正乾隆时人。承戴氏之学，尤致力于音声训诂。他说：

治经莫贵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经韵楼集·王怀祖广雅疏证序》)

又说：

不熟于古形古音古义，则其说之存者，无由甄综；其说之亡者，无由比例推测。(同上)

他论校勘的困难和作用，见解精辟：

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也，定是非之难。

是非之难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说之是非。必先定底本之是非，而后可断其立说之是非。……校经之法，必以贾(公彦)还贾，以孔(颖达)还孔，以陆(德明)还陆，以杜(预)还杜，以郑(玄)还郑，各得其底本，而后判以义理之是非，而后经之底本可定，而后经之义理可以徐定。不先正注疏释文之底本，则多误古人；不断其立说之是非，则多误今人。(《与诸同志论校书之难》)

关于版本的问题，他说：

凡疏与经注，各单行本也，而北宋之季合之。维时《释文》犹未合于经注疏也，而南宋之季合之。夫合之者，将以便人；而其为经注之害，则未有能知之者也。唐之经本，存者尚多，故课(试)士于定本外，许用习本。习本流传至宋，受授不同。合之者以所守之经注，冠之单行之疏，而未必为贾公彦、孔颖达所守之经注也。其字其说，乃或龃龉不谋，浅者乃或改一就一。陆氏所守之本，又非孔、贾所守之本，其龃龉亦犹是也。自有《十三经》合刊注疏音释，学者能识其源流同异，抑鲜矣。有求宋本以为正者，时代稍远而较善，此事势之常。顾自唐以来，积误之甚者，宋本亦多沿旧，无以胜今本。况校经如毛居正、岳珂、张淳(均宋代的校勘家)之徒，学识未至，醇(优点)疵错出。胸中未有真古汉本，而徒沾沾于宋本，抑末也。(《十三经注疏释文·校勘记序》)

据此，则段氏校勘的态度，不独鄙视俗本为不足据，即世以为精善的宋本亦在摈弃之列。而必上溯古义，断以自己所掌握的规律，才可判其积谬而评其义理。

段氏的著述，多汇刻于《经韵楼丛书》中，其目有：《经韵楼集》十二卷，《尚书古文撰异》三十二卷，《重订毛诗故训传》三十

卷，《周礼汉读考》六卷，《仪礼汉读考》六卷，《春秋左氏古经》，《说文解字注》三十卷，附《六书音均(韵)表》二卷，《汲古阁说文订》一卷。

上列各书中，《经韵楼集》有关于校勘的文字颇多。余书大都专以辨证真伪、纠正文字为主。而《说文解字注》更是他一生的杰作。戴氏的校勘以小学为入门，所以对《说文》特别注意。这时治此书者尚少，段独能就本书融会贯通，以求义例，作整理的根据，而后以义例律之本书，所以有很多创见。可谓是《说文》的第一功臣了。王念孙《说文解字注序》对此书的评价是：

> 《说文》之为书，以文字而兼声音训诂者也。凡许氏形声"读若"，皆与古音相准，或为古之正音，或为古之合音，方(区分）以类聚，物以群分，循而考之，各有条理。……吾友段氏若膺，于古音之条理，察之精，剖之密。为《六书音均表》，立十七部以综核之。因是为《说文注》形声读若，一以十七部之远近分合求之，而声音之道大明。于许氏之说正义假借，知其典要，观其会通。而引经与今本异者，不以本字废借字，不以借字易本字。揆诸经义，例以本书，若合符节，而训诂之道大明。训诂声音明而小学明，小学明而经明。盖千七百年来无此作矣！

《说文解字注》也不免有武断之处。钮树玉的《段注订》，徐庆承的《段注匡谬》已经指出，但终不能掩其所长。

王念孙，乾隆嘉庆道光时人。一生潜心学术，虽至年老，而治学的兴昧不减。校勘之勤，至死不辍。他从戴震传承声音训诂之学，于小学之书，极为精通。其校勘方法，也以声音训诂为本，而详于本字借字之分。他说：

> 窃以训诂之旨，本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

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譬如振裘必提其领，举网必挈其纲。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赜(zé,深奥)而不乱也。此之不寤，则有字别为音，音别为义，或望文虚造而违古义，或墨守成训而鲜会通；易简之理既失，而大道多歧矣。(《广雅疏证·序》)

王之主要著作有：《广雅疏证》十卷，《读书杂志》八十二卷，《志余》二卷。《广雅疏证》为校注之作，成于晚年，甚为精密。其《自序》说：

今就古音以求古义，引伸触类，不限形体。苟可以发明前训，斯凌杂之讥亦所不辞。其或张君(揖)误采，博考以证其失。先儒误说，参酌而寤其非。……今据耳目所及，旁考诸书以校此本：凡字之讹者五百八十，脱者四百九十，衍者三十九，先后错乱者百二十三，正文误入音内者十九，音内字误者、误入正文者五十七，辄复随条补正，详举所由。……博访通人，戴(奉)稽前典，义或易晓，略而不论。于所不知，盖阙如也。

《读书杂志》为校勘训诂之作，所校古书共十八种：《逸周书》《战国策》《史记》《汉书》《管子》《晏子春秋》《墨子》《荀子》《淮南内篇》《汉隶拾遗》《后汉书》《老子》《庄子》《吕氏春秋》《韩非子》《法言》《楚辞》《文选》。对这些书，都是摘其一句或一条来校考诠释。大都列举古书，博采证据，然后定论。没有强有力之反证，不足以驳其说。

卢文弨(chāo)、毕沅、汪中、孙星衍、阮元、王引之、俞樾和孙诒让 卢文弨，康熙乾隆时人。其治学的精神与戴派相同，亦以训诂为主。其校勘的方法，大抵以旧书校本为据，参以近时之本，而互相钩稽参验。他说：

书之所以贵旧本者，非谓其概无一讹也。近世本有经校雠者，颇贤于旧本，然专辄妄改者亦复不少。即如《九经》小字本，吾见南宋本已不如北宋本，明之锡山秦氏本又不如南宋本，今之翻刻秦本者更不及焉。以斯知旧本之可贵也。（《抱经堂文集·书吴葵里宋本白虎通后》）

卢氏校著之书，大都汇刻于《抱经堂汇刻书》中。其书目如下：《经典释文》三十卷，《孟子音义》二卷，《逸周书》十卷，《新书》十卷，《春秋繁露》十七卷，《方言》十三卷，《白虎通》四卷，《荀子》二十卷，《吕氏春秋》《韩诗外传》《独断》二卷，《西京杂记》二卷，《颜氏家训》七卷，《三水小牍》二卷（以上据善本校刻之书），《经典释文考证》三十卷，《仪礼注疏详校》十七卷，《钟山札记》四卷，《龙城札记》三卷，《抱经堂文集》三十四卷（以上为编著兼校勘之书）。

以上各书，皆据善本精校，辨正是非，解释疑难。他又苦镂板难多，便合经史子集三十八种，仿《经典释文》例，摘字而校注，名曰《群书拾补》，共三十九卷。这书是自费刊刻的。他在《自序小引》中说：

年家（同年登榜的人）子梁曜北谓余曰："所校之书，实不能皆流通于世。其藏之久，不免朽蠹之患，则一生之精神虚掷既可惜，而谬本流传，后来亦无从取正。虽自有余，奚裨焉？莫若先举缺文断简、讹谬尤甚者摘录以传诸人，则以传一书之力，分而传数书，费省而功倍，宜若可为也。"余感其言，就余力所能，友朋所助，次第出之，名曰《群书拾补》。

其他如所校《荀子》，为咸、同以前最善之本；《逸周书》则集王念孙以前各家之说，为后来所依据；《春秋繁露》《颜氏家训》《经典释文》，经文弨之校，始有善本可读；经训堂所刻之《吕氏

春秋》，实出卢氏所校；《墨子》亦多依卢氏所校。所以钱大昕在《群书拾补·序》中称赞卢氏为“自宋次道、刘原父诸公，皆莫能及也。”

毕沅，雍正乾隆嘉庆时人，官至湖广总督。凡小学、金石、地理之学，无所不通。少尝从沈德潜、惠栋受业，因此颇知注重经学。性好著书。虽历任要职，公务冗忙，铅椠（古书刻本）未尝离手，所以著述很多。其收入《经训堂丛书》的有：《山海经》十八卷，《夏小正考注》一卷，《老子道德经考异》二卷，《墨子》十五卷，《目录》一卷，《王隐晋书地道记》一卷，《晋书地理志新补正》五卷，《晋太康三年地记》一卷，《关中金石记》八卷，《经典文字辨正》五卷，《音同义异辨》一卷，《乐游联唱集》二卷，《说文旧音》一卷，《吕氏春秋》二十六卷，《中州金石记》五卷，《晏子春秋音义》二卷。（此外已刻未刻之书尚多，然大多为诗文集之类。）

上列各书，都有相当价值，尤以所校子书为佳。但有些出于当时名家之手。如《吕氏春秋》为卢文弨所校；《晏子春秋》的校勘出于孙星衍，不过毕氏所作《音义》，用力颇勤。《山海经》《老子》的校勘亦佳。自谓《山海经》经时五年而成，可谓此书的功臣。《墨子》一书，舛误很多，经毕氏校过，始称精善。其《自序》说：

> 先是仁和卢学士文弨，阳湖孙明经星衍互校此书，略有端绪，沅始集其成。因遍览唐宋类书，古今传注所引，正其讹谬。又以知闻疏其通惑。自乾隆壬寅八月，至癸卯十月，逾一岁而始成。

《经典文字辨证》，其凡例有五：一曰正，其《说文解字》所有者也；二曰省，笔迹稍省于《说文解字》，如“䖮”之为“香”，“髃（ǒu，肩头）”之为“腢”也；三曰通，变易其方，而不戾于《说文解字》，如“烁”之为“秋”，“鯖”之为“鶬”是；四曰别，经

典之字为《说文解字》所无者；五曰俗，流俗所用，不本前闻，或乖声义，乡壁虚造，不可知者是。他在《自序》中说：

余究思典籍，求迹籀斯（史籀、李斯。史籀有《史籀篇》，李斯有《苍颉篇》），每慨《草木篇》（司马相如作）多变旧文，训诂书积生诡字（《尔雅》十九篇多俗字），若不折衷南阁，曷由探本彼仓？故从五百四十部，穷九千言，遍讨别指，以示专归。其义取之魏江式、齐颜之推；其文则较之唐陆德明、颜元孙、张参、唐玄度，周郭忠恕、宋张有诸家为正。

汪中，乾隆时人。不喜宋儒性命之学，朱子之外，有举其名者必痛诋之。治经宗汉学。

汪颇精于校勘。曾因《墨子》一书，虽有明陆稳刻本较好，但其书多误字，文义晦涩难读，所以略为校正。又采古书之涉于《墨子》者，别为《表微》一卷。他在《自序》中说：

中既治《墨子》，牵于人事，且作且止。越六年，友人阳湖孙季仇星衍以刊本示余，则巡抚毕侍郎（毕沅曾为陕西、河南、山东巡抚）、卢学士（卢文弨曾为翰林院侍读学士）咸有事焉。出入群籍，以是正文字，博而能精，中不劳日力，于是书尽通其症结。且旧文孤学，得二三好古君子与我同志，于是有三喜（得刊本、得同志、有助于治学）焉。既受而卒业，意有未尽，乃为后叙。（《述学·内篇》卷三）

此外，《述学》有内外二篇，中多考据论学之作，其有功于经义者，有：《释三九》《妇人无主答问》《女子许嫁而婿死从死及守志议》《居丧释服解义》《春秋述义》《周官征文》《左氏春秋释》诸篇。至浙刻二十二子之《荀子》，也曾参与校勘。

孙星衍，乾隆时人，深究经史文字音训之学，旁及诸子百家，皆心通其义。精通金石碑板，工篆隶，尤精校勘。好聚书，闻有

善本，借钞无虚日。

孙氏著书颇多，所校刻者有《平津馆丛书》《岱南阁丛书》。而用力最勤者是《晏子春秋》。其《自序》说：

> 《晏子》八篇，见于《艺文志》。后人以篇为卷，又合杂上下二篇为一则，为七卷，见《七略》及《隋唐志》。宋时，析为十四卷，见《崇文总目》。实是刘向校本，非伪书也。……刘向分内外篇，乱其次第，意尚嫌之。世俗传本，则皆明人所刊，或以外篇为细字附著内篇，或删去诋毁仲尼及“问枣”诸章，讹谬甚矣。惟万历乙酉沈启南校梓本尚为完善。自《初学记》《文选注》《艺文类聚》《后汉书注》《太平御览》诸书所引，皆具于篇。末章所缺，又适据《太平御览》补足。既得诸本是正文字，恐或疑其臆见，又为《音义》于后，明有依据。定成八篇，以从《汉志》；为七卷，以从《七略》。虽不能复旧观，以为胜俗本远矣。

至他所著《尚书今古文注疏》，始自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至嘉庆二十年（1815年），经三十余年始得成书，可谓惨淡经营之作。

阮元，乾隆嘉庆道光时人。嘉庆二年（1797年），在浙修《经籍纂诂》，立诂经精舍。十年（1805年），成《十三经校勘记》。十二年入都，进四库未收书六十种，作《提要》上呈。十九年刻《十三经注疏》。迁湖广总督，调两广，修《广东通志》。立学海堂以经古学课（教）士。寻刻《皇清经解》。

阮氏与焦循为亲戚，时常往来。焦氏治经贵独创，阮氏颇受他影响。故其治学也不以惠栋过尊汉儒为然。其校勘方法，亦以声音训诂为本。

阮元有功于清代学术，不只在其著述的价值，更主要的是在

提倡文化、奖励经学二事。他在浙立诂经精舍，在粤立学海堂，影响当时学风很大。而先后提倡刻书，尤于文化有莫大裨益。可谓清代羽翼经学的最大功臣。

他在校勘中最大的工作为《十三经校勘记》。此书虽大都出自诂经精舍诸名士之手，然皆经阮氏之复勘而后才定其是非。其所据板本，丰富之至。现将校经诸公及所据板本列下：

《周易》，元和李锐校。版本用：唐石经、岳本、古本、足利本、宋本（注疏本）、宋本、十行本、闽本、监本、毛本。共十种。

《尚书》，德清徐养原校。版本用：唐石经本、宋临安石经、古本、岳本、葛本、宋版、宋十行本、闽本、明监本、毛本，共十种。引用诸家著作有：《释文》、《六经正误》、《尚书纂传》、《石经考文提要》、《九经误字》、《七经孟子考文》、《十三经正字》、《群书拾补》，凡八种。

《毛诗》，元和顾广圻校。版本用：唐石经、南宋石经残本、孟蜀石经残本、宋小字本二十卷、重刻相台岳氏本二十卷、十行本七十卷、闽本注疏七十卷、明监本注疏七十卷、汲古阁毛氏本注疏七十卷，共九种。引用诸家著作有：陆德明《毛诗音义》二卷、山井鼎《考文毛诗》六册、浦镗《毛诗注疏正误》十四卷、陈启源《毛诗稽古编》二十卷、惠栋《毛诗古义》二卷、戴震《毛郑诗考正》四卷、段玉裁《校定毛诗传》三十卷、《诗经小学》三十卷，凡八种。

《周礼》，武进臧庸校。所用版本及诸家著作有：唐石经《周礼》十二卷、《石经考文提要·周礼》一卷、《经典释文·周礼音义》二卷、钱孙保所藏宋本《周礼注》十二卷、嘉靖本《周礼注》十二卷、惠校本《周礼注疏》四十二卷、附《释音周礼注》四十

二卷、闽本《周礼注疏》四十二卷、监本《周礼注疏》四十二卷、毛本《周礼注疏》四十二卷、《周礼注疏正误》十卷、《礼说》十四卷、《周礼汉读考》六卷，共十三种。

《仪礼》，德清徐养原校。所用版本有：唐石经、宋严州本、翻刻宋本、明钟人杰本、明永怀堂本、宋本、李元阳本、国子监本、汲古阁本、国朝重修国子监本，共十种。引用诸家著作有《经典释文》、《仪礼识误》、《仪礼集解》、《仪礼经传通解》、钞本《仪礼要义》、《仪礼图》、《仪礼集说》、浦镗《十三经正字》内《仪礼》二卷、《仪礼详解》、《九经误字》、《仪礼误字》、《石经考文提要》，凡十二种。

《礼记》，临海洪震煊校。所用版本及诸家著作有：《石经》、南宋石经、岳本、附释音本、闽本、监本、毛本、卫氏《集说》（校本）、惠栋校宋本、卢文弨校本、孙志祖校本、段玉裁校本、《考文》宋版、浦镗校本（《释文》）、通志堂本、叶本、抚州公使库本，凡十七种。

《春秋左传》，钱塘严杰校。所用版本有：唐石经《春秋》三十卷、不全宋刻《春秋经传集解》三册、不全宋刻小字本《春秋经传集解》二卷、淳熙小字本《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南宋相台岳氏《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宋纂图本《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足利本《春秋经传集解》、宋本《春秋正义》三十六卷、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六十卷、闽本《春秋左传注疏》六十卷、监本《春秋左传注疏》六十卷、重修监本、毛本，凡十三种。

《春秋公羊传》，武进臧庸校。所用版本及诸家著作有：唐石经《春秋公羊》十二卷、《经典释文·公羊音义》一卷、惠栋校本《春秋公羊传注疏》二十八卷、监本附释音、闽本、监本、毛本、浦镗《正误》四卷，凡八种。

《春秋谷梁传》，元和李锐校。所用版本有：唐石经、宋椠残本、钞宋残本、元本、十行本、闽本、监本、毛本，凡八种。

《论语》，元和孙同元校。所用版本有：汉石经十卷、唐石经十卷、皇侃《义疏》十卷、高丽本、十行本、闽本、监本、毛本，凡八种。

《孝经》，钱塘严杰校。所用版本有：唐石台《孝经》四轴、唐石经《孝经》一卷、宋熙宁石刻《孝经》一卷、南宋相台本《孝经》一卷、正德本《孝经注疏》九卷、闽本、重修监本、毛本，凡八种。

《尔雅》，武进臧庸校。所用版本及诸家著作有：唐石经《尔雅》三卷、国朝《石经考文提要·尔雅》一卷、明吴元恭仿宋本、元雪窗书院本、宋本、元本、明闽本、明监本、毛本、浦镗《正误》三卷、惠栋校本十一卷、卢文弨校本十一卷(《经典释文》)、明叶林宗影宋抄本、卢文弨《尔雅音义考证》二卷，凡十四种。

《孟子》，元和李锐校。所用版本有：宋石经残本、北宋蜀大字本、宋本、岳本、廖本、孔本、韩本、日本国古本、足利本、宋十行本、闽本、监本、毛本，凡十三种。

可知阮元总领《十三经注疏》的校勘，能备众本，实有过于刘向。而他们的校勘，方法也有不同：刘氏以众本互勘而定其去取，阮氏则众本互勘而主要是记其异同，但有的也正其是非。如《左传·庄公十年》注："曹刿鲁人。"《校勘记》曰：

《史记》作"曹沫"。闽本、监本"沫"误"洙"。

《论语·雍也》"井有仁焉，其从之也。"《校勘记》曰：

皇本"仁"下有"者"字，"也"作"与"。案孔注云："有

仁人堕井”，则“仁”下当有“者”字。

《孟子·万章下》“郤之郤之为不恭”，《校勘记》曰：

> 闽本同。监、毛二本、孔本、韩本“郤”作“郄”。《音义》出“郄之”，云“或作‘郤’，误。”案“郤”字从“卩”。……俗作“却”，郄者邑名，字从邑。经传亦借为“隙”字。

阮元作江西巡抚时，刻《十三经注疏》于学官，不欲臆改古书，即明知宋版之误，也不过是加圈于误字之旁，附所定之《校勘记》于每卷之末。董其事者为盐法道庐江胡稷、武宁贡生卢旬宣。费用则为阮元与僚属绅士所捐。始于嘉庆二十年（1815年）二月，成于二十一年八月。惜校板时，原校诸君已散亡，而阮元又调抚河南。刊板者意在速成，故不免小有舛误。其子福（字喜孙）曾说：“校书之人，不能如家父在江西之细心，其中错字甚多，有监本、毛本不错而今反错者。《校勘记》去取亦不尽善，故家大人不以此刻为善本也。”（见《雷塘庵弟子记》）

王引之，念孙子，乾隆嘉庆道光时人。他的学问大都得自家传，所以他治经也以训诂为首；其校勘方法也以小学为根据。他说：

> 吾治经于大道不敢承，独好小学。夫三代之语言与今之语言，如燕越之相语也。吾治小学，吾为之舌人焉。其大归用小学说经，用小学校经而已矣。（《定庵全集·王文简公墓表铭》引）

他特别能用互相参证的方法，以古义古例，证解古书，不拘于传注和版本。所以他的论点皆有佐证，精核无伦，即专与经学为难的方东树，也不敢不佩服他。

王引之生平所著只有《经传释词》十卷、《经义述闻》十五卷。量虽不多，但最精辟。前者为研究古汉语虚词的佳作。后者为训

释经义兼及校勘之作。

俞樾，道光咸丰光绪时人。其治经以高邮王氏父子为宗，其大要在正句读，审字义，特别注重通古文假借。咸丰七年（1857年），侨居苏州，一意治经，旁及诸子，有所得，必录之，对经子皆有订正。主要著作有《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诸子平议》包括《管子》六卷、《晏子春秋》一卷、《老子》一卷、《墨子》三卷、《荀子》四卷、《列子》一卷、《庄子》三卷、《商子》一卷、《韩非子》一卷、《吕氏春秋》三卷、《春秋繁露》二卷、《贾子》二卷、《淮南内经》四卷、《太元经》二卷、《扬子法言》二卷。此书仿王念孙《读书杂志》而作，校误文，明古义。这本书写得比《群经平议》还要好。他在《自序》中说：

> ……诸子之书，文词奥衍，且多古文假借字，注者不能尽通，而儒者又屏置弗道，传写苟且，莫或订正，颠倒错乱，读者难之。樾治经之暇，旁及诸子，不揣鄙陋，用《群经平议》之例，为《诸子平议》，亦三十五卷。

《古书疑义举例》较两《平议》晚出，列举古书句读、误字、衍文等例八十八条，发前人所未发，使后学读此书者，不仅涣然冰释，更可由此类推其他疑义。虽其中的论点，有欠准确之处，但无疑是训诂学和校勘学一部重要的著作。

孙诒让，是道光同治光绪时人，其校勘之学，虽以识字明训诂为本，但更主张覃思深究。他三十年来校勘的札记，编成了《札迻（移）》十二卷。他在《札迻·序》中说：

> 秦汉文籍，谊旨奥博，字例文例，多与后世殊异。……复以竹帛梨枣钞刻屡易，则有三代文字之通假，有秦汉篆隶之变迁，有魏晋正草之辊（gǔn，象车轮般很快转动）淆，有六朝唐人俗书之流失，有宋元明校椠之羼（chàn，搀杂）改，逵径

百出，多歧亡羊。非覃思精勘，深究本原，未易得正也。

至于他校勘的方法，大抵“以旧刊精校为依据，而究其微旨，通其大例，精研博考，不参成见。”（同上）改正文字舛讹，或求之于本书，或旁证之他籍，及援引类书，注音通假。（同上） 其所校之书，及所据版本和各家著作，举例如下：

《晏子春秋》、吴鼒(zī)景（影）元刊本、卢文弨《群书拾补》、孙星衍《晏子春秋音义》黄以周校本、王念孙《读书杂志》、俞樾《诸子平议》。

《管子》：景（影）宋杨忱刊本、安井衡纂诂本、洪颐煊《义证》、戴望校正本、王氏《读书杂志》、俞樾《诸子平议》。

《荀子》：谢墉校刊本、景宋台州刊本、日本久保爱增注本、刘台拱补注本、郝懿行补注本、王念孙《读书杂志》、俞樾《诸子平议》。

孙诒让著书颇多，其用力最勤者为《墨子间诂》，写作始于光绪丁丑(1877年)，成于癸巳(1893年)。他在《自叙》中说：

> 余昔事雠览，旁摭众家，择善而从。于毕本外，又获见明吴宽写本、顾千里校道藏本，用相勘核，别为写定。复以王观察念孙、尚书引之、洪州倅(cuì，副)颐煊及年丈俞编修樾、亡友戴望所校，参综考读。

此书虽于甲午（1894年）之夏付梓，然犹虑有所误解误释，故仍继续校勘，至甲辰（1904年）再校本始峻功，较前益精。

光绪丁未(1907年)，经三次校雠始定著为《墨子间诂》十五卷、《目录》一卷、《附录》一卷、《后语》二卷。黄绍箕的《墨子间诂·跋》说：

> 所谓“间”者，明指音声之讹误、先后之差舛、篆隶之殊失而言。弥缝其间，犹云弥缝其缺也。

《札迻》十二卷，所校古书共七十多种：《易乾凿度郑注》《易稽览图郑注》《易通卦验郑注》《易是类谋》《易坤灵图郑注》《易乾元序制记郑注》《韩诗外传》《春秋繁露》《春秋释例》《急就篇颜师古注》《方言》《释名》《战国策》《越绝书》《吴越春秋》《汉旧仪》《列女传》《山海经》《山海经图讃》《水经注》《管子》《晏子春秋》《老子》《文子》《邓析子》《列子》《商子》《庄子》《尹文子》《鹖冠子》《公孙龙子》《鬼谷子》《荀子》《吕氏春秋》《韩非子》《燕丹子》《新语》《贾子新书》《淮南子》《盐铁论》《新序》《说苑》《法言》《太玄经》《潜夫论》《白虎通德论》《风俗通义》《独断》《申鉴》《中论》《抱朴子》《金缕子》《新论》《六韬》《孙子》《吴子》《司马法》《尉缭子》《三略》《素问》《周髀算经》《孙子算经》《术数记遗》《夏侯阳算经》《易林》《周易参同契》《穆天子传》《汉武帝内传》《列仙传》《西京杂记》《南方草木状》《竹谱》《楚辞》《蔡中郎集》《琴操》《文心雕龙》。

他校勘的态度很慎重。他主张“一字不略过”，“一字不轻改”。他反对“略观大意，因其文义可通，即谓无复脱误”。他说：“至于人名地名及历算计数之文，官牍俗冗（杂）之语，虽无关文义，而一字之讹，辄成巨谬，尤宜详审校勘。”（见《年谱》引孙氏撰瑞安县志局总例六条中的《校雠例》）

据张之洞《书目答问》的《国朝著述家姓名略》，清代校勘学家有三十一人。除以上所谈之外，还有一些应补述如下：

何焯，康熙时人，学者称义门先生，著有《读书记》五十八卷行世。

卢见曾，康熙时人，曾校刻《雅雨堂丛书》。

全祖望，乾隆时人。曾修南雷黄氏《宋元儒学案》。其校勘工作之最著者为《水经注》。此书经七校，俱有更正。他取旧本《水经注》剪裁粘缀，以为底本，惜剪缀分粘仅及大半而卒。其后蒋学

镛为之整理，也没有完成。

沈炳震，乾隆时人。其用力最勤者为《九经辨字渎蒙》十二卷，是校正《九经》文字之作。第一卷为经典重文，如“翩翩”“坎坎”之类。第二卷为无重文，如“褫(chǐ，剥夺)”字、“豬”字之类。第三卷为经典传讹，如《文言》传：“重刚而不中”，“重”字疑衍之类。第四、五卷为经典传异，以注疏本列于上，以石经不同者列于下，其著书援引异文，亦并附著。第六卷为经典通借。“如君子以顺德”，“顺”，王肃本作“慎”之类。第七至九卷为先儒异读。如《易》“大人造也”，“造”，刘歆引作“聚”之类。第十卷为同音易义，如“元亨”之“亨”，在“王用亨于岐山”则读“飨”之类。第十二卷则注解传述之人。其排比钩稽，颇为细密，可以因文字之异同，究训诂之得失。

沈廷芳，乾隆时人。著有《十三经正字》八十一卷。以监本、重修监本、陆氏闽本、毛氏汲古阁本参互考证。而《音义释文》则以徐氏通志堂本为准。每条标其本句，而疏其讹误于下。其据本改者，并显出之。有未定者，则以疑存之。而于形声六体（六书），尤所详考。《四库总目》说：“注疏有功于圣经，此书更有功于注疏。”

谢墉，乾隆时人。其校《荀子》一书，以景钞大字宋本、元刻纂图互注本、明虞氏王氏合校本、世德堂本、钟人杰本、参以卢文弨校本，互相考证，以正杨倞之误。所以钱大昕说“自此是书始有善本”。（见《荀子·跋》）

姚范，乾隆时人。其学沉究遗经，综括精粹。蓄书十余万卷，手自勘校。于《十三经注疏》《史记》《汉书》《通鉴》《文选》诸书，凡坠简、讹音、乖义，一一是正。或录记上下方，或于片纸简中，反复书之，旁行斜上，朱墨狼藉。但只自求贯通，不希著述。殁

后，学者借钞传写，多致散佚，或并原书为人所窃。存者又颇颠倒脱烂，不可识辨。到了他的曾孙姚莹才加以编辑整理，定著为«援鹑(chún)堂笔记»十五卷。

钱东垣，嘉庆时人，曾校辑«崇文总目»。

彭元瑞，乾隆时人，编有«天禄琳琅书目»。此书以经史子集为纲，而以宋金元明刊本朝代为序。

李文藻，乾隆时人。好到北京琉璃厂和内城隆福诸寺等庙会买书，藏书数万卷，皆自校雠，丹黄不离手。其藏书处曰竹西书屋。校刊有«贷园丛书»初集十二种。其他所校各书，多藏山东省立图书馆内。(详见«山东省立图书季刊·李南涧之藏书及其他»)

张敦仁，乾隆时人。曾校刊宋本«礼记»、明本«盐铁论»等书。

丁杰，乾隆时人。肆力经史，旁及六书音韵算数，尤长于校雠。得一书，必审定句读，博稽他本同异，用小纸反复细书。四库馆开，帮助校勘。

赵怀玉，乾隆时人。曾校刊«韩诗外传»«昆陵集»等书。

鲍廷博，乾隆嘉庆时人。曾校刊«知不足斋丛书»三十集，时称善本。

黄丕烈，乾隆时人。喜藏书，得宋刻百余种，顾莼题其室曰百宋一廛。刊«士礼居丛书»，为收藏家所重。著有«士礼居藏书题跋记»«求古居宋本书目»«汪本隶释刊误»等书。«题跋记»于古书源流，言之甚详。

秦恩复，乾隆嘉庆时人。读书好古。所居玉笥仙馆，蓄书万卷，丹黄不去手。延顾千里于家，共相商榷。手校刊陶宏景«鬼谷子注»、卢重元«列子注»及«隶韵»诸书，时号秦板。有«石研斋书目»二卷。

顾广圻，字千里，嘉庆时人。受业于吴县江声。通经学小学，

尤精校雠。孙星衍、张敦仁、黄丕烈、胡克家、秦恩复、吴鼒等，先后延之主持刻书。每一书竟，必综其所正定者为考异或校勘记于后，人称精确。他尝论校雠之弊说：

校雠之弊有二：一则性庸识闇，强预此事，本失窥作者大意，道听途说，下笔不休，徒劳芜累。一则才高意广，易言此事，凡遇所未通，必更张以从我，时时有失，遂成疻痏(zhǐ，殴伤的疮)。二者殊途，至于诬古人，惑来者，同归而已矣。(《思适斋集·礼记考异跋》)

吴骞，乾隆嘉庆时人。藏书五万卷，筑拜经楼藏之，晨夕展诵。校刊有《拜经楼丛书》。

陈鳣，嘉庆时人。酷嗜书籍，购置不遗余力。凡经史子集，得善本辄互相传观，或手自校勘，钩深索隐。凡古本之为后人妄窜乱删者，莫不审考其来源、次第而字之；更改淆乱者，一一校正。而对刊板之岁月、册籍之款式、收藏之印记，无不精审确凿，使学者如见原书，不至为俗刻所误。著有《经籍跋文》一卷。

钱泰吉，嘉庆时人。好古书，得一书详熟，然后置于方册。值本即校，不以再三为限，朱黄二毫，未尝一日离手。所藏虽少，都精核可传。借人书，有编简断坏者缉之，文字谬误者改之。著《曝书杂记》，以志所得。

汪远孙，嘉庆时人。著有《诗考补遗》《国语考异发正》《古注汉书地理志校勘记》。

曾钊，道光时人。藏书数万卷，著有《输廖山馆藏书目录》。

《书目答问》没有著录的，还有：

纪容舒，康熙时人。因《玉台新咏》一书，自明以来，刊本不一，不只字句异同，即所载诸诗也参差不一，万历中张嗣修本多所增窜，茅国缙本又并其次第而乱之，弄到原书面目全非，于是

综合诸本，参互考核。仿《韩文考异》例，两可者并存之，不可通者缺之，明人刊本虽于义可通，而于古无征者，则附见之，各笺其去取之由，附之句下，成《考异》十卷，引证赅备，考辨详审，为有据之善本。

陈景云，康熙时人。深于史学，尤长于考订。著有《纲目辨误》四卷。《两汉订误》五卷、《三国志校误》三卷、《韩文校误》三卷、《柳文校误》三卷、《文选校正》三卷、《通鉴胡注正误》二卷。

赵一清，学于全祖望。撰有《水经刊误》十二卷。盖因全氏所谓"道元注中有注，本双行夹写，今混作大字，几不可辨"，故乃辨验文义，离析其注中之注，以大字细书别之，使语不相杂，而文仍相属。又以唐《六典注》称桑钦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今本所列仅百十六水，所以证以今本，杂取他籍，得滏、洺、滹沱、派、滋、伊、瀍、涧、洛、丰、泾、汭、渠、获、洙、滁、日南、弱（黑）十八水。于漯水下分漯余水。又考验本经，知漳水分清漳水、浊漳水，辽水分大辽水、小辽水。皆原分为二。共得二十一水。与《六典注》原数相符。可知其考订的精核。所据以校正者，凡四十本。旁证博引，订疑辨伪，是正良多。所以《四库总目》说："自官校宋本以外，外间诸刻，固不能不以是本为首矣。"

沈炳巽，撰《水经注集释订讹》四十卷。是书据明嘉靖间黄省曾所刊《水经注》本，而以己意校之，多所厘正。又以郦道元征引之书赡博，传写既久，讹误相仍，因遍校《史记》《汉书》志表及诸史各志，取其文字异同者录于下方备考。凡州县沿革，则悉以今名注释。历时九年始成。

纪昀，乾隆时人。性嗜读，贯彻儒籍，旁通六家（阴阳、儒、墨、名、法、道）。其学在辨汉宋儒术之是非、析诗文流派之正讹。四库馆开，任全书总纂，校订整理，每书悉作提要，冠诸简首，

称大手笔。又受诏撰《简明目录》，评骘精审。

孙从添，善医，用药出人意表，妇孺皆呼为“孙怪”。有书癖，家虽贫，而藏书逾万卷。著《藏书纪要》一卷，内分八则：一购求、二鉴别、三钞录、四校雠、五装订、六编目、七收藏、八曝书。可称为良好之校雠学论。现将他论校雠之说摘录如下：

非博学好古勤于看书而又安闲者，不能动笔校雠书籍。所以每见庸常之人，校书一部，往往弗克令终，深可恨也。

古人每校一书，先须细心紬绎，自始至终，改正字谬错误，校雠三四次，乃为尽善。至于宋刻本，改正字句虽少，而改字不可遽改书上，元版亦然。须将改正字句，写在白纸条上，薄浆浮签，贴本行上，以其书之贵重也。

凡校正新书，将校正过善本对临可也。倘有古人误处，有未改处，亦当改正。若明版、坊本、新钞本，错误遗漏最多，须见宋元版、旧钞本、校正过底本、或收藏家秘本，细细雠勘，反复校过，……若古人有弗可考究、无从改正者，今人亦当多方请教博学君子、善于讲究古帖之士。又须寻觅旧碑版文字，访求藏书家秘本，自能改正。

然而校书必数名士相好，聚于名园读书，讲究讨论，寻绎旧文，方可有成。否则终身有不到处。所以书籍不论钞刻好歹，凡有校过之书，皆为至宝。至于字画之误，必要请教明于字学声韵者，辨别字画音释，方能无误。

古用雌黄校书，因古时皆用黄纸写，装成卷轴，故名黄卷，其色相同，涂抹无痕迹也。后人俱用白纸钞刻，又当用白色涂抹。今之改字，用淡青色田石，磨细和胶，做成锭子，磨涂纸上，改字最妙。用铅粉终要变黑，最不可用。

若大部书籍，延请多人分校，呈于总裁，计日乃成。若

校正刊刻，非博雅君子有力而好古者不能也。书籍上版，必名手校正，方可刊刻。不然，枉费刻资，草率刊成，不但遗误后学，反为有识所笑。

章学诚，乾隆时人。于史学义理、校雠心法，俱有独得之见。以纂修《和州志》《永清县志》《亳州志》《湖北通志》《常德府志》《荆州府志》得名。所著《校雠通义》四卷，以遇盗散失，只有三卷，为友人所录而保存下来。三卷的卷上分：原道第一，三篇；宗刘第二，八篇；互著第三，五篇；别裁第四，二篇；辨嫌名第五，三篇；补郑第六，三篇；校雠条例第七，五篇；著录残逸第八，一篇；藏书第九，一篇。卷中分：补校《汉书·艺文志》第十，十篇；郑樵误校《汉志》第十一，四篇；焦竑误校《汉志》第十二，十五篇。卷下分：《汉志·六艺》第十三，十二篇；《汉志·诸子》第十四，三十三篇；《汉志·诗赋》第十五，十篇；《汉志·兵书》第十六，八篇；《汉志·数术》第十七，四篇；《汉志·方技》第十八，一篇。此书之作，盖因郑樵《校雠略》一书，于刘氏之微旨，不能平气以求，故于古人大体，终似有所未窥。且其议论过于骏利，凡所提论，皆过为贬驳之辞。因折衷诸家，究其源委，驳补郑、焦之阙误，阐发刘氏之微旨，纠正所言，皆中二氏之弊。补论藏书，宗法刘氏，二事尤精。本书的校雠条例，现摘录如下：

校书宜广贮副本。刘向校雠中秘，有所谓中书，有所谓外书，有所谓太常书，有所谓太史书，有所谓臣向书、臣某书。夫中书与太常太史书，则官守之书，不一本也；外书与臣向、臣某书，则家藏之书，不一本也。夫博求诸本，乃得雠正一书，则副本固将广贮以待质也。

这是说校书宜广贮副本。

古者校雠书，终身守官，父子传业。故于讨论精详，有

功坟典。而其校雠之法，则心领神会，无可传也。近代校书，不立专官，众手为之，限以课程（工作的进程），画以部次，盖亦势之不得已也。校书者既非专门之官，又非一人之力，则校雠之法，不可不立也。

这是说校书宜设专官总领，宜立科条使之遵守。

窃以典籍浩繁，闻见有限，在博雅者且不能悉究无疑，况其下乎？以为校雠之先，宜尽取四库之藏，中外之籍，择其中之人名、地号、官阶、书目，凡一切有名可治，有数可稽者，略仿《佩文韵府》之例，悉编为韵。乃于本韵之下，注明原书出处、及先后篇第，自一见再见，以至数千百，皆详注之，藏之馆中，以为群书之总类。至校书之时，遇有疑似之处，即名而求其编韵，因韵而检其本书，参互错综，即可得其至是。此则渊博之儒，穷毕生年力而不可究殚者，今即中材校勘，可坐收于几席之间，非校雠之良法欤？

这是说校书宜先编韵为索引，俾检本书。

古人校雠，于书有讹误、更定其文者，必注原文于其下，其说两可通者，亦两存其说。删去篇次者，亦必存其缺目。所以备后人之采择，而未敢自以为必是也。班固并省刘歆《七略》，遂使著录互见之法，不传于后世。然亦幸而尚注并省之说于本文之下，故犹得从而考正也。向使自用其例，而不顾刘氏之原文，今日虽欲复刘歆之旧法，不可得矣。

这是说校书宜著录原文，存其缺目。其所言多可采用。他所论编韵一节，及后汪辉祖的《史姓韵编》、阮元的《经籍纂诂》等都已采用。今日所编的索引，也应归章氏开创之功。

朱文藻，乾隆嘉庆时人。精六书金石之学，著《说文系传考异》四卷，《附录》一卷。因徐锴《说文系传》无善本流传。杭州郁

陛宣有钞本，字画拙劣脱落，不可句读。从藏书家朱文游借得影印《说文系传》手钞本，考证诸书，勘其异同，录为《考异》四卷，《附录》一卷。四库馆开时，四库馆只以《系传》刻于京师，《附录》附后。后再取毛刻《说文》互勘，重加校订，至嘉庆年间才补刻出来。

欧阳泉，嘉庆时人。著有《点勘记》二卷。此书为童蒙而作。自周嗣兴《千字文》以至《四书》《五经》传注和唐宋古诗文各家选本，凡课徒应用之书，无不纠其讹误，别其真伪，究其音声，归类说明。例如：

> “工颦妍笑”，颦，眉蹙也，用西子捧心而颦事。俗刻作“嚬”。嚬，笑貌，与笑字重复。（关于《千字文》）
>
> 李绅《田家诗》首句“锄禾当日午”，谓力田者当日午而锄不敢休息。俗本作“日当午”，字为闲文矣。（《关于《五言千家诗》）

王筠，道光时人。博涉经史，尤深《说文》之学。著有《说文句读》，折衷段玉裁、桂馥之说，自辟蹊径。又有《说文系传校录》，以朱文游《考异》为据，参以孙氏、鲍氏所翻宋本，汪氏（汪訒庵。訒，音刃）刻本，《说文韵谱》《五音韵谱》《玉篇》《广韵》《汗简》诸书，考核异同，订正讹误。自壬辰（1832年）开始，越二年而成。乙未（1835年）正月，复校一过。八月，又借马俊良《龙威秘书》本读之，也有改正。癸卯（1843年），又借朱竹君家藏本校阅，记其异同。至此已历四次校订。其用力之勤，可见一斑。

戴望，同治时人。从宋翔凤治《尚书》今文之学。同治中任金陵书局校勘。著有《管子校正》。此书未见。

第七节　辑佚与辨伪

辑佚　书籍久散亡，于是有辑佚之业。最初从事辑佚者，当

推宋代的王应麟。他有《三家诗考》《周易郑氏注》各一卷。（附刻《玉海》后）明中叶后，则有孙瑴所辑的《古微书》，是专搜罗纬书佚文之作，范围窄，体例也未完善。

清代则成绩辉煌。上文已谈到，编《四库全书》由《永乐大典》辑出各书。计有三百七十五种，四千九百二十六卷，经部六十六种，史部四十一种，子部一百零三种，集部一百七十五种。其中最有价值的，如《东观汉记》，元代已佚。其书为范晔所不采，辑了出来，足以补范氏《后汉书》的缺失。《五代史》以欧书出而全佚。现辑了宋薛居正的《旧五代史》，这一时期的史迹始得完备。其他如古代数学书，皆已久佚。现辑出刊布，唤起了学者研究我国古代数学的兴趣。有的古书，得以根据《永乐大典》而校正，如《水经注》。

但《永乐大典》所收之书，仅限于明代现存者。至于元代以前的佚书，清儒仍继续辑出。凡《汉志》《隋志》所著录而今已佚的，清儒皆次第辑出。他们所凭藉的材料，约有五种：

1.唐宋间类书。如《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山堂考索》（南宋类书善本）《玉海》等。

2.汉人子史书及注。如《史记》《汉书》《春秋繁露》《论衡》《国语注》等。

3.唐人义疏。如《周易集解》（李鼎祚著）等。

4.六朝及唐人史、集注。如裴松之《三国志注》、颜师古《汉书注》、李善《文选注》。

5.各古文选金石刻。如《文选》《文苑英华》等。

辑佚范围最广的两家是：

严可均，嘉庆时人。辑有《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七百四十六卷。此书所采，以经史诸子及各类书所引古文辞为主，辅

以梅氏《文纪》、张溥《汉魏百三名家集》等书。起上古，迄隋代，鸿篇巨制，片语单词，无所不录，竭二十余年之力而编成，搜罗详备，巨细不遗。其《自序》说：

唐之文，盛矣哉！唐以前，要当有总集。斯事体大，是不才之责也。……起上古，迄隋世，……作者三千四百九十七人，分代编次为十五集，合七百四十六卷。

这书因卷帙浩繁，未能付梓。直至光绪十三年（1887年），黄冈王毓藻访得此书原稿于方功惠家，始出巨资，慎选梓人，由方氏等理而董之，历时五年，始克竣工。

马国翰，道光时人。家贫好学。自为秀才时，每见异书，手自抄录。及为县令，薪俸所得，悉以购书，所积至五万七千余卷。著有《玉函山房辑佚书》七百六十卷。凡唐以前诸儒撰述，其名氏篇第列于史志及他书可考者，莫不广征博引。自群经注疏音义，旁及史传类书，片词单语，靡不搜罗。上溯周秦，下迄隋唐。分经史子三编。又各因所得多少为卷，作序录以冠于篇。共计六百三十二种，七百六十卷（缺五十一卷）。

马氏殁后，版归章邱李氏，已有散佚。其后丁稚璜、文质夫，先后为补刊其残缺若干篇。而有目无书者，尚少四十余种。

其他如王谟的《汉魏遗书钞》，分经史子集四翼，因卷帙浩繁，只将《经翼》一门计一百零八种刊布。黄奭之《逸书考》（即《汉学堂丛书》），凡分四类，曰《汉学堂经解》，一百一十二种；曰《通纬》，七十二种；曰《子史钩沉》，八十四种；曰《通德堂经解》，十七种。俱蔚为巨观。洪颐煊的《经典集林》三十种，孔广森的《通德遗书所见录》七十二卷，袁钧的《郑氏逸书》七十九卷，任大椿的《小学钩沉》十九卷，陈鳣的《论语古训》……或专辑一人之逸书，或专辑一门学术之遗著，或专辑一书之逸注，都有功于后学。

辨伪 始于东汉。《汉书·艺文志》有《神农》二十篇，班固自注云："六国时诸子疾时怠于农业，道耕农时，托之神农。"有《黄帝君臣》十篇，自注云："起六国，与《老子》相似。"有《杂黄帝》五十八篇，自注云："六国时贤者所托。"至隋，则有僧法经著《众经目录》，别立"疑伪"一门。及宋，因宋人勇于疑古，例子更多，如司马光之疑《孟子》，欧阳修之疑《十翼》、《周礼》、《仪礼》，朱熹之疑《周礼》、《古文尚书》、郑樵之疑《诗序》、《左传》。晚明胡应麟著《四部正讹》，则专以辨伪为业。到了清代，则此学益盛。

清代和宋代相比：宋儒多轻蔑古书，所以往往出于主观，对古书轻加伪名。而清儒则多尊重古书，其辨伪的方法，常用客观的态度细密检查。他们所用的方法是：

1.从著录传授上检查。古书流传，其有名的著作，各史志都有著录，或由他书记载其渊源。若突然发现一书，向来无人经见，则其中定有蹊跷。如先秦书不见《汉志》，汉人书不见《隋志》，唐以前的书不见《崇文总目》，便十有九靠不住。如《古三坟》《晋史乘》《楚梼杌（táo wù）》，除《左传》《孟子》一见其名外，《汉志》《隋志》都无著录，也没人征引，隋时忽然出现，其为伪不问可知。

2.从本书所载事迹制度或所引书上检查。书中事实与文句，只有后人征引前人，绝无前人征引后人之理。如《左传》记智伯事，可知作者决非与孔子同时。《山海经》有汉郡县名，可见决非出于伯益。

3.从文体及文句上检查。文体各时代不同。如《黄帝素问》长篇大段讲医理，不独三代以前，即春秋时亦无此种文体，用《论语》《老子》等可作反证。故此书年代可定为战国至汉。

4.从思想渊源上检查。各时代有各时代的思想。如《管子》内有"兼爱""寝兵"之说，非墨翟、宋钘（xíng）以后不会有此，

可知《管子》不会全是春秋初年管仲所作。

5.从作伪者所凭藉的材料上检查。伪造者势不能字字凭空创造，而且既是依托别人，势必多采其说以求取信。但割裂拼凑，最易露出破绽。如《古文尚书》把《荀子》引《道德经》的"人心之危，道心之危"与《论语》的"允执其中"拼凑起来，造成所谓"十六字心传"，意义不相连属。

6.从原书佚文佚说的反证上检查。已佚之书，后人伪造，若从他书发现所引原书佚文为今本所无者，可知今本之伪。如《晋书》束晰、王接、挚虞等传，说《竹书纪年》有"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等事，当时成为学术上所讨论的问题，但今本无此文，可知今本决非汲冢之书。

清初勇于疑古者推姚际恒。姚氏著有《九经通论》一百六十三卷。又著有《庸言录》若干卷，杂论经史理学诸子，末附《古今伪书考》，凡战国秦汉诸书，大半都列为伪书。《四库总目》斥之说：

> 际恒生于国朝初，多从诸耆宿游，故往往剽其绪论。其说经也，如辟图书之伪，则本之黄宗羲；辟《古文尚书》之伪，则本之阎若璩；辟《周礼》之伪，则本之万斯同；论小学之伪书，则本之毛奇龄：而持论弥加恣肆。至祖欧阳修、赵汝梅之说，以《周易十翼》为伪书，则尤横矣。

现将《伪书考》之目列后：

认为全部是伪作者：《易传》(即《十翼》)《子夏易传》《关朗习传》《麻衣正易心法》《焦氏易林》《易乾凿度》《古文尚书》《尚书汉孔氏传》《古三坟书》《诗序》《子贡诗传》《申培诗说》《周礼》《大戴礼》《孝经》《忠经》《孔子家语》《小尔雅》《家礼仪节》(以上经部)《竹书纪年》《汲冢周书》《穆天子传》《晋史乘》《楚梼杌》《汉武故事》《飞燕外传》《西京杂记》《天禄阁外史》《元经》《十六国春秋》《隆平集》《致

身录》(以上史部)《鬻子》《关尹子》《子华子》《亢仓(gēng sāng)子》《晏子春秋》《鬼谷子》《尹文子》《公孙龙子》《商子》《鹖冠子》《慎子》《於陵子》《孔丛子》《文中子》《六韬》《司马法》《吴子》《尉缭子》《黄石公三略》《李卫公问对》《素书》《心书》《风后握奇经》《周髀算经》《石申星经》《续葬书》《拨沙经》《黄帝素问》《灵枢经》《神农本草》《秦越人难经》《脉诀》《神异经》《十洲记》《列仙传》《洞冥记》《博物志》《杜律虞注》(以上子部)。

认为真书而杂以伪者:《三礼考注》《文子》《列子》《庄子》《管子》《贾谊新书》《伤寒论》《金匮玉函经》。

认为非伪而撰人名氏伪者:《尔雅》《韵书》《山海经》《水经》《阴符经》《吴越春秋》《越绝书》。

认为书不伪而书名伪者:《春秋繁露》《东坡志林》。

认为未能定其著书之人者:《国语》《孙子》《刘子新论》《化书》。

其《古今伪书考》体例凌乱,篇帙简单,未能尽其辞。至其所断,亦未必尽当,所以我们不敢轻信。

其他如万斯同的《周官辨非》,多从制度与古书不合之处立论。孙志祖的《家语疏证》,辨《家语》为王肃所伪撰。刘逢禄的《左氏春秋疏证》,守西汉博士"《左氏》不传《春秋》"之说,谓《左传》解经部分皆刘歆伪撰。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总结了两汉今古文公案,对刘歆所提倡的《周官》《左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非东晋晚出者)《尔雅》等书,皆认为伪。王国维的《今本竹书纪年疏证》,专辨明人补撰的《竹书纪年》,一一指出其剽窃凑合的赃证。崔适的《史记探原》,宗康氏之说,谓《史记》有一部分为刘歆所窜改,一一指明疑点。

辨伪工作,清初做得不少,清末尤盛。惟乾嘉时代,因学者

信而好古，不肯轻易怀疑，所以辨伪工作做得较少。

重要的古书，经清朝一代学者的考订，认为全伪而下了定论的有：《古文尚书》及《孔安国传》、《古文孝经》及《孔安国传》、《孔子家语》（订为魏王肃伪撰）、《孔丛子》（同上）、《阴符经》（订为汉以后人伪撰）、《六韬》（同上）、《鬻子》（订为晋至唐陆续依托者）、《关尹子》（同上）、《子华子》（同上）、《文子》（同上）、《亢仓子》（同上）、《鹖冠子》（同上）、《鬼谷子》（同上）、《於陵子》（同上）、《尉缭子》（同上）、《老子河上公注》（订为晋以后人伪撰）、《陆贾新语》（同上）、《贾谊新书》（同上）。

认为部份是伪的有：《老子》（"夫佳兵者不祥"节无旧注，订为后人所加）、《墨子》（《亲士》《修车》《所染》，订为后人采儒家言以掩饰）、《庄子》（《外篇》《杂篇》的一部份，订为后人伪续者甚多）、《韩非子》（《初见秦》篇订为由《战国策》搀进去的）、《史记》（昭宣元成以后的文句，订为是褚少孙至刘歆等多人续补进去的）、《楚辞》（屈原的《大招》，订为汉人模仿《招魂》而作）。

认为全伪而大约可肯定的有：《周礼》（认为是刘歆杂采战国政书附以己意伪撰）、《孝经》（因春秋时无"经"之名，认为大约是汉人所依托）、《晏子春秋》（认为大约是西汉人伪撰）、《列子》（公认为晋张湛所伪撰）、《吴子》（认为大约是西汉人伪撰）、《司马法》（同上）、《毛诗序》（认为大约是后汉卫宏伪撰，与孔子、子夏、毛公无关）。

认为全伪而未能确定的有：《尚书百篇序》（怀疑是否在伏生、孔安国时已有？何人所作？未决）、《古本竹书纪年》（怀疑汲冢是否属实）、《穆天子传《（同上）、《逸周书》（认为真伪虽未决定，但决非汉以后人所撰）、《申子》（因此书已佚，今存者不全，未能决定）、《尸子》（同上）、《慎子》（同上）、《尹文子》（同上）、《公

孙龙子》（同上）。

认为部份伪而未能确定的有《今文尚书》（认为《虞夏书》一篇，恐为周末或春秋时人所依托）、《左传》（今文学家不承认《左氏》为解释《春秋》之书，说这部分都是汉人所依托）、《论语》（后五篇有人说是汉张禹所窜改）、《史记》（其中一部分有人说是刘歆所窜改）、《荀子》（其中一部分有人说是后人误编的）、《韩非子》（同上）、《礼记》（有人指为汉人伪撰）、《大戴礼》（同上）。

认为书不伪但撰者伪的有：《周易》（《彖传》《象传》《系辞》《文言》《说卦》《序卦》《离卦》，相传为孔子作，有人攻其非。但原书并未题孔子作，也不能说后人依托孔子）、《仪礼》（相传为周公作，有人推测大抵应为西周末春秋初人作）、《尔雅》（后人指为周公作，纯属推测，认为大抵为西汉之作）、《管子》（《汉志》题为管仲作，认为大抵属战国末所编）、《商君书》（《汉志》题为商鞅作，认为误，大抵为战国末法家者流所编）、《孙子》（旧题孙武作，认为不可信，当为孙膑或战国末人书。邑案：孙膑所著，今已在山东银雀山出土）、《尚书大传》（旧题伏生作，认为是否未定）、《山海经》（或言大禹作、伯益作，认为不可信，大抵为汉代相传的一部古书），各种纬书（自《易乾凿度》以下二十余种，汉儒指为孔子作，认为不可信，大约为战国末年所传下的古代神话书）、《周髀算经》（相传为周公或商高作，认为不可信，大约是周末或汉初相传的古算书）、《素问》（相传黄帝、秦越人作，认为不可信，大约是秦汉间的医书）、《难经》（同上），《越绝书》（旧题子贡作，认为误。据原书末叙词用隐语自著其名，已知为后汉会稽袁康所作）。

第八节　清代校勘的总成绩

自顾炎武提出“经学即理学”的口号和空谈性命的陋儒相对抗后，一般学者皆以经学为研究的中心，关于经学的著述，不可胜数。阮元的《皇清经解》和王先谦的《皇清经解续编》所收凡一百五十七家，书三百八十九种，二千七百二十七卷，而未收及续出者尚不在内。不过在校勘方面，成绩最大的仍算子书。因为治经，汉唐以来，已十分发达。清儒虽较精密，也未能出其藩篱。而子书则自西汉以来，治之者少，传刻讹舛，渐不可读。清儒于治经之外，兼及诸子，子书校勘，才取得最大成绩。现分述于后：

《老子》　清儒对此书的校理尚少。校本以毕沅之《老子道德经考异》较可观。此外王念孙《读书杂志》关于《老子》的仅四条。俞樾《诸子平议》也只有一卷。

《荀子》　这书唐以前与《孟子》并称儒家，宋代始斥为异端。清代治此书者最早为汪中，著有《荀卿子通论》《荀卿子年代》（俱见《述学·内篇》）。所校正已有多条，惜未成专书。谢墉、卢文弨亦合校此书（浙刻二十二子本），在咸、同前为最善之本。自后顾广圻复校所得宋本，成《荀子异同》一卷，附辑《荀子佚文》。郝懿行、刘台拱各有《荀子补注》一卷。陈奂有《荀子异同》，陈昌齐有《荀子正误》，皆有所发明。而王念孙的《读荀子杂志》，俞樾的《荀子平议》，尤为精辟。最后乃有王先谦之《荀子集解》二十卷，集自杨倞至清儒诸家之大成，间下已意，亦多善解。

《墨子》　战国时儒墨抗衡，同为显学。故《墨子》一书，乃先秦子书中之最重要者。且其学贯古今，由此而提出兼爱之说，而他舍身救世的精神，尤非他家所能及。清儒治此书最早者为汪中，

有校本及《表发》一卷，今不传。同时卢文弨、孙星衍、毕沅亦治之。毕沅集其成为《墨子注》十六卷，刻入《经训堂丛书》内。而王念孙之《读墨子杂志》六卷，俞樾的《墨子平议》三卷和苏时学的《墨子刊误》，均有贡献。此外，顾广圻、洪颐煊、戴望，亦各有校释。光绪间，孙诒让又覃思十年，集诸家说，断以己意，成《墨子间诂》十四卷，复辑有《墨子篇目考》《墨子佚文》《墨子旧叙》合为附录一卷；又撰有《墨子传略》《墨子年表》《墨学传授考》《墨子绪闻》《墨学通论》《墨家诸子钩沉》各一篇，合为《墨子后语》二卷。

《墨子》七十一篇中最宏深和难读者，莫如《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六篇。晋鲁胜曾为《墨辩注》（《序》见《晋书·隐逸传》），惜已佚。毕沅的注，其他各篇虽有发见，独此六篇，则自称“不能句读”。但他据《经上篇》有“读此书旁行”一语，于篇末别为《新考定经上篇》，分上下两行横列，则最初发现此经旧本写法，当推毕氏之功。其后丁杰、周宗彦皆提出《经说》四篇的特别研究，惜皆不传。张惠言著《墨经说解》二卷，用鲁胜“引经就说”之例，将《墨经》四篇，逐条拆分，各相比附，眉目愈清。其后邹伯奇又言《墨子》中有算术，有光学，有重学，以告陈兰甫，而著其说于《学计一得》中。自此《墨经》内容之丰富，更引起了以后学者如章太炎、胡适、梁启超等的重视。章的《国故论衡》中有《原名》《明见》诸篇。胡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有《墨辩》一篇，都很精采。梁则有《墨经校释》，伍非百有《墨辩解诂》。张纯一又以十余年的精力，博采诸家之说精究详审，著《墨子集解》十五卷，可谓墨学之总结集了。

《庄子》 校理《庄子》，王念孙《读书杂志》有三十五条，俞樾《诸子平议》有三卷。惜无特别校本。清末郭庆藩用注疏体，具录郭注及陆德明《经典释文》，搜集晋、唐逸注及清儒诸家之说，间

附案语，是正文字，著为《庄子集释》，称为现行本之最佳者。

《韩非子》 治此书者有顾广圻的《识误》三卷，卢文弨《群书拾补》一卷，王念孙《读书杂志》十四条，俞樾《诸子平议》一卷，孙诒让《札迻》若干条。又有王先慎的《韩非子集解》二十卷，荟集众说，堪称善本。

《管子》 清儒治此书最早者，为王念孙、王引之、孙星衍。洪颐煊采三家之说，删其重复，附以己见，成《管子义证》八卷。其后王念孙又续有校订，更采及洪书，成《读管子杂志》二十四卷，凡六百四十余条。同光间则有戴望的《管子校正》二十六卷，俞樾的《管子平议》六卷，均有发明。

《列子》 只有任大椿、汪继培之校张湛注本，秦恩复之校卢重元本。而俞樾的《诸子平议》，也只有一卷。

《晏子春秋》 虽属伪书，但清儒多信以为真。有毕沅的经训堂校本。其余如卢文弨、王念孙、俞樾也各有校释。

《吕氏春秋》 最佳的校本为毕沅经训堂本，是据元大字本精校，由卢文弨董其事。此后梁玉绳有《吕子校补》二卷，陈昌齐有《吕氏春秋正误》二卷，王念孙《读书杂志》有三十八条，俞樾有《吕氏春秋平议》三卷。

此外，《商君书》则有平津馆本，《慎子》《尹文子》《公孙龙子》则有守山阁本，《孙子》《吴子》《司马法》则有平津馆校本。

其他先秦古籍经过校理的，还有：

《逸周书》 最初校此书的，有惠栋、沈彤、赵曦明、张坦、段玉裁、沈景熊、梁玉绳、梁履绳、陈雷等。卢文弨集诸家之说，写定重刻，即抱经堂本。其后有王念孙《读逸周书杂志》四卷，陈逢衡的《逸周书补注》二十四卷，朱右曾的《周书集训校释》十卷。

《国语》 校本以士礼居仿宋刻本为最善，是由黄丕烈、顾广

圻合校而成，附有《校勘记》。此外有汪远孙的《国语三君注辑存》四卷，《国语考异》四卷，《国语发正》二十一卷，和洪亮吉的《国语韦注疏》。

《战国策》 校本以士礼居本为最佳。王念孙的《读战国策杂志》则于校勘之外，兼有注释。

《竹书纪年》与《穆天子传》 二书同出汲冢，真伪问题，自晋以来，即有争论。但清儒好古，对二书仍悉心研究，前者有康熙年间徐文靖的《竹书纪年统笺》，所笺驳杂无义法。其后有洪颐煊的《校正竹书纪年》、林鉴塘的《竹书纪年补证》，识断尚欠精确。陈逢衡有《竹书纪年笺证》，积十年之功始成，浩博详赡，颇为精善。王国维有《古本竹书纪年辑校》和《今本竹书纪年疏证》，二书最晚出，也最谨严。后者则有洪颐煊的校本，精核之至。而丁谦所著《穆天子传地理考证》，以欧洲学者所倡中国人种西来之说为据，引本传为证，其比附新奇，但是否真相，尚待考定。

此外如《山海经》，则有毕沅的《山海经》校本，一考证篇目，二考正文字，三考正山名水道，自言历时五年始成，其后有郝懿行的《山海经笺疏》。《周髀算经》则有戴震精校本，为戴校《算经十书》之首。《黄帝内经素问》则有钱熙祚之精校本与胡澍之《内经校义》。

西汉以后的重要书籍，也有相当的校勘：

《淮南子》 为西汉道家的重要典籍，内容博大而有条贯。清儒治此书者，首为庄鸿吉，以道藏本校俗本，为唯一之善本，收浙刻二十二子本内。此外王念孙的《读淮南内篇杂志》，订正俗本九百余条。陈昌齐又有《淮南子正误》十二卷。胡澍有《淮南子校义》。卢文弨、刘台拱、王绍兰亦各有片断之发明。俞樾有《淮南内篇平议》四卷，都有价值。近人刘文典所著《淮南鸿烈集解》二

十一卷，博取先儒之说，参以自己心得，又从《御览》《文选注》采辑佚文佚注甚备，其价值足与王先谦的《荀子集解》相埒。

《春秋繁露》 为西汉儒家要籍。经宋、明之传刻，讹误百出。乾隆时开四库馆，始取《永乐大典》中楼钥校本详校，补一千一百余字，删一百一十余字，改一千八百二十余字。其后卢文弨复据四库本重校，是为抱经堂本，最为精善。

《盐铁论》 此书通行本为明张氏本，篇第字句割裂增易殊多。卢文弨曾以《永乐大典》本及他本校正了若干条。其后有阳城张氏重校本，顾广圻为作《考证》三卷。汪继培、俞樾、孙诒让亦各有所校。

《白虎通义》 此书过去以《汉魏丛书》本最通行。最初校者为庄述祖，且厘定目录，搜辑佚文。继之者有卢文弨、赵曦明、秦黉、梁同书、孙志祖、周广业、吴骞、朱型、梁履绳、汪绳祖等，皆有所发明。

《韩诗外传》 韩婴说《诗》，为西汉今文三家诗之一。其《诗内传》四卷，《诗故》三十六卷，《诗说》四十一卷久亡，存者惟《外传》六卷。乾隆前通行本以毛刻最善，然讹脱亦不少。卢文弨曾有校本，未刻成专书。其门人赵怀玉于乾隆末成新校本。五十三年，周廷采复采赵书，附以己意，著为校注本。

此外，如王念孙、王南陔之校《列女传》，陈寿祺之校《新序》《说苑》，徐养原、俞樾之校《法言》《太玄》，汪继培之校《潜夫论》，俞樾、孙诒让、蒋光煦之校《论衡》，卢文弨之校《风俗通义》《越绝书》，都各有相当的价值。

汉以后书籍的校勘情况是：

《华阳国志》 此书为方志之祖，有义法，有条贯，惟讹误殊多。顾广圻据宋元丰吕氏、嘉泰李氏两本精校，自此始有善本。

《抱朴子》 此书乾隆前无善本。自孙星衍据道藏本精校，卢文弨、顾广圻复参合诸本助之，重刻平津馆本，始可驯读。

《水经注》 这是现存最古的地理书。乾隆中赵一清、全祖望、戴震各有校本，均极精粹。此后毕沅、孙星衍也各有校本，然对三家所校，无甚补益。道光、咸丰后又有沈文起的《水经注疏证》，汪士铎的《水经注提纲》《水经注释文》，陈澧的《水经注西南诸水考》。王先谦的合校本，则以戴、赵二本为主，参以诸家，虽无新发明，然最便学者。最后杨守敬著《水经注疏》八十卷，略"谓此书为郦氏原误者十之一二，为传刻之误者十之四五，为赵、戴改订及（致）误者十之二三。"（见《凡例》）足见清代研究《水经注》的风气之盛了。

其他，如《颜氏家训》，则有卢文弨之校本。《经典释文》，则有卢氏之校补及考证。《困学纪闻》有翁元圻的校注。《大唐西域记》有丁谦的《大唐西域记考证》，引据各史外国传，旁及西人地理学家言。《慈恩法师传》有支那内学院所刻精校本，除校字外，颇引他书记载有异同者校出若干条，可称现行本之最善者。

史书的校雠，最著者有钱大昕的《二十一史考异》，附《三史拾遗》《诸史拾遗》，王鸣盛的《二十七史商榷》，和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三书形式相类，但内容各有特点：钱书最详于校勘文字，解释训诂名物，也有些地方纠正原书事实讹谬。王书虽间校释文句，然所重在典章故实。赵书则特别注重治乱兴衰之故，不喜专论一人之贤否及一事之是非，故史实有抵牾，校勘未必兼顾到。

至于对断代史的校雠，则以对马、班、陈、范四史之成绩为最优：

《史记》 自冯商、褚少孙以后，续者十余家，孰为本文，孰为窜入，实难辨别。且传写讹误，颇失本来面目，故亟需整理。

清儒治此者有钱坫(diàn)的《史记补注》一百三十卷(未刊)，梁玉绳的《史记志疑》三十六卷，刊误纠缪之处颇多。王念孙的《读史记杂志》六卷，则主于校勘文字的异同。崔适的《史记探原》，则专辨后人续增窜入的部分，企图还《史记》之真相。

《汉书》及《后汉书》 有吴翌凤的《汉书考证》十六卷，惠栋的《后汉书补注》二十四卷，钱大昭的《汉书辨疑》二十二卷、《后汉书辨疑》十一卷、《续汉书辨疑》九卷，王念孙《读汉书后汉书杂志》十七卷，陈景云《两汉订误》五卷，沈钦韩《两汉书疏正》七十四卷，周寿昌《汉书注校补》五十六卷、《后汉书注校正》八卷。诸书大抵释文考异订误兼顾。而王先谦复集全清考订之大成，著《汉书补注》百卷、《后汉书集解》百二十卷、《续汉书志补注》三十卷，最为精博。

《三国志》 此书夙称良史，但其书行文太简，事实每多遗漏。虽有裴松之的注补助遗缺，但仍未完善。故清儒治此书者，大多是增广裴注所补。其较著者有杭世骏《三国志补注》六卷，钱大昕《三国志辨疑》三卷，潘眉《三国志考证》八卷，梁章钜《三国志旁证》三十卷，陈景云《三国志举正》四卷，沈钦韩《三国志裴注补训》、《故释地理》各八卷，侯康《三国志补志》一卷，周寿昌《三国志注证遗》四卷。

至四史以下各史之校注，则有彭元瑞的《五代史记注》七十四卷，吴兰庭的《五代史记纂误补》四卷(补宋吴缜之作)，洪亮吉的《宋书音义》，杭世骏的《北齐书疏证》，刘寿曾的《南史校议》，赵绍祖的《新唐书互证》，厉鹗的《辽史拾遗》二十四卷，施国祁《金史详校》十卷，李文田《元秘史注》等。

不过，清儒校理史书所注意及用力最勤者，是表志等单篇之整理，故其成绩最大。如孙星衍的《史记天官书考证》，梁玉绳的

《汉书人表考》，全祖望的《汉书地理志稽疑》，钱坫的《新斠汉书地理志》、《汉书十表注》，汪远孙的《汉书地理志》校本，吴卓信的《汉书地理志补注》，杨守敬的《汉书地理志补校》，陈澧的《汉书地理志水道图》，洪颐煊的《汉书水道疏证》，徐松的《汉书地理志集释》《汉书西域传补注》，李光廷的《汉西域图考》，李赓芸的《汉书艺文志考误》，朱右曾的《后汉书郡国志补校》，钱坫的《续汉书律历志补注》，毕沅的《晋书地理志新校正》，方恺的《新校晋书地理志》，张穆的《延昌地形志》，章宗源的《隋书经籍志考证》，杨守敬的《隋书地理志考证》，张宗泰的《新唐书天文志疏正》，沈炳震的《校正唐书方镇表宰相世系表》，董沛的《唐书方镇表考证》等，于校注之外，兼有不少补遗。

第九节　民国以来

民国以后，校勘事业对清儒有所继承，如鲁迅先生对《嵇康集》的校勘，许维遹先生对《吕氏春秋》和《管子》的校勘，闻一多先生的《楚辞校补》，都成绩斐然。但最值得注意的，是为前人所未及的下列二事：

《说文解字诂林》的编纂　《说文解字》是古书校勘的钤键，清儒对《说文》的研究成果不下二三百种，其中最著名的有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桂馥的《说文义证》，王筠的《说文句读》，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民国以后，则有丁福保的《说文解字诂林》，更足以雄视千古。此书汇聚大小徐及清儒臧玉林以下诸家有关《说文》之书一百八十多种，一千余卷，条分缕析，系诸许书每字之下，使学者一展卷间而众说咸在。他在《自序》中说：

福保少习许书，颇以遍检各书为苦，偶寻一字，辄时废

一二日。积书至数十种，多方搜索，尚难赅备，况散见于各家文集及笔记中者，尤不可指数，往往以遗亡而难于参检。回忆乙未（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岁，肄业南菁书院时，年二十有二，即拟聚大小徐及各家之《说文》，与各文集笔记中之论《说文》者，依许书之次第，逐字类聚，为《说文解字诂林》一书。搜集材料，至今三十年矣，作辍无恒，未能脱稿。自癸亥（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以来，使及门诸子十余人，朝夕襄余董理旧稿，缀草杂遝，殆盈箧衍（笥）。计各家撰述都百八十二种，千三十六卷矣。……今聚数百人腹笥渊博之学说于一编，百川洄注，潴为渊海，互相参校，洞见症结，俾观者如游名山胜水，望高深而识其径途也。

关于此书编纂之困难和所花时间，他在《自序》中说：

《说文诂林》之材料，搜罗三十余年，未能完备，遗憾尚多，于以知编书之不易也。然详核《诂林》引用书目表，已有一千余卷。设以一人每日将原书剪裁一卷，以一字为一条，按照许书之次第，分别部居而归类之，非三年不克卒业。而钞写大徐本，以篆文之解说晋为大字，及钞写各书，若以一人为之，亦须三年。将千余卷书割裱贴成七千六百余页，每人每日仅贴二页，一年不过贴七百页，若全部贴完，亦须十年。贴成之后，每页之字，须描清方可付之石印。此事大感困难。每人每日，亦仅描二页；若一人描之，亦须十年。七千余页之书，编一通检，此事不能分工合作，须一手为之，亦须一年。每日校勘二十页，全部亦须一年。故此书若以一人之力为之，非二十八年不能成功。兹以十人之力，通同合作，似三年可以成书。然自开始至辍简，已七年矣。

关于七年中所用经费，他说有“二万四千五百七十元”。

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其校勘之精。清朝一代学者之校此书，只就宋、元旧椠本而已。丁氏则又广搜宋以前古本，精勘熟雠。故其成绩有清儒所梦想不到之处。其纂例第十八条说：

余以唐释慧琳《一切经音义》百卷、辽希麟《续一切经音义》十卷中之可以是正《说文》者，已甄录于大徐本后；复以梁顾野王之原本《玉篇》残卷三卷半，唐孙愐之唐写本《唐韵》一卷半，唐写《文选集注》残本十六册，辽僧行均之影宋本《龙龛手鉴》四卷及金韩道昭之《五音集韵》十五卷，……录其可以校补今本之讹夺者，附于大徐本下。……

至其成绩，则凡大小徐之误脱及删节等，无虑数百条，皆据古本为之改正。昔之不可驯读者，今则涣然冰释，的确是后学的津梁。其校正者，各举一例如下：

1． 脱句者。《说文》："木，从屮，下象其根。"许书之例，既有"下象其根"，必有"上象其某"之句。如"耑(端)"云："上象生形，下象其根。"《根本说一切有部昆奈耶药事音义》（《续》八卷十三页）"木"注引《说文》作"米，下象其根，上象枝也。"

2． 脱字者。《说文》"易"下引秘书说："日月为'易'。"段氏玉裁、桂氏馥、王氏筠，皆以"秘书"为"纬书"。许书之例，凡引书当用"曰"字，如"《诗》曰""《易》曰"等；引各家之说当用"说"字，如"孔子说""楚庄王说"等。《大般若经音义》（六卷七页）"易"注引《说文》："贾秘书说：'日月为易。'"考《后汉书·贾逵传》，逵两校秘书，贾秘书即贾逵也。许君古学正从逵出，故《说文》引师说，或称贾秘书，或称贾侍中而不名也。段注以为纬书，非是。

3． 倒字者。《说文》："'衔'，马勒口中。"《大宝积经音义》（十一卷六页）"衔"注引《说文》："马口中勒也。"徐《说文》误倒。

4. 衍字者。《说文》："'篅（chuán）'，以判竹圜以盛谷也。"《四分律》（五十九卷二十一页）、《普曜经》（七十四卷十一页）、《那先比丘经》（七十五卷二十二页）各音义，"篅"注引《说文》皆云："判竹圜以盛谷者也。"徐《说文》衍"以"字，脱"者"字。

5. 误字者。《说文》："'穫'，刈谷也。"《胜天王般若经》（十卷十页）、《海龙王经》（三十八卷五页）、《大智度论》（四十六卷九页）、《那先比丘经》（七十五卷二十二页）、《集古今佛道论衡》（八十四卷十二页）各音义，"穫"注引《说文》皆云："刈禾也。"徐《说文》误"禾"为"谷"。

6. 删"声"字者。徐氏兄弟不明古音，每于《说文》谐声之字，疑为非声，辄删"声"字。如《说文》"'瑞'字从玉耑。"徐锴《系传》云："'耑'下或有'声'字。"误也。今本各铉本无"声"字，乃由锴所删。《大方广菩萨十地经音义》（二十四卷七页）及《文殊悔过经音义》（四十五卷二十页）"瑞"注引《说文》，皆"从玉耑声。"锴所以删"声"字者，因《唐韵》以"耑"为多官切，与"瑞"不相近也。不知"耑"古有"穿"音。《考工记·磬氏》云："以上则摩其耑。"《释文》："'耑'，刘音穿。"且又有"揣"音。《庄子·胠箧篇》云："惴耎之虫。"《释文》："'耑'，音揣。"据此，则"瑞"字从"耑"得声，推之"揣""喘""颛"等，并仿此。

胡朴安评此书说："余读其书，有四善焉：一、检一字而各学说悉在也；二、购一书而众本均备也；三、无删改仍为各家原面目也；四、原本影印决无错误也。"

旧小说之整理 我国人向视小说为小道。所以校勘小说之事，未之前闻。近代受外来文学的影响，对小说才重视起来。自文学革命运动以来，小说的整理也开始了。

关于旧小说整理的工作，以胡适的考证为最早。他用科学的

方法，替《红楼梦》《水浒传》《儒林外史》《醒世姻缘传》《海上花列传》等一批小说做了考证或作新序，许多被埋没了的作者的姓名，才为人所知晓。

胡适为了一个作者的姓名，譬如《醒世姻缘传》的作者“西周生”，不惜以数年的精力去精究深讨，反复考证出就是蒲松龄。

其余如蒋瑞藻的《小说考证》及《续编拾遗》，又作了大规模的考据。

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为中国小说有史之始。

至于对旧小说的校点，其用力最勤者，当以汪原放为首。汪氏所校有《红楼梦》《水浒》《续水浒》《海上花》《老残游记》《儿女英雄传》《三国演义》《儒林外史》《镜花缘》《西游记》。汪氏所校各书，不但不苟于校勘，选择版本也很严，且都附有胡适的考证或新序，为国内唯一的善本。

以《红楼梦》的校勘为例，汪氏是根据胡适所藏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程伟元第二次排本翻印的本子。至其校勘方法，他在《校读后记》里说：

> 民国十一年，我就问适之先生把这个本子借了来，开始做校读的工作。我的方法是用我从前根据道光壬辰（1832年）刻本，而以他本互校成功的标点本作底子，把应该全照“程乙本”（因是用程甲本校正修改的，故称为“程乙本”）改的地方一齐誊过去。因为这样有几种好处：第一是可以不损害那难得的“程乙本”；第二是可以很明白的看出“程乙本”和我们的标点本、道光本怎样的不同；第三是可以自由随心的修正标点符号和分段。民国十一年六月二十四号以后，我曾将全书校过一次，十二年五月十五号以后又校过一次，同年十二月六号以后又校过一次。

至其成绩，现择录几条如下：

1. “当时他父亲在日，极爱此女(指宝钗)，令其读书识字，较之乃兄（指薛蟠）竟高十倍。自父母死后，见哥哥不能安慰母心，他便不以书字为念，只留心针黹家计等事，好为母亲（指薛姨妈）分忧代劳。”（见第四回）“自父母死后”的“母”字，必为“亲”字之误。

2. “贾赦还各处去寻觅僧道。贾政见不效验，因阻贾政道：……”(见第二十五回)“政”字校为“赦”字。

3. “雪雁疑或道：……”（见第五十七回）“或”字校改为“惑”字。

这些都比较简单。其最有价值的一条是元妃的存年问题。据第八十六回所说，生于“甲申年正月丙寅”。又据第九十五回所说，“是年甲寅年十二月十八日立春。元妃薨日，是十二月十九日，已交(接)卯年寅月，存年三十一岁。”但程乙本误作“存年四十二岁，”又据金港堂书籍株式会社铅印本第九十五回眉批道：“按前八十六回云，元妃生于甲申年正月丙寅，至甲寅年，乃三十一岁耳。”因此，汪氏便根据上说，也改为“存年三十一岁”。

他对《红楼梦》所校改的字数，总共有二万一千五百零六个。

对旧小说的校勘，此外还有俞平伯校点的《三侠五义》《浮生六记》，汪乃刚校点的《宋人话本》《醒世姻缘传》《醉醒石》《今古奇观》《娱目醒心编》《西游补》及杂剧《西游记》等，大都附有胡适的考证或新序，为国内最善之本。其余如刘半农校点的《何典》，川岛校点的《杂纂四种》，范遇安校点的《浑如篇》，王品青校点的《痴华鬘》，黎烈文校点的《大宋宣和遗事》《新编五代史平话》《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及《京本通俗小说》，丁文江校点的《徐霞客游记》等等，都为学者推重。

殷墟书契出土后，罗振玉、王国维为之考释，金甲文之学又兴，据此以考古礼古史，有非先儒所能及者。如胡适、顾颉刚、钱玄同诸氏的《古史辨》，更非先儒所能及。

第六章　从史的发展看校勘的目的、条件和方法

第一节　校勘的目的要求

校勘的目的是求真，不是求善求美。如唐郑畋《马嵬坡》：

肃宗回马杨妃死，云雨虽忘日月新。正是圣明天子事，景阳宫井又何人！

后人把“肃”改为“玄”，把“虽”改为“难”，的确改得很好，使诗的内容更加丰富，更有情韵。诸如此类的例子，古书上很多，上文第一章第三节也谈到一些。但我们仍应恢复古典作品本来的面目，指出这是后人改的。虽则这样改，文字比原文更美，但我们也应该校勘。如果是要求善，那就只能选择有价值的、思想内容健康的作品来校勘罢了。

一、求古本之真

在文字上，古书的讹误不少，如《淮南子·内篇》，文字错误就有九百多处。清胡克家翻刻元刊本《资治通鉴》，错误就有万字以上。道光壬辰刻本《红楼梦》，错字就有两万多个。都大大丧失了古书本来的面目，校勘就是要求订正文字上的错误，恢复古书本来的面目。

校勘包括辨伪。辨伪也为的还古书本来的面目。《史记》当然是司马迁作的，司马迁作的部分就是《史记》本来的面目，褚少孙、

司马贞和冯商等十余家所补的，即使思想性、艺术性强，也应通过考证，清理出来，还《史记》本来的面目。清崔适的《史记探原》，其著作的动机，为的就是这个。

不过辨伪也得审慎。如《楚辞》的《大招》，清儒考订非屈原之作，而是汉人摹仿《招魂》而作。这还可以，因过去已有人说过"《大招》恐非屈原作。"但胡适连屈原也否认了，认为历史上根本就没有屈原其人。这样辨伪就未免太过了。又如《老子》第三十一章"夫佳兵者不祥之器"，清儒因这章没有旧注，便定为是后人所加。但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这章是有的，只是"佳"字是衍文罢了。辨伪的考证，本来是为的去伪存真，但这样随便怀疑，主观武断，连"真"也去掉了。

《文心雕龙·隐秀》自"始正而末奇"至"朔风动秋草"，中有四百零一字。这四百零一字，已由黄叔琳辑注附载纪昀评本、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证明了它是伪作。现将纪昀的考证录后：

> 癸巳三月，以《永乐大典》所收旧本校勘，凡阮本所补，悉无之，然后知其真出伪撰。

他是从版本上的勘比而知其伪。他又从语句和体裁上的考证而知其伪。他说：

> 此一页词殊不类，究属可疑。"呕心吐胆"，似摭玉溪《李贺小传》"呕出心肝"语。"煅岁炼年"，似摭《六一诗话》周朴"月煅季炼"语。称渊明为"彭泽"，乃唐人语。六朝但有"征士"之称，不称其官也。称班姬为"匹妇"，亦摭钟嵘《诗品》语。此书成于齐代，不应述梁代之说也。且《隐秀》三段，皆论诗而不论文，亦非此书之体；似乎明人伪托，不如从元本缺之。

象这样辨伪，才有说服力，才能达到去伪存真的目的。

校勘也包括辑佚。辑佚也为的求真，不能认为凡是辑出来的都是真。当然大部分辑出来的都是原书的佚文，但辑佚是从别书的引文辑出来的，别的书对某一部书的引文也有引错了的。如《太平御览》卷二百七十六所引《新序》，其中竟有后汉初吴汉的事；卷二百七十一所引《新序》，其中竟有三国曹操的事。《新序》是西汉刘向所编，《太平御览》所引的《新序》，显然不是原书了。如果辑录这些作为《新序》的佚文，那显然也就不符合去伪存真的要求了。

二、求事实之真

去伪存真是对的，但原作者也有写错了的时候，碰到这种讹误，校勘不校勘呢？譬如有篇稿子，把《桐荫清话》误写为《相荫清话》，又有篇稿子，把“纪昀”误写为“纪昫”，并注明“‘昫’，音田。”你如果做校对或校勘工作，要不要替他删改呢？要！

求真或存真有两种：一种是求古本之真，一种是求事实之真。两种都是需要的。对古书传抄传刻之误的校正是前者，对原作者讹误的校正是后者。段玉裁说得好：

> 校书定是非最难。是非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说之是非。必先定底本之是非，而后可断其立说之是非。……何谓底本？著书者之稿本是也。何谓立说？著书者所言之义理是也。……不先正底本，则多诬古人；不断其立说之是非，则多误今人。（《经韵楼集·与诸同志论校书之难》）

校书而对古书随便删改，是不对的。如唐代唐玄宗把《尚书·洪范》“无偏无颇”的“颇”改为“陂”，便属不对。原文不错，为什么要改它呢？校勘不是这样校法。

不过校勘古书又与现在校对稿件的方法不同。校对稿件，如

原稿有误，可以直接改正。若古书的作者有错误，则只宜在注中指出。如《文心雕龙·神思》“祢衡当食而草奏”，据《后汉书·祢衡传》，刘表曾和一班文士共草奏章，当时祢衡外出，回来时看见了他们所草的奏章，还没看完，便撕毁丢在地上，刘表大为惊骇。祢衡于是请求笔札，一会就写好了，文辞义理都很不错。又黄祖的长子黄射，有一次大宴宾客，有人献鹦鹉一只。射举杯请衡作赋，以娱嘉宾。衡执笔而作，文不加点，辞采华美。则原文的“当食”和“草奏”原是二事，刘勰误把它们合而为一了。《文心雕龙·夸饰》：“至《东都》之比目。”这是班固《西都赋》中的描写，说《东都》，是刘勰记忆之误。又如严复的《辟韩》引《老子》曰：“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查《老子》并无此文。《庄子·胠箧》中有“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之语，这也表明严复记错了。象这些地方，我们从事校勘工作，都不能象老师给学生改文或报刊编辑给作者改稿一样，给刘勰、严复改正，而只能在注释中指出。注释是包括训诂和校勘的。我们校勘，既要保存古本的真，又要保存事实的真；在注释中指出原作者的错误，便可以把二者统一起来。

一个是改正，一个是求真，校勘要把二者结合起来。即使是传抄或传刻中文字上的错误，也要把二者结合起来；当然这里的真，指版本的真。把二者结合起来的做法有二：一是对误字不改，而只在注或校勘记中指出。阮元校书，用的就是这种做法。《雷塘盦弟子记》说：

> 阮氏抚江西时，刻《十三经注疏》于学官，不欲臆改古书，即明知宋版之误，但加圈于误字之旁，而附前所校定之《校勘记》于每卷之末。

二是对误字改正，并在注中说明。卢文弨、孙星衍所刻的书就是这样。

我们正误，未必都能正确无误。把改正和存真结合起来，可以为读者继续研究提供方便。

校勘中的"考异"，把不同版本不同的文字罗列出来，虽没有解决问题，但却提出了问题，它能供后人研究，使以后有可能解决问题。

第二节 校勘需要的条件

一、主观的条件

1. 要有耐性。校勘是一种锁碎的干燥无味的工作，必须有耐性才能校下去。校对一两篇文章，这问题还不太严重，如果校一部书或一部书稿，即使校一遍，也要很久才能校完，就更需要耐心，需要坚忍不拔的精神，才不致有头无尾，半途而废。至于要校雠多次，那就更不必说了。清孙从添说得对：

> ……每见庸常之人，校书一部，往往弗克令终，深可恨也。（《藏书纪要·校雠》）

现在更是这样。1980年年底，编者阅读某一个比较有名的刊物第十一期，只看了几篇文章，不过一万多字，就发现其中的"西晋"误为"东晋"，"刘禹锡"误为"李禹锡"，"陈霸先"误为"陈霸光"，"《说文解字》"误为"《说文问字》"，"《史记》"误为"《史汇》"，"宫苑""误为宫宛"……这些都是常识性的问题，只要稍有耐性，便可以校对出来。

2. 心要细。校对要有耐性，也要细心。郑振铎先生说校勘工作"粗心大意的人永远不会做"（见《鲁迅先生的辑佚工作》）。一目十行那样看书，当然难以发现问题，即使逐行地看，有问题也很容易忽略过去，特别是对我们熟习了的词语。如《文心雕龙·原

道》："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理地"很容易误书或误排为"地理"，校对时若非特别细心，就很容易忽略过去。

数目字和专有名词，即使有误，在句中也似乎文义可通，这些也容易抄错、刻错、排错，校勘时也容易忽略。如杨树达先生《高等国文法·代名词》和《词诠·而》："余，而所嫁妇人之父也。(《左传·成二年》)""成二年"是"宣十五年"之误，杨先生两次都写错了，而商务印书馆编辑部负责校对的同志一直都没有校正。刘永济先生《文心雕龙校释》42页："'誉'，《御览》九五六作'兴言'。按当作'誉言'。""九五六"是"五九六"之误，中华书局编辑部负责校对的同志也没有校正。这都是由于数目字的校勘容易忽略之故。因此清末的孙诒让说：

> 应将清本及原稿逐字对读，遇有写手脱误，即应立时补正，不可止检清本，略观大意，因其文义可通，即谓无复脱误。至于人名、地名及历算计数之文，官牍俗冗之语，虽无关文义，而一字之讹，辄成巨谬，尤宜详审检勘。(瑞安县志局《总例》六条中的《校雠例》)

3．但胆要大。校勘和其他考证一样，要胆大心细。只要有足够的证据，便可以大胆把结论提出来。如吴子厚同志的《〈孟子·离娄〉疑有缺文》(见《语文园地》一九八一年第四期)，疑文是：

> 孟子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根据各个分句的主语都有表述语，惟"离娄之明"没有，因而怀疑"离娄之明"下有缺文，应还有"不以××，不能明××"，作表述语，很有道理。但缺文是什么呢？他根据下列证据：

> 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旷(即师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

其聪矣；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即离娄）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毁绝钩绳，而弃规矩，攦（xǐ，折）工倕（尧时著名工匠）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庄子·胠箧》）

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头一个分句应是：

离娄之明，不以五色，不能鉴（或"辨""析"等字）文章；……

并再以下列这些证据来证明：

是故骈于明者，乱五色，淫文章。青黄黼黻之煌煌，非乎。而离朱是已。多于聪者乱五声，淫六律，金石丝竹黄钟大吕之声，非乎。而师旷是已。（《庄子·骈拇》）

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二曰五声乱耳，使耳不聪；……（《庄子·天地》）

还用《老子》上篇、《荀子·天论》、《王霸》等证据，补上了"离娄之明"下的缺文，令人信服。

校勘，既要改正，又要存真。对改字来说，不能妄改，但须要改的还是要改。改与不改，应遵循原则。这原则王引之已提出来了：

吾用小学校经，有所改，有所不改。周以降，书体文七变，写官主之。写官误，吾则勇改。孟蜀以降，椠工主之，椠工误，吾则勇改。唐宋明之士，或不知声音文字而改经，以不误为误，是妄改也，吾则勇改其所改。若夫周之末、汉之初，经师无竹帛，异字博矣，吾不能择一以定，吾不改。假借之法，由来久矣，其本字什八可求，什二不可求，必求本字以改假借字，则考文之圣之任也，吾不改。写官椠工误矣，吾疑之且思而得之矣；但群书无佐证，吾惧来者之滋口也，吾又不改。（《定盦全集·工部尚书高邮王文简公墓表》引）

王引之对校勘的态度，体现了胆大心细这个原则性的问题。

4．要有历史文化知识。郑振铎先生说，做校勘工作，“浅薄而少读书的人永远做不好”（见《鲁迅先生的辑佚工作》）。多读书，历史文化知识才丰富，才容易看出文字上的错误。如《文心雕龙·神思》“阮瑀据案而草奏”，只从文义上看，看不出有哪个需要校正的字。但顾广圻据《三国志·魏志·王粲传》裴松之注引《典略》，记曹操曾叫阮瑀替他写信给韩遂。当时曹操刚出近郊，阮瑀在后面跟着，因而立刻在马上写，写好了呈献给曹操。曹操执笔，想略为改动，结果一个字也改动不得。顾广圻据此，才能把“据案”校为“据鞍”。又如《离骚》“扈（被）江离与辟芷兮”，王逸注：“《文选》‘离’作‘蓠’。”如知王逸是东汉人，而《文选》是六朝梁萧统所编，便可以辨别这条注解之伪，不可能是王逸的注解了。因为东汉时的王逸，怎能见到后代萧统的《文选》呢？又如晋杜预校勘《左传》，他如果不是对古代从黄帝以来的历法有研究，经传中关于年月日的差错，他就不能校正了。（参阅第三章第五节）

在文化知识中，小学是校勘的基础。因此校勘古籍要有古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知识。因为古书上文字的讹误，因字形而误和因字音而误者极为普遍。而要识字又很不简单。如孙诒让《札迻·序》所说，“文字有三代之通假，有秦汉篆隶之变迁，有魏晋正草之辊（gǔn）淆，有六朝唐人俗书之流失，有宋元明人校椠之羼（chàn）改，逵径百出，多岐亡羊”。古书上因古字之误，因隶书之误，因草书之误，因俗字之误等等因形而误的例子，第一章第三节都已举过。

除了字形以外，就是字音。清儒对字音很重视。如戴震关于治学，便主张以识字为本，由识字以知声音，由声音以通训诂，由训诂以求真义。他说：

夫《六经》字多假借，音声失而假借之义何以得？诂训音

声相为表里；诂训明，《六经》乃可明。（《东原集·六书音韵表》）

关于字音，由于古今读音差异很大，所以从事校勘，要有古音韵学的知识。王念孙说：

《说文》之为书，以文字而兼声音训诂者也。凡许氏形声"读若"，皆与古音相准，或为古之正音，或为古之合音。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循而考之，各有条理。不得其远近分合之故，则执今音以疑古音，或执古之正音以疑古之合音，而声音之学晦矣。《说文》之训，首列制字之本音，而亦不废假借。……不明乎假借之指，则或据《说文》本字以改书传假借之字，或据《说文》引经假借之字以改经之本字，而训诂之学晦矣。（《说文解字注·序》）

他在《广雅疏证·序》中又说：

窃以训诂之旨，本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譬如振裘必提其领，举网必挈其纲。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赜（音啧，幽深）而不乱也。此之不寤，则有字别为音，音别为义，或望文虚造而违古义，或墨守成训而鲜会通；简易之理既失，而大道多歧矣。

徐锴不明古音，才每于《说文》谐声之字，疑为非声，而妄删"声"字。如徐本《说文》，"瑞"字只说"以玉为信也，从玉耑。"因为徐氏不知"耑"古有"揣"音，所以把"耑"下的"声"字删了。这样校勘，对古书和后学，都有害无益。反之，熟悉古音，则可以把古书上的误字校正。如《文心雕龙·比兴》"如川之涣"，这是"赞曰"中的句子，是韵文。音韵学家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就说："'涣'字失韵，当作'澹'。"

至于训诂和校勘工作的关系，那就更密切了。很难设想：有人连词句的意义都不懂，而能看出其中文字的讹误并能把它校正。古书上有的文字上的讹误，就是因对古书原文词句的意义不懂而

形成的。如《淮南子·原道》:"乘雷车六云霓。"后人就因不懂原句的"云霓"是以云霓为马,"六云霓"就是使云霓成为六匹马之意,因而把"六"误改为"入"。《老子》第三十一章"夫佳兵者不祥之器",清儒就是看出这句话文义不通,才怀疑"佳"是误字。虽然王念孙校订为"唯"字,阮元校订为"惟"字,都没有解决问题;但他们提出了问题,到马王堆的帛书《老子》出土,知"佳"是衍文,问题就解决了。又如《红楼梦》第五十一回:"话说众人闻得宝琴将素性所经过各省内古迹为题。"因"素性"文义不通,所以汪原放校订为"素昔。"这些都可以说明从事校勘工作,要有训诂方面的知识,才能避免误校而能解决问题。

有关训诂方面的知识,不限于词义,语法修辞也包括在内。如上例"六云霓",其中就有语法的问题,"六"是数词作使动词用。如果明白这点,就明白"六云霓"之意,而不致把"六"误校为"入"了。又如《商子·农战》:"国作壹一岁者十岁强,作壹十岁者百岁强,作壹百岁者千岁强。"后人不知"作壹"是"制定专一于农战的方针政策"之义,以为"壹""一"同义,又不理会这三句是排句,语法结构相同,便把头一句的"壹"删去,又把其他的"壹"误改为"一",把第三句的"作"又误改为"修"。这样删改,便使得全句的意义扞格难通了。

5. 要熟悉古书的体例。这样才容易看出文字上的讹误。如《说文解字》,凡是形声(谐声)字,其体例必是说"从×,×声"。如"刀"部:"劈,破也。从刀,辟声。""刭,刑也。从刀,巠声。""木"部:"枝,木别生条也。从木,支声。""柔,木曲直也。从木,矛声。"凡引书则用"曰"字,如"《诗》曰""《易》曰""《春秋传》曰"。引各家之说用"说"字,如"孔子说""楚庄王说""贾侍中说"。丁福保的《说文解字诂林》,就因为掌握了《说文》的体例,而校正了

徐氏《说文》不少误字。

吴子厚同志的《〈孟子·离娄〉疑有缺文》，就是根据《离娄上》“孟子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的句例，怀疑“离娄之明”句下，有缺文，应还有一句“不以××，不能×××”作为这句的表述语。因“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只是“公输子之巧”的表述语，不能同时作“离娄之明”的表述语。因而补出了佚文。

二、客观的条件

校勘所需的客观条件，是指底本以外其他用以校勘的图籍碑帖。可分：

1. 不同的版本。同一部书的不同版本，应尽量搜集，择善而从。自西汉刘向以来，校书即兼备众本。刘向所校各书，其所备的本子，官家的就有中书、太常书、太史书，私家的就有外书、“臣某书”等（参阅第二章第一节）。印刷术发明以后，书籍的版本多了，兼备众本就更有条件。如南宋岳珂校勘《九经》，用的本子就有二十余种之多（参阅第四章第十一节）。清阮元主持对《十三经》的校勘，所用的版本也很多（详见第五章第六节）。

版本有好有坏。岑仲勉《隋唐史》说汉朝人的著作《易林》中已有“砂糖”，因而断定砂糖在汉代已有。误。因《易林》中的“砂糖”是“砂糠”之误。在较好的版本中便作“砂糠”。可见校勘选择善本是很重要的。

版本以宋版最善，但宋版也有伪造，必须注意。

用不同的版本校勘，可以考异。如殿本《史记·滑稽列传》“祭以粮稻”，复刻宋蜀大字本、影印南宋黄善夫本、明末毛氏汲古阁本“粮稻”均作“粳稻”，都通，便不好判断其是非了。但有时也

可以订正。如《史记·滑稽列传》复刻宋蜀大字本、复刻百衲宋本、影印南宋黄善夫本"见道旁有穰田者"，就可以择善而从，根据南北监本、殿本、明末毛氏汲古阁本、清同治时的张文虎校本和日本泷川龟太郎《史记会注考证》本等，就可把"穰田"订正为"禳田"了。

2. 类书。如《初学记》《艺文类聚》《北堂书钞》《群书治要》《渚宫旧事》《白孔六帖》《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困学纪闻》《玉海》《事类赋》《山堂考索》等，这些是校勘较常用的。依靠这些唐宋的类书，可以校正古书文字上的讹误。如《新序·杂事第五》"魏文侯过段干木之闾而轼"章"夫君子善用兵也"，"善"，《北堂书钞》卷一百一十三、《群书治要》卷四十二引作"之"，作"之"为是，因下文"野人之用兵"，词例相同。"野人之用兵"，《书钞》《治要》引"兵"下有"也"字，也应补，因与上文"君子之用兵也"词例相同。依靠这些类书，也可以辑佚。如"叶公好龙"的故事，一般人知在《新序·杂事第五》，但《太平御览》卷四百七十五、《事类赋·龙赋》注及《困学纪闻》卷十引《庄子》中也有，而今本《庄子》没有。可知"叶公好龙"的故事是《庄子》佚文。还可以依靠这些类书辨伪。如《太平御览》卷二百七十六引《新序》有后汉吴汉之事，卷二百七十一引有曹操之事，可知隋唐三十卷的《新序》，搀有后人的伪作。

3. 有关的经史子集等。如《新序·杂事第一》"昔者魏武侯谋事而当"章"朝而有忧色"，"朝"字上《荀子·尧问》《吕氏春秋·骄恣》有"退"字，应据以补。《新序·节士第七》"楚昭王有士曰石奢"章"于是廷有杀人者"，"廷"字涉下文"遂反于廷"的"廷"而误，应从《韩诗外传》卷二及《史记·循吏列传》作"道"。我们如校勘《韩非子·存韩》，可以用《战国策·秦策一》对勘；校勘《荀子·劝学》，可用《大戴礼·劝学》对勘；校勘《史记·淮阴侯列传》，

可用《汉书·韩信传》《蒯通传》对勘；校勘贾谊的《过秦论》，可用《文选》《资治通鉴》对勘；校勘《左传·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可用《谷梁传·隐公元年》对勘。想知道这些情况，主要靠对古书的博览。当然在校勘时，无论应用什么材料，都要细心对文字逐行逐字勘比。

4. 古书的注释。古注也引有有关的材料，校勘可以利用。如《新序·杂事第一》"禹之兴也以涂山"章"孙叔敖相楚"，便应从《文选》孙楚《为石仲容与孙皓书》及潘岳《杨荆州诔》李善注引下补"国富兵强"四字了。又如《新序·义勇第八》"卞庄子好勇"章"冬与鲁战"，"冬"也应从《后汉书·班固传》及《崔骃传》李贤注引校正为"齐"。又如丁福保的《说文解字诂林》，根据唐释慧琳《一切经音义》、辽希麟《续一切经音义》中的注，校正了徐氏《说文解字》中许多文字上的讹误(详见第五章第九节)。

5. 古文物和碑帖。长沙马王堆和山东银雀山的帛书出土，对我们从事古书的校勘帮助很大。如马王堆出土的《老子》，用以校勘今本《老子》第三十一章，可知"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的"佳"是衍文。清儒辨伪，把《孙子》定为孙膑或战国末人书，据银雀山出土的孙膑《兵法》，可订清儒之失。其实用古文物校勘，不自今日始，北齐已有(见第三章第五节)。至于碑帖，如清阮元主持的《十三经》校勘所用的汉《石经》、唐《石经》、孟蜀《石经》、南宋《石经》就是。

第三节　校勘的方法

狭义的校勘，其方法从态度来说，可分为"死校"和"活校"两种。死校是据此本以校彼本，只指出其错误异同，不改动原本。

顾广圻、黄丕烈所刻的书就是这样。活校是以群书所引，择善而从，改其误字，删其衍文，补其缺文，但仍在注中注明原本的误字、衍文、缺文是什么。卢文弨、孙星衍所刻的书就是这样。这问题已在本章第一节谈过。本章所谈的是从所用材料来说的几种方法。

一 对校法

对校法是用同一部书的各种版本对校。如《论语·微子》：

> 子路曰："不仕无义（不做官就没有君臣间应有的关系）。"

朱熹《四书集注》云：

> 福州有国初（宋初）时写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为"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

这是把对校法用于考异。又如《老子》第三十一章有"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的话，"佳"一本作"美"。但以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甲、乙本《老子》校之，则知"佳"为衍文。利用古文物来对校古书，有人把这种校法称为"文物校书法"。但如出土的文物和所校的是同一部书，则仍称它为对校法，亦无不可。

从"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的校勘中，可知利用不同版本的异文，择善而从，是可以解决问题的。又如《尚书·尧典》"敬授人时"，阮元《校勘记》云：

> 古本"人"作"民"，注同。按唐以前，引此句未有不作"民"者。疏云："敬授下人以天时之早晚。""下人"，犹下民也。知孔疏所据之本，犹作"民"字。

《校勘记》因定"人"为"民"。

不过择善而从，怎样择善？植根于我们对历史文化知识的掌握。如《易经·乾卦·象辞》"故或之"，"或"，阮元《校勘记》云：

> 《石经》、岳本、闽、监、毛本同。古本"或"作"惑"，非。

下句同。

经文明明说："或之者，疑之也。""或"明明是"疑惑"的"惑"，为什么古本作"惑"，《校勘记》认为不对而应作"或"呢？因为"或"是"惑"的古字，《易经》原本应作"或"。如作"惑"，则"惑之者，疑之也"，就是废话了。

二　本校法

本校法是以本书的前后文字互证，比较其异同，从而断定其中的错误，如王念孙《读书杂志》第九册校《墨子·尚贤中篇》云："'岂必智且有慧哉？'念孙案：'智且慧'，与前'贵且智'、'愚且贱'，文同一例，'慧'上不当有'有'字，盖后人所加。"又第十二册校《荀子·成相篇》云：

> "上能尊主爱下民。"念孙案："爱下民"当作"下爱民"，与"上能尊主"对文。《不苟》《臣道》二篇并云："上则能尊君，下则能爱民。"是其证。

又如《新序·杂事第三》"乐毅为燕昭王谋"章谚曰："仁不轻绝。"为涉上文"仁不轻绝"而误，应作"仁不轻利"，与下"智不简功"对文。"轻利"即下文的"轻绝厚利"。

又如《新序·善谋第十》"郦先生未行"，"郦先生"应作"郦生"，因上文均作"郦生"。

丁福保的《说文解字诂林》根据《说文解字》的体例，校正了徐氏《说文解字》许多文字上的讹误（详见第五章第九节），用的也是本校法。

不过，应用本校法得注意本书本篇其他文句语法修辞的问题。并不是本书本篇其他意义相同或相近的文句怎样措词造句，这里也非要同样措词造句不可。如《新序·节士第七》"鲍焦衣弊肤见"章："吾子何以至此也？""至此"，文字无误，不能根据下文"吾何

以不至于此也”的“至于此”，把“至此”也校为“至于此”。因为古代汉语可用介词结构作动词谓语的补语，也可用名词、代词直接作动词谓语的补语。这里一处说“至此”，一处说“至于此”、语法都通，只是要求在修辞上有变化罢了。这也说明应用本校法，同样要有历史文化知识，特别是古代汉语语法修辞的知识，才能校正，也才不致胶柱鼓瑟。

三　他校法

他校法是以他书校本书。凡其书有采自前人书中之处，可用前人的书来校；有被后人的书引用之处，可用后人的书来校；其材料有为同时代的书所并载的，可用同时代的书来校。《新序·杂事第四》“宋康王时”章：“为无头之棺。”“棺”应从《战国策·宋策》作“冠”，二书均西汉刘向所编，当然同时。应用这种校法，牵涉的范围很广，因而花的时间、精力也比较多。但有时非用此法不可。吴子厚同志的《〈孟子·离娄〉疑有缺文》，如不查到《庄子·胠箧》，就找不到旁证，就不会知道《离娄》中“离娄之明”下所缺的是什么词语，从而不能加以补缀了。

又如王念孙《读书杂志》第五册校《汉书·苏武传》云：

> “乃幽武置大窖中，绝不饮食。”念孙案：此本（本来）作“绝不与饮食”。师古所见本脱“与”字，则义不可通。……旧本《北堂书钞·设官部》十五、《服饰部》三、《艺文类聚·天部下》《太平御览·天部》十二、《人事部》百二十七、《服用部》十，引此皆作“绝不与饮食”，是诸家所见本，皆与师古异也。《汉纪》本于《汉书》，而亦作“绝不与饮食”，是仲豫（荀悦字）所见本，亦与师古异也。今据以订正。

这是用后人的书来校。

又如《新序·善谋第十》“母爱者抱子”，应从《史记·留侯世家》

《汉书·张良传》作“母爱者子抱”。这是古时的成语。《韩非子·备内》：

语曰：“其母好者其子抱。”

“好”亦即“爱”。“爱”“好”“抱”都是表被动的动词。“母爱者子抱”是指母为父所爱，其子亦为父所抱。

这是兼用前人和后人的书来校。

应用他校法，用类书比较好办。因类书为数有限，而每种类书都有目录可查，翻检花的时间不多。但其他经史子集，浩如烟海，如要利用，就得靠博览和细阅了。

四　理校法

理校法是据理推测其正误。这是很大胆也是很危险的做法，因为容易主观武断。但由于材料缺乏而又非校正不可时，这种校法还是不能不用。事实上应用这种校法，用得好也可以解决问题。宋代的沈括用理校法校勘宋玉的《神女赋》，解决了问题，就是一个例子。宋玉《神女赋》的《序》云：

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浦，使玉赋高唐之事。其夜王寝，果梦与神女遇。其状甚丽，明日以白玉。玉曰：“其梦若何？”王曰：“晡（bū，午后三至五时）夕之后，精神恍忽，……见一妇人，状甚奇异。……”王曰：“状何如也？”玉曰：“茂矣，美矣，诸好备矣！盛矣，丽矣，难测究矣！上古既无，世所未见。……”王曰：“若此盛矣，试为寡人赋之！”玉曰：“唯唯。”

沈括《补笔谈》卷一说：

自古言楚襄王梦与神女遇，以《楚辞》考之，似未然。……“其夜王寝，梦与神女遇”者，“王”乃“玉”字耳。“明日以白玉”者，“以白王”也。“王”与“玉”字，误书之耳。前日

梦神女者，怀王也；其夜梦神女者，宋玉也；襄王无预焉，从来枉受其名耳。

袁珂《宋玉〈神女赋〉的订讹和高唐神女故事的寓意》(见《光明日报》1962年8月19日《文学遗产》第428期)说《序》中末了二"王"二"玉"不误以外，从"其夜王寝"起，三"王"二"玉"都是互误，《文选》版本中这种错误由初唐开始。

校勘是一种细致的工作，粗心大意不得；这也是一种艰苦的工作，怕难不行。即使是应用理校法，也不是轻而易举的。沈括能看出《神女赋》中文字的讹误，是从故事的逻辑性深思熟虑才看出来的。按照他这样校订，这《序》就文从字顺，故事就合情合理了。

应用理校法，需要讲道理，最好还能摆事实。闻一多先生校勘《离骚》"曰两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的"慕"字，就是这样。《离骚》是韵文，而"慕"和上句的"占"不押韵，意义也不通。旧校勘学家从没有人发现它有脱误。郭沫若先生说："慕"当为"莫□"二字，因下一字缺坏，写者不慎，致与"莫"误合为一而成"慕"字。并说所缺一字，"耽""钦""琛""探""寻""朋"等必居其一。闻一多先生加以补充说：

郭氏所拟音固合矣，义亦庶几近之，于形则殆无一能与"莫"合而成"慕"者，于以知其不然。余尝准兹三事以遍求诸与"占"同韵之侵部诸字中，则惟"念"，足以当之。"念"缺其上半，以所遗之"心"，合于"莫"，即"慕"之古体"慕"(杨统碑、阴繁阳令碑"慕"字如此)矣。念，思也，恋也。"孰信修而莫念之"，与上下文义正相符契。(见《楚辞校补》)

从材料的应用来看，校勘的方法虽然可分四种，但在校勘的实际工作当中，这几种方法经常参合使用。如王引之《经义述闻》

卷二十五校《春秋谷梁传·僖公十有二年》云："'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庚午，日有食之。'《石经》'正'作'三'。引之谨案：日食必于朔。杜氏《春秋长历》是年三月庚午朔，则作'三'者是也。若'正月'，则《长历》为辛丑朔，非庚午矣。《左氏》《公羊》皆作'三'。"此即参合了对校、他校、理校诸法。

校勘也包括辨伪的方法，可以参阅第五章第一节和第七节，人们定能从清儒吸取有益的经验。

本书是从论到史，又从史到论。第一章的《绪论》，是为读者了解校勘学历史的发展而写的。第六章谈校勘的目的要求、校勘的条件和方法，是从校勘学的历史发展中总结出来的几个问题，是为了我们怎样从事古书的校勘而写的。

学习历史，就是为的古为今用。在谈校勘学的历史发展的四章中，本书介绍了当时从事古书校勘的历史背景，这对我们现在从事古书校勘工作可能有帮助，因为我们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工作。本书也介绍了前贤对古书校勘所取得的成果，这可能会帮忙我们了解哪些古书的校勘工作前贤已做了很多，哪些还做得不够，从而可以使我们对需要做的古书校勘工作的轻重缓急，作出比较正确的认识和决定。

解放以后，由于左倾路线的干扰，特别是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古籍校勘工作曾一度停滞不前。但由于学者、专家们的努力，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果。专著和论文，可以列举的有：郭沫若等先生的《管子集校》（其中许维遹先生所校，是在抗战时期搞的）、唐兰的《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的研究》、《〈刘宾客嘉话录〉的校辑与辨伪》、魏建功的《读广韵校勘记》、周祖谟的《方言

校笺》、《〈洛阳伽蓝记〉校释》、《景宋本〈刊谬正俗〉校正》、《古籍校刊述例》、周祖谟、恽天民的《关于唐本〈说文〉的真伪问题》、胡道静的《梦溪笔谈校证》和本书编者的《新序校证》等等。解放以后，为了建立社会主义新文艺理论的体系，对古典文学理论的研究比较重视。我国古代文论论述得最全面的是《文心雕龙》，因此从事于此书校勘工作的也比较多。如刘永济的《文心雕龙校释》、王利器的《文心雕龙校证》，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和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也有校勘。

现在中央号召我们大量整理古籍，有许多学者专家已把某某书的"校点""校注""校证"等列入他的科研计划当中。预计不久的将来，古书的校勘，会取得无比丰硕的成果。不过这灿烂前景的描述，只能留待来哲了。